责任编辑：何　瀚
封面题字：尹长民
封面设计：谭石光

长 沙 郊 区 文 史

第　五　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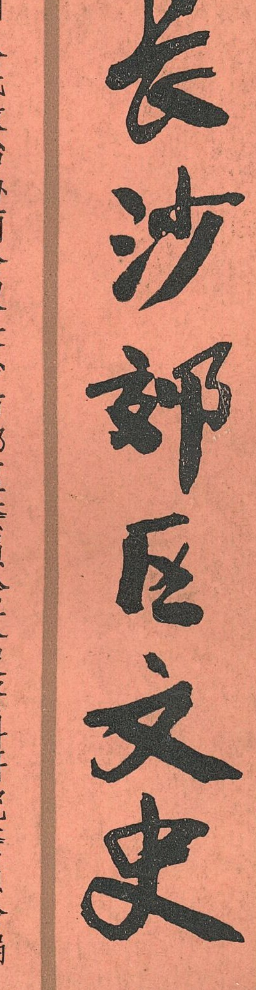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郊区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内部发行）

长沙郊区文史

第五辑

5
1991/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长沙郊区文史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郊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二月

目　　录

▲人物春秋

肖劲光童年时代的轶事……………………**周桔生口述**（1）

还是祖国好……………………………………**陈明新**（4）

——忆李铁铮与周世钊的交往

李觉家事三则………………………………………**丁冰玉**（35）

▲革命史话

长沙南郊第一个红色政权…………………**游运生口述**（39）

农运时期的一张布告……………………**周振新口述**（43）

我奉命拟订粮食统购统销方案的前后…………**刘仲述**（44）

▲成就采撷

回忆郊区渔业四十年……………………………**祖国翰**（48）

郊区农机水利工程建设成就回顾………………**钟曙明**（60）

建国后长沙郊区蔬菜生产的发展……**余韵涛　李惠兰**（65）

▲发展变迁

治理龙王港、建设活鱼仓…………………………**梁子成**（71）

今昔长善垸……………………………曾干龙　杨本立（80）
长沙“南大路”史话…………………………杨国兴（84）

▲水利建设

同升水库的修建…………………………………杨国兴（88）
谭阳垸防汛三部曲………………………………黄步云（93）
奎塘河治理工程的回忆…………………………吴　忠（98）

▲义教沧桑

我在长沙市南郊办义务教育的回顾……………刘寿祺（103）
我在两个平民教育组织任教的情况……………刘仲述（117）
一年义务教育，令我终生难忘…………………邹少云（123）

▲科技史料

湘白Ⅰ系猪的选育………………………………任福池（124）

▲艺海钩沉

《双送粮》创作的前前后后……………………徐叔华（137）

▲古迹沿革

石碑岭古碑简介…………………………………欧阳晃（150）

简公庙的兴衰……………………………………杨国兴（155）
谷山寺谈古………………………………………丁冰玉（161）

▲往事拾零

我的一次荒唐发言………………………………邹少云（165）

肖劲光童年时代轶事

周桔生* 口述

1903年1月4日，肖劲光出生在长沙市郊区岳麓山乡天马村照洲港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肖劲光有三个哥哥，大哥肖云灵、二哥肖厚成、三哥肖云华，此外有一个姐姐春姑娘和一个妹妹细姑娘。八口之家靠他父亲捞鱼、打零工和他母亲带着他的几个哥哥上山捡柴来维持，生活清苦。他父亲早逝后，家境凄惨。

我的母亲与肖劲光的母亲是堂姊妹，我与肖劲光是表兄弟，又因两家邻近，所以童年时代，我们经常在一起放牛、砍柴。

照洲港有一条长堤，旧社会的牛贩子常从此过河。在牛过渡前，贩子们总是花几个小钱喊附近的穷孩子把牛放到堤上喂养。放牛是我们这些穷孩子最乐意干的事情，因为既可以在一起玩耍，又能给家里赚几个零钱。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赶着牛往河堤上跑。河堤上青草茂密，不愁牛吃不饱，只需防着牛不斗架。肖劲光最有心计，他要小伙伴们将爱斗架的牛分开拴在堤边的几颗大树后面，然后就玩“捉坏蛋”的游戏，或排队“一二、一二……”地走着方步取乐。虽说肖劲光在孩子们中间年龄算是小的，但因为他会出主意，小伙

注：周桔生是肖劲光的表兄，也是青少年时期的好友。

伴都拥戴他为“司令”。

肖劲光有个本家，外号叫肖八厨子。他包了长沙市坡子街“李文玉号”金铺老板的伙食。他看到肖劲光家靠捡柴难以度日，便要肖云灵进城给他当帮手。几年后，肖云灵在肖八厨子的帮助下，在煤码头开了一个铺子，铺名叫“大昌裕”南食店，且生意不错，我还去买过几回东西。由于店铺生意好，家境也逐渐转好了。

肖劲光十二岁时，他母亲和大老兄打算让他读点书，认识几个字。附近的朗公庙有所小学，教书先生叫陈宝田。陈先生早晚经过河堤，看到肖劲光与众不同的举止，常说：“这孩子有头脑，将来有出息。”他几次劝我姨妈送肖劲光到学校去读书，但由于负担不起，未能遂愿。当我姨妈找陈先生谈及读书之事，他一口答应了，肖劲光于是进了朗公庙小学。

每天放学后或星期天，肖劲光常跟着伙伴们一起到岳麓山拾柴火。他不会捆柴，总是求助于同伴，我帮他捆得最多。我曾对肖劲光说：“你力气小，连柴都捆不了，还是多读点书，长大后做个官老爷。”他笑着答道：“书，我是想读，可官老爷我不想做。”

在那个年月，我们上山拾柴只能偷偷摸摸进行，因为山是庙产。显相寺（管辖岳麓山一带）的和尚陈松柏很凶，一见我们上山就穷追不舍，非抢走柴火不可。一旦柴被抢，伙伴们只知放开喉咙骂，唯有肖劲光说：“骂不行，冇得用，想个办法惩他吧！”他接着就出了一个主意：让两个跑得快的故意把柴棍砍得冬冬响，惹起和尚去追，引开和尚后，其他伙伴就砍的砍，捆的捆，抓紧时间砍柴。这个“调虎离山”计很有效，我们经常背着柴火唱着歌下山。后来肖劲光觉得老是这样干下去不好，便去庙里向和尚说：“我们搞点柴火，也是为了生活，又不砍你的树，出家人慈悲为善，何必动气？”此后，和尚也就不那么计较了。他在朗公庙读了两年书后被他大哥接到城里读书去了。偶尔回家探娘时，还到山上去拾柴。

告别童年后，我与肖劲光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1924年，他第二次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党组织分配他回湖南工作，与省委接上头以后曾回过家。七十年代初期肖劲光再次回家看望乡亲们，并将“赵洲港”改为“照洲港”。

（刘诗敏整理）

作者附记：我采访周桔生老人时，他已卧床不起，说话困难，口述本文所叙史料时语音微弱。为求内容真实，我曾去北京海军司令部党史办，查阅了一份有关肖老童年的资料。其上说：“每天清晨，母亲就送哥哥们上岳麓山打柴。”“那时岳麓山是庙里管，上山要是碰到和尚，不仅抢走柴，还要挨打骂。”“家境稍好一些，母亲和大哥商量，送我进了一家私塾”。两相对照，周桔生老人并未虚言。

还是祖国好

——回忆李铁铮和周世钊的交往

陈明新*

周世钊和李铁铮是南京东南大学的老同学，他们之间关系甚密，感情甚好。1964年李铁铮从美国回国定居以后，他们两人的交往更多。周世钊每次到北京开会，总是抽时间去看望李铁铮。而李铁铮除了回访以外，每次都要在家里或在饭店设宴招待周世剑。聚会时，他们总要进行长时间叙谈，叙谈的内容很宽很广。我前后任周世钊同志的秘书十八年，对他们谈话的内容多有了解。现在我就记忆所及，将他们叙谈的内容及我所了解的李铁铮的情况，分成十个方面写在下面。

一、李老简介

李铁铮同志190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他以优异的成绩在长沙市读完小学和中学后，先后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文学院、南京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1927年在中央大学读书时，他被选为南京市学联主席兼组织部部长。1928年从

注：陈明新现任省政协办公厅老干办主任、曾任周世剑秘书多年。

中央大学毕业后，通过湖南行政官吏考试，他被派任为湖南省南县县长。1931年他参加国民政府外交官考试，获第一名，从此他进入旧外交界。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专员、科长、驻兰州外交特派员。1941年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简任秘书、驻伊朗公使兼驻伊拉克的公使。1945年任驻伊朗大使，1946年任驻泰国大使。1949年3月，任国民政府出席联合国非自治地特别委员会大使衔代表。在国民党统治全面崩溃、新中国诞生前夕，他拒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社经理事会代表，毅然脱离国民政府，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并后任该院研究员，获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先后任美国希利亚大学、理海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哈特福德大学荣誉客座教授、永久正教授。

1964年李铁铮从美国回国定居。历任北京外交学院教授、名誉教授、欧美同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全国侨联委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中国国际法学会顾问、中国新闻社名誉理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六、七届委员、常务委员。他于1990年1月2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李铁铮是一位向往光明和追求真理的著名的爱国人士。

二、同窗东大

李铁铮同志与周世钊同志，于1925年至1926年相识于南京东南大学。周世钊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最友好的同学，也是在一师“人物互选”活动中得票仅次于毛主席的好学生。周世钊在一师毕业后，曾在长沙市的楚怡、福湘

教书，后来到南京东南大学进修，攻读教育学和文学。由于周世钊在进大学前曾在湘任教多年，他比李铁铮在年龄上要大十岁，所以李铁铮总是称周世钊为“学长”或“学兄”。

1964年李铁铮自美回国后在长沙市教育街53号见到周世钊时，李铁铮紧紧握着周世钊的手说：“学长好！学长好！今天能在家乡土地上见到阔别多年的学长身体仍然康健，我的内心非常高兴！”李铁铮问我说：“秘书先生贵姓？”我回答说：“小姓陈。”李铁铮说：“学长身为政府要员，出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的副省长，就住这么样的房子啊？”他又接着说：“中国的省就是美国的州，中国的省长和副省长，就是美国的州长和副州长。美国的一个州长和副州长，他们住的房子那就要好得多、宽得多。”我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我想将来会有好房子住的。”李铁铮说：“秘书先生言之有理。”

后来我常听到李铁铮关于周世钊的溢美之辞：学长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的时候，生活上就非常注意俭朴。那时他是工作了一个时候，在长沙教了好几年书才去南京读大学的，按理说他在经济上无论如何要比我们好一点，但是他生活俭朴，而在学习上他非常用功。由于学长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因此，他在大学读书时，政治上也非常老练。他的求学精神和他那种待人接物的谦逊风度，受到了同学的好评，赢得了同学的称道。我是受学长教益最多的一个。因此，我们离开以后，尤其是我出国以后，虽然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书信联系，但我心里一直是想念他，敬佩他。

三、南县县长

李铁铮对周世钊说：“学长解放前教书几十年，成绩斐然，真是桃李满天下。今天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湖南省人民委员会的副省长，您从教育界转到了政界，可喜可贺啊！”周世剑说：“在这方面我就不如您啊！我记得您在南京东南大学毕业后，二十二岁就当上了湖南省南县的县长。您在南县的时间虽然不太长，但您在那里做了不少好事，也是值得敬佩的啊！”

李铁铮说：“学长言过其实，那实在不值得一谈。在旧社会，毕业就是失业，1928年我在南京东大毕业后，无事可做。我想托人介绍到湖南省教育厅找点事做，但没有效果。正好在这个时候，报上刊载湖南省政府实行县长考试，为了混个职业，我立即去报名应试。那次会考，共考取县长46名，我列第9名，后来经过考院复核，又把我列为第4名。发榜后，我被省政府任命为洞庭湖滨南县的县长。那时我才22岁，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年幼无知，深感责任重大。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我特地请了几个在县政府工作过多年的富有行政办事经验的人来帮我的忙，薪金由我个人支付，不要公家开支。

我到南县任县长后，我常到群众中去走走，我喜欢做群众工作，也确实做了一些发动群众的工作，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南县县党部认为我这个县长是侵犯了他们的职权，他们对我很不欢迎。有一次，他们送来了十几个孩子，他们说这些小孩是共产党的少先队员，要求我按照清乡条例处以死刑。我看到那些小孩实在可爱，将他们处死实在可悲，我把

他们都放走了，这就更增加了县党部对我的不满。如果学长说我在南县做好事的话，这算是我在南县当县长时所做的第一件好事。1936年夏天，我从英国回国，从南京乘船到武汉返湘时，船上一个乘客走到我面前，称我是他的救命恩人。后经了解，他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南县人，放暑假回家，他就是我当年释放的孩子中的一个。”

周世钊说：“古人说，善有善报，看起来李先生年轻时就倾向于共产党！现在您上了年纪了，又从美国回到中国来定居，来为人民服务，这可说是您年轻时期本来面目的真实反映啊！”

李铁铮说：“学长过奖了，老实说，我在南县当县长时，因为年纪太轻，确实什么也不懂。可是那时我认为县党部那些党棍也是一群蠢猪。对有点爱国心而进步向上的孩子就心狠手毒，但对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一次南县清乡队第一队队长欧正元在乡下查出一个青年，他对我说，这个人是四川人，不是本地人。他白天帮助农民车水干农活不要钱，晚上一个人夜宿在破庙里。这个人很可能是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分子，要我处决他。后来经过我亲自审讯之后，那个人供应姓尤名凯，是四川人。中共派他来担任湘西特委，他对我谈了他对时局的看法，谈了他的政治观点，他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引起了我的思想斗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摆在我这个国民党县长的面前怎么办？这个共产党员还不是一般的共产党员，而是共产党员的一个干部。是杀他还是放走他？当时在我的思想上作了一番斗争。如果我放走了他，国民党县党部知道了真实情况，不仅对我要撤职查办，而且很可能会置我于死地，这是很危险的。按照国民党对共产党格杀勿论的清乡条例，如果我把他的口供报上去，他一定要遭杀头处决，我则可记功和领赏。当时我想，我和他都是青年人，而且都是中国的青年人，只是政治观点和政治信仰的不同。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着想，无辜牺牲一个吃苦耐劳的青年人，实在是国家和民族的一个损失，论人情与道理不应当，我考虑再三决定把他放走为好。为避免门卫的盘问，我象送客一样亲自将他送出大门，让他安全地走了。”周世钊说：“这是您在南县所做的又一件大好事，也是您思想进步的又一个表现。”

李铁铮说：“学长，与其说我是进步，不如说我是同情所致。但是事后不久，不幸的事发生了。在一个冬干水浅的时节，有一人家在做饭炒菜时不小心，倒翻了油锅，由于天干地枯风大火急顷刻燃烧一片，很快就烧到县城内，烧毁了半个县城。我带领群众经过极大的努力，才将这场大火扑灭。可是县党部拿这件事作为借口，说这是共产党放的火，归罪于我，他们向省当局控告我。结果我就落得一个‘庇共殃民，撤职查办’的下场。”周世钊说：“您这是光荣之至，没什么不光彩的。”李铁铮说：“我在南县的时间不长，没有对南县人民作出什么贡献，但我问心无愧，我在南县确实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民的事。将来有机会，我还想到南县去看一看。”李铁铮先生在八十年代的一个春天，返湘祭扫父母坟墓之后，在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的同志陪同下，他到南县去了一次。南县县委统战部热情接待了他。面对南县解放后工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和南县城市建设的巨大变化，李铁铮深有感慨地说，“南县解放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再一次证明，共产党真正伟大，南县人民真正伟大。”

四、出任大使

周世钊说："我记得李先生的光荣之举不只在南县一处，还有您出任泰国大使之荣啊！"李铁铮说，那根本不值得一提。我于学校出来从政在南县受到打击后，感到国民党腐败，政治黑暗，官不可做。决心重返校园。在赴京路过武汉时，我去拜见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先生和政治系系主任王鲠生先生。我向他俩谈到任南县县长的遭遇后，他们两人都对我说，你既然不再搞政治，你又何必去政治中心南京呢？还不如留在我们这里帮忙好些。在他们两人的热心劝说下，我就留在武汉大学担任法学院助教。1931年夏天，我考取中国第一届高等考试的外交官领事官，于是我就投入外交工作的行列了。在旧中国的外交界，我混了十九个春秋。在外交部，我当过专员科长、首席简任秘书，在国外，我当过驻英国大使馆的秘书、驻伊拉克公使、驻伊朗和泰国的首任大使、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兼任大使衔代表。但是，国民党党内派系斗争非常激烈，经常是不论是非，不择手段，殃及无辜，不论在行政界和外交界均所不免，我几乎成了受害者。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外交使节增设与调动甚多，我是考试出身的正式外交官，是受到法律保障的。不管外交使节如何增设，也不管外交人员如何调动，更不管他们如何勾心斗角，无论如何在外交界总有我的一个席位。当时我想调往工作量较少的拉丁美洲国家，如阿根廷或巴西去工作，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多看一点书，多增长一些知识。

李铁铮说：1946年夏，外交部要我出任驻泰国首任大使。但我那时还不到四十岁，深感资历太浅，经验不足，不敢赴任。

外交部向蒋介石如实呈报后，蒋亲自接见了我一次。蒋对我说："任命李兄为我国首任驻泰国大使，这既是外交部的旨意，也是我蒋某的旨意。我相信李兄有能力胜任此职，有办法解决问题，因此你尽管大胆前往任职，有任何困难我帮你解决，特颁发一电话本给你，有什么事情你直接与我联系。"就这样我勉强奉命就任中国驻泰首任大使。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泰国国内因为国王身死，政局动荡不安，曼谷发生了一起枪杀华侨于闹市耀华路的血案，三百多万华侨对此很有意见。为了做好工作，我到曼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各领事馆的领事开会。当时一些资历深、年岁大的老外交人员根本看我不起。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在会议进行中，我用蒋介石颁发给我的电话本直接给蒋介石打电话，将会议进行情况向他如实呈报。蒋叫我找了一个在泰国工作时间较长的老领事接电话，蒋介石对那个老领事说，铁铮乃海内人才，要他就任驻泰大使是我的旨意，请你转告所有驻泰领事及其他外交人员，都得听从铁铮的指令，不得有误。那位老领事听了蒋介石给他的电话后，急忙走到会场，恭恭敬敬地站立在蒋介石肖像前对大家说，蒋委员长有令，他将蒋介石在电话中对他讲的那段话如实传训，然后他很客气地请我向大家训话。这时我也不得不谦虚一二，请大家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共同搞好工作。就这样我算是在泰国首任大使这个职位上站稳了脚根。紧接着在泰国我做了两件使三百万华侨、尤其是在曼谷的四十万华侨满意的事情。一件事是在泰国动荡政变期间，我通过外交途径得知泰国海军要炮击曼谷时，我设法保护了华侨的安全；另一件事是我设法保护了华侨在泰国传统经营米业的权利。我在泰国出任大使三年，工

作虽然做得不好，但华侨对我是满意的。1958年冬天，我以理海大学教授的身份路过曼谷时，泰国华侨侨社得知我来泰的消息后，特为我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在宴会上，新中国派任驻泰大使杭立武也在座。他对我说“这是到泰任职以来参加的最盛大的一次宴会。”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离职十年了，泰国华侨仍对我如此盛情，使我感激万分。周世钊说：“您在泰国为华侨做了好事，他们自然不会忘记您的，岂有知恩不报之理？这是您在泰国任大使的功绩，是您的光荣。”

五、还是祖国好

周世剑问：“李先生您在外交界干得很不错，怎么后来又到美国的大学去当教授呢？”李铁铮说：“在学长面前，我是无话不说。回顾我的一生，碰过好运，也遭受过打击。到目前为止，在我这一生中，我觉得算得上转折关头的应该有三次。第一次是1923年。我从中学毕业，成绩在班上名列第二。第一名叫蒋家栋，他的父亲在邮局当邮务长。正好是我中学毕业的那一年，邮局要招考邮务员。一天我到蒋的家中，他的父亲对我们说：‘你们两人中学已经毕业，成绩都不错，现在我们邮局要招考邮务员，月薪是六十八万，相当于一般店员工资的十倍，我看你们两人可以考上，你们赶快去报名应试吧！’我和蒋家栋商量的结果，是未遵其父命，决定同去南京报考大学。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我们想，如果考取邮务员，则终生就只能在邮局内打滚，没有什么意思。现在看来，放弃报考邮务员是理智的，否则我可能至今还是一个邮差。第二次就是1928年，我被国民党南县党部指控庇共殃民而撤职。我想如果那时继续留用，我可能由一县调另一县，也许还可能有些名声，高升一步，也许就是一个巡吏，终身于官僚圈子里渡日，当然也可能遭受更大的冤枉，不仅是撤职而已。第三次就是今年（1964年）夏天。我1931年投考外交官，其目的不是想混个外交官，而是为了出国深造。所以我在旧中国的外交界混了十九年之后，有了一点声望和地位，我觉得再混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于是我就弃官赴美求学深造。我在美国的哈佛、理海等大学当了教授，我觉得当教授比当外交官好。因为第一教授这个职位是终身的职位，它不因易职而被弃之，也不因相互勾斗而被人所贬，第二它有很多的时间看书深造，所以我很热爱教授这个职位”。

周世剑说：“您在美国赫赫有名的大学教书，是一位国际上知名的大教授，工资高，生活优裕，您为什么要回国呢？”李铁铮说，如果光从生活来说，一点也不错，美国要比中国好得多，因为美国是一个搞了一百多年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又发了战争横财，但是学长没有尝过生活在异国他乡之味就不知其苦。华侨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受人欺侮的事多得很。我们这些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一遇到这类事情，就很自然地想到祖国，就认为还是祖国好。那怕是祖国再穷，她是自已的祖国，何况穷和富不是一成不变的，新中国现在是比较穷，我相信将来会变富的。解放才十多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看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虽然是要低一些，但是比起旧社会来说，那就要好得多了。正是祖国的变化，

才使得我决心回归祖国。周世剑说："我听了您的肺腑之言，觉得您是一位了不起的爱国义士。"（两人哈哈大笑）周世剑又问："您是怎么回来的啊？只您一个人回来，小孩不跟您回来啊？"李铁铮答道：我这次回来，事先没有和中共的统战部门和中国驻外使馆联系，我是以教授的身份，借暑假旅游之名，绕道法国回国的。事先本来相约我的小儿子寄美一同回国的，但是后来发生了意外，只好我独自一人回来。我带着寄美到了巴黎以后，就去中国驻法大使馆拜访，开始接待我的是位一般干部，他把我引入客厅。我向他介绍了我在美国的身份，并说明有意回国后，换了参赞王平来见我。我和王平参赞谈到我过去在旧中国外交界的经历之后，他即介绍我与黄镇大使见面。他们欢迎我回国，但要我在巴黎等候与国内取得联系。就是我在巴黎等待中国驻法大使馆通知我回国日期的时候，寄美的母亲突然也来到巴黎，把寄美带回美国去了。爱子离去，我很苦恼，我今年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了，上了年纪的人，回到祖国未必还有多大的用处，于是我相约寄美一同回国，他也很愿意回到祖国来为人民服务。寄美这个孩子很聪明，我想他回到新中国来，定能为国所用，那知今日我的愿望已经落空，心里很是难过。中国驻法大使馆对我非常关心，晓得我的情况后，设法消除我的伤感，于是他们就介绍我搬到外交部街的大旅社居住。过了两天，我和家里打通了长途电话，得知他们母子安返美国，我的情绪才恢复了正常。很快我就接到大使馆给我的回国通知。大使馆对我非常客气，黄镇大使亲自为我设宴饯行，并为我购买好经莫斯科回北京的机票。我乘机到达莫斯科以后，在中国驻苏大使馆有关人员的热情陪同下，游览了

红场和列宁墓。第二天我就飞抵北京，外交部对我非常热情，他们派了过去驻缅甸大使起义回国的涂允檀先生、驻法国公使起义回国的凌其翰先生到北京机场来迎接我。我从飞机走出，见到了离别多年的祖国，见到了新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祖国的首都北京，见到了老朋友……，心中万分激动，我沿扶梯走到地面，我连忙俯首弯腰取了一把国土用口亲吻。我回到北京后，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有关负责同志都来看我，都设宴欢迎我的回来。我过去的一些老同事，知道我回来后，也都来看我，他们都欢迎我回来，请我到他们家中作客。听说党和政府还要给我在工作和生活上作适当的安排，我感到非常愉快，非常温暖。在美国我虽然工资高，生活优厚，但是在那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金钱关系，生活起来很空虚，很孤独，生活再好也没有什么意思。在美国儿女长大成人后就分居，独立生活，老子到儿子家吃餐饭也得给钱。老子病了，或在家里，或住医院，儿子能卖束鲜花来看看就算是了不起了，那能比得上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敬互爱的平等的同志式关系啊！我这次弃职抛家孤身一人回国，党和政府欢迎我，老朋友和老同事欢迎我，我在国内的儿女们欢迎我，我的学长欢迎我，现在看来，我这一着棋走对了。在国外生活时，我就长时间的认为，还是祖国好。现在事实证明，确实还是祖国好。

六、主席伟大

1965年春，周世钊到北京去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周世钊去看望李铁铮，作为李

铁铮1964冬专程到长沙拜访他的回访。进屋后李铁铮对周世钊说："学长来得正好，本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结束以后，专程请学长来寒舍叙谈就膳的，今天就请学长和秘书同志在舍下吃顿便饭何如？"周世钊说："遵命不如从命，那就听便吧。今年的两个大会开得很好，您也参加了全国政协的会议，我想您也应该有此感觉吧！"李铁铮说：是的是的，我这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参加如此重大的政治性会议。在人大会议开幕的那天下午，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全体同志，列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在会上我有幸看见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公认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但是看得很不清楚，我对学长有个要求，不知学长可否允认？周世钊说："凡是我能做得到的事，您就尽管提，我一定尽力为之"。李铁铮说："我那个心爱的儿子寄美，今年不来，明年一定会从美国来看我。去年到长沙去看望学长时，我就跟您说过，寄美这个孩子对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有着和一般人不一样的感情。我俩本是相约一同回国的，只因他母亲的阻拦，愿望未能实现。寄美来北京时，我请求学长带着我们两人一同去见一次毛主席。"周世剑说："要求去见毛主席，这是好事，但又是难事。说好事，是说明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尤其象寄美这样在美国生活的小孩也想见毛主席，这说明毛主席确实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民的领袖，而且也确实是全世界人民公认的领袖。我想毛主席对于您的大名，对于您的为人处事，他是早有了解，如果您的儿子来北京看您时，适逢我又在北京，我可以给毛主席写封信，要求去见他一面。这就好事而言。说难事是因为见毛主席确实很不容易。我和主席是同班老同学，因此我

们之间较为熟悉。我每次来北京开会，都能见到他一次，但是也很不容易啊！我是每次会议将要结束之前的一个星期，我就给主席去一封信，要求他安排时间和我叙谈一次。我每次给主席去信后，我就要在每天下午和晚上守候电话，等候中央办公厅来电话通知我去见主席，如果接不到电话，就会失去机会。见主席真难啊！"

李铁铮说："承学长关照，认允学弟的要求，可喜可贺。主席伟大，我是从三个方面认识到的。一是从他和蒋介石斗争的问题上认识到，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斗争；说国共两党和谈，实际上也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人之间的谈判。蒋介石这个人老奸巨猾，有一套为人处事的哲学。在国民党内部，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是常有的事，也有一些人想搞他，但是谁也没有本事和能力把他搞倒。只有毛泽东才有本事把他搞倒了，如果不是因为蒋介石及时逃到台湾的话，蒋介石定会成为毛泽东的阶下囚。一支只有小米加步枪，在数量上远不如对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居然把用世界上所谓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装备武装起来的蒋介石的八百万反动军队打垮了，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情啊！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这是主席伟大的一个方面。二是在朝鲜战场问题上认识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战争的创伤还来不及医治，就要和帝国主义列强打仗，这不可想象。过去毛泽东和蒋介石斗，实际上是毛泽东间接和美帝国主义斗。在朝鲜战场上斗，就是毛泽东和美帝国主义面对面的斗。面对当时的现实，没有伟大的战略军事思想，没有伟大的军事胆识，没有伟大的英雄气魄，那是不敢和美国面对面的斗

的。我听说当时在中共中央的内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很不统一，有的人不主张打，有的不敢打，经过毛主席再三做工作，才统一了思想，中共中央才作出了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周世钊说：“1950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来见毛主席时，毛主席跟我很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跟我说，中国急亟进行经济建设，我们不愿意打仗，但是人家要来打你，而且想要把你打倒，你怎么办？是让它打呢，还是和它对着打？我就选择了后一种办法。这就叫做逼上梁山。毛主席把当时敌对双方各个方面的因素作了极为详细的分析，他认定美帝必败，我们必胜。您说当时在中共中央内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太统一也是对的，毛主席当时也跟我讲了这个问题。但是毛主席用他的思想统一了大家的思想，用他的认识统一了大家的认识，所以最后党中央才作出了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派志愿军到朝鲜和朝鲜人民军共同抗击美帝侵略的正确决定。”李铁铮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到朝鲜，和朝鲜人民军共同作战，仗打得非常漂亮，很快就把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最后逼得美国不得不坐下来和中国和谈。事实如此，中国胜利了。”周世钊说：“朝鲜战场上这一胜仗，我们是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啊！”李铁铮说：“学长说得对，学长说得很对。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后，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大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看法也大大地不同了。我们这些当时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无不感到自豪，无不感到高兴。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创造奇迹，居然把号称为世界上头号强国的美国打垮了。三是从解放后这十多年的变化发展认识到主席的伟大。回国以后，我到一些地方去参观学

习过，所到之处，真令人欢欣鼓舞。我认为中国解放后十多年来建设的成绩是伟大的，虽然从国民收入来说，我们还比不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从增长的速度来说，我们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快得多。我们不能用十多年的成绩来和人家一百多年的情况相比，中国能够发展到目前这个样就很不错了。象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党和政府安排我为外交学院的一级教授，工资是一级教授的最高一等，在政治上，党把我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我从心里满足和感激。我们现在是处于建设的起步阶段，万事开头难啊！我认为人民要了解这一点，才能体谅政府的困难，大家才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鼓起勇气，把工作搞得更好，把国家经济建设搞得更好。我对现实生活的看法，在学长面前，不会讲假话。我现在住的是华侨公寓，目前在北京来说，算是最高级的房子。虽然只有一套房子，但比较宽，很够我用，也很舒服。再说坐汽车，虽然我自己没有小汽车，但我这里乘公共汽车很方便，如果有事需要坐小汽车，公家也可以给我派车。我认为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一个破乱不堪的旧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能够改造到这个样子，全国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所以我常说主席伟大啊！主席真正伟大。”

七、文革期间

有一次，周世钊到北京开会，李铁铮请他到家作客。他们两人就‘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进行了交谈。李铁铮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就到美国去了，不知学长在

运动中受到冲击没有？”周世钊说：“我是个党外人士，没有管什么具体工作，所以就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冲击，只是红卫兵抄了我的家。湖南省委的其他副省长，大都挨过批斗，我算是幸免此难。长沙‘六六惨案’后，我就和老陈一起到了北京。先住在王海容同志家里，后来住到北京饭店。毛主席接见我以后，他送了我两千块钱，给我和老陈两人作生活费。他叫我在北京多住一个时候再回长沙，那时长沙武斗搞得凶，我确实不想回去。后来中央对湖南问题表态后，成立了省革委会，我才回到湖南。”李铁铮说：“听说中央当时对湖南问题的表态是支一边，压一边，不够公正啊！”周世钊说：“毛主席接见我时，他对湖南问题的看法，根本就不是后来中央对湖南问题表态的那个调子。他说湖南的‘工联’和‘高司’两派都是革命群众，两派要联合起来，要团结起来。但是中央对湖南问题的‘七·二七’表态，支持了‘工联’，压了‘高司’。对此当时我很不理解，后来我才知道，是‘四人帮’插了手，是‘四人帮’搞了名堂的结果”。李铁铮说：“我是个湖南人，对湖南的问题，我理所当然是比较关心的。虽然我当时没有在湖南，没有加入哪一派，但是我是有倾向性的，我同意‘高司’的观点。学长啊，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接见您那一次，谈了些什么问题啊？”

周世剑说：“因为文化大革命，有几年我没有见到主席，所以那次一见面，我就陈述了自己的遭遇。毛主席笑着对我说：‘我看这红卫兵还不简单啊，您这样一位堂堂的副省长，他们也居然敢于上门去抄您的家。抄了就抄了，没有关系，被抄的书由我来负责赔偿。’还没有等我向他汇报，

主席反而对我谈起了长沙‘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情况，他了解得比我们还清楚。我问主席为什么对长沙的情况了解得如此清楚，他说：‘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嘛，会有人向我汇报’。他指着放在办公桌上的一堆小报说：‘我还可以从小报上了解情况嘛！’您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才去美国的，您挨过斗争没有啊？”李铁铮说：“‘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没有被揪出参加游斗，也没有被关进牛棚，外交学院也没有成立专案小组对我进行审查，但家也被抄了。有人说我是被保护的对象，那不符实际。只有李宗仁、张治中、章士钊才有格被保护，我那里够保护的格。现在回想起来，‘文化大革命’我幸免一斗，我认为可能有五个原因。第一，我是个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外交学院的党员特别多，而且大都是经过多年考验的老党员，能按照党的原则办事，对我这个党外人士还是给予了照顾。第二，我是‘文化大革命’前一年才从美国回来的，我回国只一年多，与外交学院的人接触不多，我想别人对我也不太了解，加上我又是住在院外，更少引起别人讨嫌的机会。学院员工都知道我是放弃美国高薪回国来院任教的，在所谓贪图享受资产阶级生活的问题上，他们对我是无言可责。第三，我家乡的住屋，毁于‘长沙大火’，1946年我在泰国任大使期间，我以工资收入在长沙又建了一栋房子，房屋建好后，我只于1948年住了一个时候就走了。解放后交给政府代管，我未收分文租金，因而未得房主的罪名。第四，外交学院照例在暑假中安排教授们去北戴河等地休息数周。1965年轮到我去休息，我把这个指标让给了别人，此举也是群众对我好感的一个因素。第五，我为外文系翻译了一些东西，所得稿费，全都上交给

教研室。‘文化大革命’时，大斗知识分子工作外的‘单干’风，批评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我则因为未收稿费，幸免挨斗。有人曾对我说，我是在外交学院中得到老中青员工好感的教授。这决不是我在学长面前为我自己脸上贴金，而是说明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我是外交学院中被外查外调最多的一个人。”

“有一次，两个从上海来的姑娘，大约都是二十岁左右，一进我的屋，就要我和她们两人一起共同读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对我说：‘我们掌握了材料，我们知道你和张瑞芳的关系密切，有所馈赠，你要老实交代。’我听后一笑，她俩更厉色地对我说：‘你的态度要严肃一点，你为什么发笑？’我说我实在忍耐不住，并非不严肃。张瑞芳这位鼎鼎大名的表演艺术家，我只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的一次宴会上见过她一面，我记得在座的有刘错等十多人。宴会后张瑞芳请我跳过一次舞，我利用她在话剧中的台词，向她说了几句恭维话，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和她见面了。有何密切关系可言啊？我当然对她们的质问发笑。她们要我写书面交代，我随笔一挥就将那两个女孩子打发走了。还有一次，也是两个人来找我调查，而且是两个穿着军大衣的大汉子。这次外调不仅使我发笑，而且使我发怒。那两个人向我调查三十年代在英国伦敦的同事任振威的问题。我告诉他们，任振威是湖南湘阴县人，她在长沙周南女中及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就以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出名。在英国时，我知道她是共产党外围组织反帝同盟在英伦的负责人。她从美国回国后在西北搞抗战时期的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表现非常进步。这是我在兰州知道的事情，我对那两个人说：‘我敢断言，任振威决

不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那两个人听了我的讲话后对我大发雷霆，简直把我当作专政对象。他们以教训的口气对我说：‘你知道吗？任振威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分子。’我回答说：‘我回国不久，学习时间短，水平低，如果我看见红旗说成是白旗，那是我撒谎犯错误。如果我看见红的说红的，那有什么错误啊！你们说任振威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恕我无法辩别。’那两个人硬要我按照他们的意思写一个书面材料，我严厉拒绝，非但如此，我是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语录予以驳斥。我对他们说：‘毛主席于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你们不是要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按毛主席的指导办事吗？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我说的你们不采纳，而偏要由你们主观决定如何写，你们这样做不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不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吗？再说你们要这样做，又何必来外调呢？那就由你们写嘛！’那两个外调人员听了我的话后，哑口无言，只好气冲冲地走了。”

周世钊说：“关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笑话，我也可以举两件事例讲给您听，一件是我自己的，一件是别人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来抄我的家时，他们以为我家里有好多东西，来了一些的红卫兵。除了抄走我壹万多元人民币和一些旧书外，其余就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后来他们问我还有什么好东西没有，我说再也没有了。他们不相信，于是就在我家翻箱倒柜。当他们找出一件很好的狐皮大衣时，我的婆婆告诉他们说，这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到北京，

毛主席送给我的，老陈证实后，他们又不敢拿走。当他们在箱底里翻出毛主席给我的一大堆信时，他们看见毛主席给我的每封信的开头都称我为兄，有两个红卫兵就对我说：'周士钊，我看你硬是个走资派，而且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毛主席年龄比你大，你要毛主席称你兄，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啊？'对于'红卫兵'这些无知的追问，我也只有付之一笑。另一件事就是关于唐生智的事。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中共军委派两个身穿军服，腰带手枪的'解放军'到长沙向唐生智调查贺龙同志的问题。他们对唐生智说，贺龙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三反分子。他们要唐生智写出贺龙同志在南昌起义等时期的反革命事实。唐生智对他们说：'我不知道贺龙有些什么反动的事实，我只知道贺龙很多革命的事实。我认为贺龙是个好人，而且是一个一贯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好同志。他决不是坏人，他决不是个反革命分子。你们既然认定他是个反革命，还找我唐某来调查干什么啊！'那两个人听了唐生智的讲话后，非常恼火，气势汹汹的对唐生智说：'唐生智，你要放明白点。我们两个是中央军委派来的，你要放老实点。'唐生智笑着对他们说：'中央军委我唐某又怕什么啊！我跟你们再说一句，我可以肯定地说，贺龙是个好人。'唐生智把衣服一撕，挺着胸膛说：'外调的，材料我就是不写，你们不是带了手枪吗，有种的就对我胸膛开枪。'那两个人毫无办法，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后来党对唐生智这一举动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坚持原则，做得很好。您和唐生智一样，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真不简单。所以您这次从美国回来后，党把您安排

为全国政协的常委啊！这是您进步的表现啊！"

李铁铮说："'进步'二字，学弟受之有愧。一次我参加外交学院的批斗会，有一位被批斗的教授姓刘。据调查所得，他在李宗仁主持的北方行营担任过月薪同上校相等的翻译主任，大家要把他定为反革命分子。理由是根据有文件规定凡是在国民党内任过上尉连长以上职务的都算是反革命，刘教授是上校，斥之为隐瞒罪恶历史的反革命完全应该。在那次批斗会上，我出来为刘教授辩护。我说：'据我所知，在国民党的编制里，月薪与上校相等，但实质与实职上校有可能完全不同。如军医上校，其服务性质难道应与一带兵作战的上校团长相提并论吗？'我的辩解为大家所接受，没有给刘教授定为反革命，我感到荣幸之至。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果，我们党给它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周世钊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同意您的看法。1964年我们的国家可说还算是处于苦日子的时候，您居然回国来；'文化大革命'当中，被迫到美国去了，打倒'四人帮'以后，您又回来了，您的行为可贵啊！"李铁铮说：我还在美国的时候，就听到有人说我李某不会再回来了，说我1964年回国是想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是想捞取政治资本……。我李铁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学长对我是很了解的。我1964年回国，抱着为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回来的。因此，我李铁铮对于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我从来是兢兢业业的。在外交学院，我教的调干班，出了一些高才生。他们毕业后分配在国内的外交机关和驻外使馆，工作都干得很出色，许多人给我来信，感谢我对他们的教育。在工作之余，我还经常应有关单位的要求，翻译一些

外文资料，一概不要稿酬，实在难于拒绝的，我收下来以后就将经费交给学院教研室。也许有人会问，你李铁铮如此进步，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又跑到美国去了呢？当时我想，反正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与其成天应付外调人员，不如回到美国去做点事、看点书。现在‘四人帮’被打倒了，可以开展正常的工作了，因此我又回来了。1964年我是抱着报效祖国的心愿而归，这次我仍然是抱着报效祖国的思想而来。我从心底里热爱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热爱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的中华民族。现在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我认为恰恰相反，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八、对党直言

在我陪同周世钊和李铁铮的多次接触中，我认为李铁铮同志是一位性格开朗、直来直去的忠厚老实人。不论对什么问题，是非曲直，无所隐瞒。他是一位在我国外交界资历颇深、专门研究国际关系学的爱国人士。就我所知，他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以他对时局的见识，就国际外交方面和我们国内经济建设方面，向党中央和有关单位提出多次书面的或口头的建议。有些被党和政府采纳，有些转有关单位参考。

1983年4月，李铁铮返湘扫墓，组织上安排我接待他。在他下榻的宾馆，他就当时的国际和国内问题，跟我谈了如下五个观点：

一是主要危险，不是苏联。李铁铮说："中美建交，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伟大胜利，是美国孤立中国外交政策的彻底

失败。美国之所以要和中国建交，是因为美国已经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巨人，中国是一个大国。世界的重大问题，没有中国到场，没有中国表态，根本就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基于它本国的利益和它的全球战略的需要，才决定和中国建交的。我们每个中国人必须明确，美国对中国是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它希望我们中国内部出乱子，以便达到其分治的目的。中美建交以来，从中国有些领导同志的说话来看，好像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朋友，苏联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因此，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上，采取了对苏硬、对美软的态度。老实说，我是根本不同意这种观点的。我认为苏联不管它怎么坏，它仍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不管它如何对我们友好，它毕竟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到处侵略扩张，是帝国主义的本性。今天在全世界各地，到处搞侵略扩张、到处搞颠覆活动的，主要是美国，而不是苏联。可是，我们党中央的有些主要负责同志，老是说今天世界上的主要危险是来自苏联，而不是来自美国。今年3月1日，是中苏恢复第二轮谈判的第一天，就是在这天上午，我们的赵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他访问非洲十国的报告时，他在会上大讲特讲今天世界上的主要危险是来自苏联，而不是美国。赵总理这样讲给苏联是个什么印象呢？这对中苏谈判又有什么好处呢？我认为赵总理在那个场合，在那个时候公开这样讲，是不明智的。到底美国是我们的朋友，还是苏联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可以从一些事实来看一看。苏联最近有三个公开宣布，一是公开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二是它步中国的后尘，公开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三是它公开宣布要逐步从中苏边界、从阿富汗、从柬埔寨撤军。可是美国

呢，它根本不敢说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它到处搞侵略扩张、到处搞颠覆活动。美国的这些活动，既是针对苏联来的，也是针对中国来的。美国长期干涉中国内政，'胡娜事件'，是美国搞的，'王炳章事件'，也是美国搞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最近在南朝鲜搞什么联合军事演习，把它的两艘最大的军舰'企业号'和'中途岛号'摆在南朝鲜，这完全是针对中国来的。那种以苏联划线，认为苏联的朋友，就是中国的敌人；苏联的敌人就是中国的朋友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今天的世界，主要的危险是美国，而决不是苏联。"

二是政策落实，只见在报上。李铁铮说："我从上海到武汉，在和有关人员谈到落实政策时，特别是谈到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时，很多人说，现在落实政策的情况是，喊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嘴巴上，落实在各地的报纸上。有些地方的报纸报导说，落实了百分之几十几十的政策。其实到基层一看，有许多问题根本没有落实。"

三是先讲毛错，再讲其他。李铁铮说："现在有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好像不论在什么场合讲话，总要先讲一通毛主席的错误，再讲别的，就感到光荣。尤其是有些党内的老同志，诉说他们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如何受迫害，说毛主席如何如何不对。我认为这是一种极不好的现象。在对待毛主席的问题上，现在出现了三个主义，一是'非毛主义'，二是'贬毛主义'，三是'鞭毛主义'，这三个主义合起来就叫做'倒毛主义'。我认为毛主席在后期是犯了错误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给它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文革'是一场浩劫，是一场灾难，是

内乱。党中央对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有些人把'文革'的过错，完全归罪到毛主席一个人身上，我认为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共中央不是作出了关于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吗？而且还发了一个'5·16'通知吗？如果当时中央的其他同志个个都反对，都不举手，我看毛主席也未必坚持非搞不可。现在出了问题，就把责任往他一个人身上堆。在对待毛主席的问题上，只有我们的邓老（小平）站得高，看得远。据我所知，有一次一群意大利记者访问他，问他对待毛主席要如何评价，邓老回答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邓小平，就没有新中国。'邓老这样一讲，给了国际上非毛思想一个回击，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认为毛主席是有严重错误的，但他老人家的功劳是巨大的，是第一位的。海外华侨，无不为我们中国有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而感到自豪。如果我们倒毛，在国内外都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因为毛主席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他老人家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这点我可以举出国内外的三个例子来说明。如毛主席逝世后不久，我随同全国政协组织的学习参观团到农村去参观学习。农民家里还是挂着毛主席的像，我问一位农民，您为什么这样热爱毛主席？那位农民回答我说：'因为毛主席领导我们打倒了地主阶级，分得了田地，如今我们才有饭吃、有衣穿，因此我们热爱毛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现在已经离开了人间，但我们还是要挂他老人家的像，我们绝不会忘记恩人。'又如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三千多万海外华侨无不感到光荣，无不感到自

豪。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的站起，给了海外华侨巨大的鼓舞和支持。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海外华侨也从此站起来了。因此，可以这样说，海外华侨对毛主席的拥护、与国内人民对毛主席的拥护，是完全一样的。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对于毛主席也是非常拥护的。因为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成功的事实，给了他们鼓舞和力量，所以他们也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我们说，毛主席的形像，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像，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形像。如果我们倒毛，实际上就是倒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倒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我记得长沙'五一'广场原来有个毛主席塑像，湖南为何要把它拆掉？如果原来没有，现在要建，那就大可不必。已经建起来了，为什么要把它打掉呢？"

四是搞活经济，贵在自立。李铁铮说："现在我们搞四化，党中央提出，要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引进技术，搞活经济。对于党中央的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我认为要搞活经济，贵在'自立'。因为世界上没有善良的资本家，也没有不以赚钱为目的的老板和商人。你引进他的资金和技术，如果对他不利，资本家是绝不会干的"。

五是自费留学，不宜提倡。李铁铮说："中美建交以后，在我们国内掀起了一股到美国留学的热潮。前几年我们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共有六千人，其中自费留学的有二千人。现在美国政府公布，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共有九千人，我估计其中自费留学生可能有三千人左右。我认为自费留学没有经济实力会有损国格和人格。据我所知，女孩子出国自

费留学的人，出了问题的不少。有些女孩子，为了在国外弄到几个钱，在美国干些美国人根本没有人去做的事情。例如给人家做保姆，给瘫痪老人喂饭、倒粪、倒尿……。更有甚者，有些女孩子实在没有办法生活，被迫卖身度日。国务院某部门一位负责同志的女孩在美国自费留学，为了生活、为了钱，她两次嫁给美国很有钱的男人作妻子。在给美国男人玩够之后，她两次被人抛弃。实在是可怜得很啊！我要大声疾呼，自费留学，不宜提倡"。

九、慷慨资助

李铁铮的家原来在乡里，自他父亲当了绸布店店员以后，才搬到城里来居住。开始他们租住在长沙市泰安里，李铁铮考上外交官到中国驻英国使馆任秘书后，在长沙市千福林盖了一栋有六间房屋并有车库的中国式的平房。1938年长沙大火时被烧掉了。他母亲在重庆病故将遗体运回长沙安葬时，李铁铮也只好寄寓旅社。当时湖南大学的校长皮宗石对他说："您为什么不重建故居？还是在原来的地方重建一栋吧？由我来负责给您设计和施工，您只出钱就行了"。于是皮校长找了湖南大学一位姓米的建筑师负责设计，由皮校长负责组织，仍然在千福林盖起了壹栋有十多间房子英国式的小洋楼。房屋盖起之后，李铁铮本人只住了一个月就到美国去了。解放以后，此栋房屋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代管。因为房屋质量好，在那里办了一个幼儿园。1964年李铁铮回国定居，在返湘探亲时，李铁铮问及此栋房屋的情况，当时省委统战部的负责同志告诉他，按照共产党的有关政策，您那栋房子没有没收，政府只是给您代管，您要的话，

可以办理有关手续将房屋收回。李铁铮回答说：我目前不需要，请他们继续代管好了。后来李铁铮要求收回房屋，产权归己。经过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沙市委统战部和长沙市房管部门上上下下的多方协商，按照党的有关政策，给了李铁铮人民币五万元。李铁铮收到长沙市给他的钱后说：共产党真是说话算数，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关照。我为什么要将房屋收回？原因只有一个，说明我不是剥削阶级。老实话，我要求收回房子，我并不是要钱，政府给我的伍万块钱，我除留一点自己用之外，其余大部分捐给有关社会福利事业。”李铁铮除了留一万元作自己旅游费外，其余四万元捐给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十、怀念父母

李铁铮多次对周世钊说过：我这一生，在旧外交界混了十九年，在美国我生活了十七年。回顾我这一生，虽然没有干出什么非凡的大事，但我觉得我也没有干出什么对不起人民大众的坏事，所以我问心无愧。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憾事，那就是我在大学读三年级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家乡病故，我未能以分文禄俸，报答他老人家对我的教养和恩德。我的父亲名赞熙，字鼎丞，是一位绸布店的店员。后来当了湖南染业公司的总经理。我的家庭成份是城市平民。我是独生子，父亲对我管得特别严，对我的过错从不姑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的徒弟张笠华到上海办货时，顺便带回一张全钢丝床送给我父亲。我父亲对这个钢丝床特别爱惜，他只准我在床上玩一下，从不准我在床上睡一夜，他要我每晚睡硬板铺。但是我父亲特别疼爱我，他对我的饮食起居，对我的

身体健康，尤为关怀。我小的时候，我们的家境并不怎么好，但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他还特地为我请了一个奶妈。我今天身体能有这样好，还得感谢我父母亲从小对我的扶植。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实在是出于爱心，他希望我能健康成长，认真求学，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材……现在我深刻地感觉父亲对我诚挚的爱。我的母亲姓钱名丙曜，是苏州人。父亲爱我，母亲更爱我。我母亲和我父亲结婚后，一共生了五个男孩，我数第四。我的三个哥哥均不幸夭折，我的弟弟也未能成人。为了把我养大成人，母亲对我的爱那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只有父母亲对我的爱，没有我对父母亲的爱。这实在是不合乎人之常情啊！父母亲把我养大成人，把我教育成才。这体现出我们中国老人的道德观。按照中国的恩德观来说，我是应该报答父母亲对我的恩爱的，可是在我的父母亲年老生病时，我没有孝敬过他们一天。这是我们中国的道德观所不能容许的。在敬老尊贤这个问题上，我是欠了帐的（李铁铮讲到这里时，总是眼泪双流）。尊敬的学长，我为什么选在1964年回国呢？当然主要是我看到中国有前途，有希望，我才抱着报效祖国的愿望回来的。但是，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1964年，我正好是58岁，我父亲58岁就离开了人间，我58岁身体尚好。我想，如果我父亲58岁生病的时候，我这个儿子能够孝敬他老人家一下，能够为他请医治病，或许我父亲还能多活一些时候。越想我越感受到良心的责备，越想我越痛心。我的父母亲去世之后，安葬在长沙市南门外离长沙铁道学院不远的地方。父亲和母亲的坟墓相隔只有300米左右。我想在我有生之年，只要有可能，要多回湖南。这一则是回去看望湖南人民，看

望新朋旧友，再则是到我父母亲的坟墓上去上坟。湖南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家乡，是全世界人民向往的地方。我对湖南的人民，我对湖南的山山水水，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李铁铮没有忘记，没有湖南这块英雄的土地，没有英雄的湖南人民，就没有我李铁铮的今天。我要在有生之年，发奋图强，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以报答湖南人民对我的养育之恩，报答父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到父母亲的坟上去扫墓，这也是一种还账的表现。但是，这还很不够，将来我死了之后，希望将我的骨灰和我父亲的坟墓合葬在一起。在九泉之下我就可以永远服侍我父亲。只能这样来报答我父亲教养之恩。我的母亲是一位很善良的家庭妇女，我的父亲去世以后，家里就是靠她来维持。那时我们家的经济是比较困难的。我大学毕业工作以后，情况有所好转。我家的房子烧掉后，我母亲就到了四川重庆，寄居亲戚家。民国三十二年，我母亲在重庆病故，我从美国赶了回来，将我母亲的遗体运回长沙安葬，并且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安葬仪式，群众都称赞我是孝子，我想我母亲在九泉之下也会含笑的。并说将来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和我的父亲的合葬在一起。周世钊说："您真是一位中国式的好孝子啊！"

1990年1月李铁铮同志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派人将他的骨灰由其亲属护送，送往长沙。由湖南省政协、省委统战部、长沙市政协、长沙市委统战部、长沙市郊区政协、长沙市郊区党委统战部等单位共同组织，于1990年9月4日将李铁铮的骨灰同他父亲的坟墓合葬在一起，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

李觉家事三则

丁冰玉

李觉，长沙人。1900年4月6日生，1987年7月31日于北京病逝，终年87岁。1921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30年任国民党第十九师师长。抗战期间任国民党第七十军军长、第二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任总统府中将参军、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主任。1949年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副总司令，是湖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中南军区高参、中央军委参事。1954年起任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兼政协秘书处副处长，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他是一位爱国将领，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关心四化建设，在贯彻"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

李觉兄弟三人，长兄李轨，次兄李东森（又名李博）。他们兄弟曾于抗战期间在长沙市郊区岳麓山乡茶子山村建有"慈园"，在观沙岭村的旱禾冲建有"华亨山庄"，在猪槽坡置有花圃，在郊区望岳乡谷丰村苦竹坳购有坟地，李觉的母亲和他自己就安葬在这里。

一、茶子山村的"慈园"

慈园是一幢四四方方的、四合式土木结构的二层楼房。

头门上方横额书有“慈园”二字。进门是个大厅，中间有天井，正屋是佛堂和卧室，两边是厢房。房子周围有茶园和桔林，慈园被掩映在一片翠绿之中。

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日寇兵临岳阳。李觉的大哥李轨为了疏散转移，便在茶子山买下了这个庄园，每年能收桔子180担，采摘茶叶上千斤。

李觉的母亲纪氏信奉佛教，每年暑季来慈园小住，早晚念经拜佛。农历七月十五日是旧俗中元节，请来一些师公道士，大做道场，烧化纸钱（也有真的纸币），撒发斋供。说是李觉带兵打仗，杀死了不少人，一年一度地超度阴兵，以表慈悲之意，故名这幢房子为“慈园”。慈园内部的布置颇为豪华，有藤雕围椅，有宝石圆桌，有驼毛地毯等，还有不少名人书画。

解放初，茶子山农会设立在这幢房子里。土改后，在这幢房子里办起了学校，名叫：“郝家坪小学”。1983年，这里被长沙印染厂征购，慈园被拆除。但“慈园”这个名字，至今还留在人们的脑海中。

二、早禾冲的“华亨山庄”

1940年，李觉的大哥李轨在距慈园约五里远的观沙岭村早禾冲又买了一个庄园，修建了一所房子，取名“华亨山庄”。头门上方书有“华亨山庄”四字，门边是一幅对联，联曰：

华国文章，亨通元运；

山川润气，庄造大成。

这幅对联把“华亨山庄”四字镶嵌进去了。这所房子也是土

木结构的。一进头门，就是天井，正屋是平房，两端有偏屋。这个庄园拥有九石田，每石田合六亩多一点，合计约56亩，年产干谷360担。头两年是请长工耕种的，后来出租，年收租谷90担。还请了一个当家长工住在屋里。李轨是国民党军中一个军械处处长，抗战期间，一些重型军械疏散在这里。

在离早禾冲一里远的猪槽坡又买了一个围子作为花圃，将围子里的旧屋作了修理，雇了一个长工住在这里栽花植木，这里四季鲜花盛开。

他们所以经营这些山庄苗圃，种柑桔是为了晚年好在这里安居颐养。

三、苦竹坳的“墓地”

李觉的父亲原在云南为候补知县，去世时，李觉还只两岁，由母亲带回长沙，躬亲抚养。李觉对母至孝，为报答母亲养育之恩，与兄弟商议，要在华亨山庄附近谋一墓穴，作为母亲死后安厝之所。于是请了一位叫罗秉荣的阴阳先生到处察看，发现望岳乡谷丰村的苦竹坳是一块好地，谷山山脉蜿蜒而来，地势开阔，赞曰：“怀中抱子”，前有麓山耸峙，左有湘水萦绕，状若玉带缠腰，鲤鱼跳龙门。这块地原是当地吴若嵩的，李轨用高价800元买了下来，李母在世时就把墓修好了。

1953年，他母亲去世，葬在湘潭。苦竹坳这个生人墓于文革初期被砸。六十年代末，谷丰村有个叫吴三麻子的单身汉死在市里，他的两个侄儿将尸体运回，葬在苦竹坳这块墓穴里。

李觉为了实现母亲遗愿，要求政府落实这块墓地，要将母亲灵柩迁葬到苦竹坳来。1985年，省、市统战部出面，由郊区统战部具体经办，经过协商，将已葬的吴三麻子棺材迁走，由李觉的原副官王赳将李母迁葬于此，重新修好了墓，立了碑，碑上写着：

“李母纪老太夫人之墓”

1986年4月，李觉自北京回长，亲自上苦竹坳为母亲扫墓，献了花圈。他叮嘱副官王赳，说他死后，请将骨灰葬在母墓之侧。1987年3月，李觉在北京去世，王赳同志遵其遗言，将李觉的骨灰从八宝山运来，成全其愿，并立碑为记。

说明：

本文资料是由李觉的原副官王赳和当地熟悉情况的张振前、吴新元、李定安以及原来的长工王贵富等同志提供的。

长沙南郊第一个乡红色政权

游运生* 口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明白了一个道理：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并拥有革命武装。于是，我党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并在许多地方建立无产阶级红色政权，这不仅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而且能使党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发动广大人民起来斗争。1930年8月，长沙市郊第一个红色政权，《长沙南乡苏维埃临时政府》就是在革命斗争十分严峻的形势下，经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具体帮助建立起来的。

1930年，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率领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城。八月下旬，红军部队四万多人浩浩荡荡地开到了长沙南郊，驻扎在今郊区的洞井、大托、黎托三乡和长沙县的南托、石门两乡。长沙的南郊虽属丘陵，但有许多山势高峻，森林茂密的山峰，且不象其东、西、北面有江河天堑阻隔，是历史上攻城的必经之路。红军将士军纪严

注：游运生系地下党员，现年82岁。

明，士气高涨，有一攻就陷之势。当时红军的指挥机关设在现洞井乡白田铺附近的肖家祠堂和洪塘村的竹园里。

红军从到达长南的第一天开始，就一面摆开阵势，准备攻打长沙；一面发动并组织群众，建立无产阶级红色政权。长沙南乡苏维埃临时政府的成立大会在红军到达的第三天就召开了，即1930年八月下旬，会议地址在洞井乡桃阳村老坝大屋。因支前任务重，大会只开了半天，到会代表30人。会堂大门上端挂着“长沙南乡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大字标牌，会堂内外张贴有标语。参加会议的代表喜笑颜开，会堂洋溢着无比欢乐的气氛。

成立大会由陈思运、游恒斋两人主持。红军政治处的一名领导干部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原因就是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今天长沙南乡人民红色政权的建立，是长沙人民有史以来惊天动地的大喜事。接着他宣布：“长沙南乡苏维埃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会议任命陈思运、游恒斋为“临时政府”的正副主席，吴庆秋、吴恒生、杨竹书三人为执行委员。（陈思运：洞井乡桃阴村人，农民出身。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曾任桃谷团农民协会委员长。游恒斋：洞井乡新兴村人，教员出身。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曾任白田团农民协会副委员长。吴庆秋：洞井乡金井村人，手工工人出身。1927年曾任仁里农民协会委员长。吴恒生：大托乡先锋村人，农民出身。1927年曾任第43乡农民协会委员长。杨竹书：长沙县南托乡高托村人，农民出身。1927年曾任仁里团农民协会执

行委员。）

会议还宣布了长沙南乡苏维埃临时政府所辖的区域，即：东抵浏阳河，西临湘江，南达浏阳、株洲、湘潭三县县界，北到长沙城外。现在长沙市郊区的洞井、大托、黎托、东屯渡等乡（场）和长沙县的南托、石门、团然、跳马四个乡，甚至株洲市郊的龙头铺、马安、铁坪等乡都属她管辖，这一区域内有人口约十万。会议结束时，要求与会代表会后积极行动起来，深入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支援红军攻打长沙城，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最后高呼口号：无产者联合起来！实现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苏维埃政府万岁！

长沙南乡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以后，遵照党的指示，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支前工作：筹钱、筹粮，组织劳力推谷整米、煮饭、送饭、送茶，并安排篾工做担架。当时，我和三个篾工在老坝大屋用三天三夜的时间制作了二个多副担架。我与肖子俊、肖亮明三人到烂泥冲给红军送饭时，把负伤的红军战士贺禹祥背到我家里养伤，贺伤愈后，又把他送到团渡河红军后方归队。王桂林把毛泽东、朱德等红军指挥员带到万西湾山岭上，毛泽东用望远镜观察长沙地形，指挥战斗。现洞井乡郡阳村的吴少涛、新兴村的游坤山等人，抓到土豪劣绅刘光主、吴湘庭、张运章，没收光洋1600元，全部交给红军作军用开支。

鉴于当时敌强我弱的局势，同年9月12日，毛泽东、朱德等人在洞井乡白田铺肖家祠堂召开了前委军以上干部会议，说服到会人员，作出果断决定，撤离长沙。至此，长沙南乡苏维埃临时政府转入地下活动。

长沙南乡苏维埃临时政府虽公开活动时间只有半个多月，但她确实是长沙郊区第一个乡红色政权，她的建立为郊区革命斗争史添下了闪光的一笔。

（杨国兴）

农运时期的一张布告

周振新口述

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派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屠戮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长沙城乡一时阴霾四布，人心动荡不安，农运面临严峻的考验。长沙县白田团农协秘书刘业元和我奔赴嵩山镇，刘根据农民协会的意见写了50多张布告，盖上区农协的大印，张帖于该区交通要道。

布　　告

近因省会混乱，不日定可安宁。
倘有豪绅蛊惑，严惩决不循情。
工商照常营业，税收一律照征。
捐款不许拖欠，坏人不准留停。
农会照常开会，本区毋吝欢迎。
各乡纠察抓紧，治安决不放松。
我区各界人士，务必一律禀遵。

（杨国兴整理）

注：周振新是当时嵩山区农协通讯员。

我奉命拟订粮食统购统销方案的前后

刘仲述

解放前夕，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逼近武汉青山，这时我正在武汉一所国立中学教书。国民党政府自顾不暇，学校经费来源断绝，加之当时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一日数涨，特别是武汉的米店倒闭、关门者居多，极少数米店一天营业两钟头，抢购成风，粮食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回了长沙。

全国解放后，划分六大行政区。中南区机关设在武汉，辖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五省区和武汉、广州两市（当时均为中央直辖市）。一九五〇年冬，我仰仗人熟地熟，来到武汉谋职。一九五一年二月，我到中南粮食局工作（前身叫粮食公司，后改称局），被分配在业务处，具体任务是搞粮食物价，并经常编写内部发行或公开发行的期刊，撰写报告和总结等。

建国初期，国家征收了部份公粮，由于建设伊始，百废待兴，城市职工与居民迅速增加，粮食供应日趋不足，各地时出现排长龙挤购，甚至脱销等现象，粮食市场不法稳定。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民无粮则乱。根据《联共（布）党史》的记载，苏联建国之初也出现过粮食危机，中央有鉴于此，为防微杜惭，稳定大局，把粮食问题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一九五三年春夏之交，中央准备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粮食问题，有各大行政区负责人参加。中共中南局书记兼财委主任李先念同志责成中南粮食局草拟方案，提交中央讨论。中南财委副主任聂鸿钧、中南粮食局局长涂其友和业务处长齐平，把这一任务交给我办理。

我考虑粮食供应问题，在农村一般是自行调节，只有大面积灾荒才由国家统一调拨调剂解决，其重点是城镇、工矿和部队的粮食供应。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把粮食的购销，从自由市场转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就是说，要保证供应，必须先由国家掌握充分的粮食，才能进行计划分配。但是要掌握大量的粮食，如从市场收购，将造成市场更加紧张的形势，因而要大量收购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全国解放以后，余粮不再集中在地、富手中，而分散在广大的农民家里。一些无地少地的贫下中农，不仅把新分到手的土地看作宝贝，而且也永远不会忘记祖祖辈辈吃糠咽草之苦，会把粮食当作宝中之宝，不可能把粮食轻易送到市场上出售。但如果通过一定的政治宣传，激发翻身农民的爱国热情，让大家把为国解难当作应尽的义务，然后国家以合理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他们所产粮食的小部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国家积少成多，就可以解决问题。根据这一设想，我拟具了一个草案，即在征收公粮的同时，按比例向农民收购一定数量的粮食。为的是既可以掌握大量的粮食，又不致冲击市场。且后再按计划供应军粮民食，达到稳定供粮形势，解决粮食问题的目的。

当时我还考虑到收购大量粮食，必需大量的资金，国库一时难以筹措，便建议由国家发行相应数量的"经济建设公

债”，回笼货币，平衡财政收支。

由于军粮民食的需要量，国家公粮数量我弄不清，不能匡算出具体指标，只能简单而扼要地写出这两项建议。我的这两项建议经过粮食局一些主要负责人研究讨论，一致通过后，报送中南局财委审查同意。不久李先念主任和财委副主任牛佩琮到中央开会，拿出了这个草案。几天后，随同去开会的齐平处长回局，喜形于色。他说：我们的建议被中央采纳，征收公粮随带购粮的办法，今年马上实行，至于公债发行，问题很大，容后考虑。（就在第二年——一九五四年“经济建设公债”也发行了。）他还传达表扬我，说我学习苏联经验有心得。一九五三年夏末秋夜，中央制订了粮食统购统销的详细办法公布了，不仅规定了购粮与征粮的比例，购粮时的价格标准，同时还详细地划分了不同职业工种和不同年龄层次的供应指标。先是通令各大区、省、地、县各级党委成立粮食办公室，命令各地粮食部门调集粮食，大量加工大米面粉，充实各粮食供销点仓库，准备供应。中南粮食办公室由财委副主任聂鸿钧和中南财政部李部长主持，我和另外几个同志在办公室工作。接着全国各地同时张榜公布国家粮食统购统销办法，并规定即日实施。当时我们在武汉市进行了检查，各供销点干部全部上岗，仓库是满满的，买粮的人虽然比往常有所增加，但秩序井然。各米、面加工厂库存充足，门前停着待运的卡车。同时公安干警积极配合，加强巡逻，似乎是一场紧张而又无形的战斗，由于有备无患，“办法”得以顺利实施。随后几天，办公室得到各省市电话汇报，也都风平浪静地开始执行了这一政策。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公布实施后，至今已沿用三十八年，

除“大跃进”时期属特殊情况外，粮食市场平稳，从未出现危机。一九八五年，公粮虽已改征货币，购粮已改称合同定购（近又改称国家定购），但仍然是原来征粮购粮的基础上按比例收购粮食，性质与统购相同。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局部的自然灾害每年都有；同时粮食增产，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而且政府规定在一定范围内粮食定购任务完成后，又可以开放粮食市场，互相调节，这样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剂相结合的方针政策不谋而合。

在执行统购统销政策过程中，由于受不同政治气候的影响，个别地区有时候曾出现过购过头粮的情况。由于少数干部不调查研究，浮夸虚报，甚至层层加码，随心所欲地增加统购指标，给农民生活造成困难。这当然不是我们当时的愿望，我曾为此提过意见，竟然在反右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这也是始料不及的。好在今日党风已大大好转，浮夸风、乱摊派等被严格制止，我期望，统购统销政策一定能为稳定民心，为四化建设继续作出贡献。

回忆郊区渔业四十年

祖国翰*

一、概况

建国初期，长沙市郊区只有百来只破烂渔船和三千来亩零星养鱼水面，鲜鱼年产量百吨左右，其中捕捞产量占六成。就当时长沙市人口计算，郊区提供给市民的鲜鱼人平不过半公斤，因此，逢年过节只好从外埠购进盐卤鱼来满足市民的需求。

解放四十年来，郊区水产事业有了飞跃发展。全郊现有水面22533亩，年产鲜鱼7600吨，较解放初期水面增加7.5倍，产量增加76倍。今天长沙百万市民鲜鱼的人均占有量达7.6公斤，昔日“臭鱼烂虾满街头”和“鱼米之乡吃鱼难”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二、渔政管理体制的完善

1952年，郊区成立渔民协会，受长沙县渔民协会的领导，1953年改由市手工业联社领导。1954年，郊区办事处成立，下设水产科。1959年，长沙、望城两县与邻区合并，在

注：祖国翰从事水产工作33年，现已退休，历任水产科副科长、畜牧水产局副局长和渔场副场长等职。

副食品生产部下设水产科。1962年恢复郊区办事处，设畜牧水产科，下设水产股和水产技术推广站，负责全郊渔业生产、技术指导和渔政管理。四个直属渔场和综合农场、东屯渡农场设水产股，配有技术干部1—4人，其他乡（场）均配有水产专干1—2人。全郊现有水产科技人员89人，其中本科生2人，大专生3人，中专生84人。还成立了水产科技学会，拥有初级以上职称的会员62人，重点乡（场）还成立了分会，从上至下形成了一支技术力量较为雄厚的渔业科技大军，为恢复发展和繁荣郊区水产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1987年，从坪塘至落刀咀的湘江段和从东山镇至新河口的浏阳河段划归郊区管理，配有兼职渔政管理干部2人。两年来，在宣传贯彻《渔业法》进行渔政大检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三、渔业生产发展的四个时期

郊区渔业生产的发展经历了四个不同的时期。

初创时期（1950—1960年）：新中国成立后，郊区成为长沙市主要副食品生产基地，经营蔬菜、猪、鱼、果、稻五大项，渔业从此列入了主要议事日程。根据当时鱼产量主要来自捕捞的情况，确定了“捕养并举”的渔业生产方针。

1954年，郊区接管了以捕捞为生的渔民，于次年成立了湘江渔业社，组成落刀咀和黑石两个渔业大队，按船定产、定上市任务。政府向渔民发给粮食等主要生活物资或票证，实行生产资料奖售等政策，使捕捞产量上升到150吨。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湘江渔业社撤销，渔民分别划归当地公社管理。因为他们世代以船为家，成年漂流江河之上，生活十

分艰苦，国家便拨给资金、物资，安排了50多户渔民就地定居，解决了部分渔民无家可归的困难。但由于江河不断被污染，水资源日益遭破坏，以及渔民捕捞管理混乱，所以产量反而下降。

捕捞产量不稳定，使人们认识到发展渔业的潜力在于养殖。郊区18个乡（场），虽地域不广，养殖水面不多，但潜力很大，一是当时全部可养水面8500多亩，荒废了5000亩；二是养殖技术落后，单产极低，亩平不到50公斤。因此郊区一手抓水面的充分利用，一手抓养殖技术来提高单产，并提出了“以养为主、养捕并举”的方针。

大量的生活污水流入郊区成为郊区发展渔业得天独厚的条件。1955年原国庆大队农民在陈家湖挖土筑池，开始利用城市生活污水养鱼，获得亩产200来公斤的高产。第二年郊区第一个养鱼生产队成立。1958年建成了面积130亩的国庆大队渔场。

人民公社成立后，郊区出现各级办渔场（队）的高潮。跨大队的水面由公社经营，跨生产队的水面由大队经营，先后出现社办渔场4个，水面2970亩；大队渔业队18个，水面834亩；生产队渔业组1097个，水面5193亩。全部养鱼水面速增到9000来亩，不仅原有水面全部利用起来了，还新辟了几百亩。1959年鲜鱼总产514吨，十年翻了五番多。

萧条时期（1961—1963）：六十年代初，是国家困难时期，郊区渔业走入低谷。郊区除东屯渡、岳麓、大托三个公社渔场和新河、国庆、史家湖、麓山四个大队渔场在勉强维持生产外，其余渔场停产了。1963年鲜鱼产量降到336吨。由于城市人口已增至80万，加之省内调拨给长沙的鲜鱼减少

了千多吨，所以“鱼米之乡吃鱼难”的局面更加恶化。

基地建设时期（1964—1976）：1963年，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会议先后在重庆、武汉、长沙召开，几次会议将郊区渔业推向一个千军万马大建渔业基地的高潮。与此同时，原国家水产部副部长张雨帆同志调任长沙市副市长，主管副食品生产供销工作。在张副市长的提议下，市委决定将东屯、岳麓两个公社渔场和史家湖渔业队扩建为国社合营的湘湖、红色、岳麓渔场。在市委直接领导下，动员了内四区劳动服务大队二千多人承担基建任务，全市各有关部门和驻长工程兵某部全力支持，市、郊机关干部都参加了义务劳动。三处工程共完成土石方80多万方，建大小涵闸80余处，铺管道4000来米。国家投资63万元，历时两个月，建成了共有水面3600亩的三个大型规范化渔场，并创全省国营农、牧、渔场当年投资、当年投产、当年盈利的先例。

1973年，全国城郊养鱼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了长沙办国社渔场的经验，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号召全国推广长沙郊区养鱼经验。我市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准备把岳麓山公社的咸嘉湖、团湖改建为国社合营的西湖渔场。当年年底省下拨资金55.27万元，动员七千余劳动力，仅用15天时间完成土石方56万方。1974年国家再投资97万元进行扩建，至此继湘湖渔场之后，郊区又一个拥有养殖水面2000亩以上的大型渔场——西湖渔场建成投产了。

在国社渔场的推动下，相继有韶山路公社的新开铺渔场、岳麓公社的岳北渔场、东屯渡公社的东屯渔场、东岸公社的东湖渔场、黎托公社的黎明渔场建成，此外综合农场、东屯渡农场成立渔业管区，一批大队渔场先后投产。全郊养

鱼水面猛增到22533亩。

郊区四个国社渔场，从定点划界、勘测设计到竣工投产，从清产核资、签订联营合同到长沙市国社合营渔场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的全过程，我是唯一自始至终的参加者，我看到了郊区人民建设渔业基地的满腔热情和冲天干劲。但由于浩劫年代，渔场管理不善，郊区鲜鱼产量并没有因水面猛增而大幅度增长。尽管如此，基地渔场在净化城市水质，调节城市气温，美化城市环境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为郊区日后的渔业生产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稳步发展时期（1977—1989）：渔业基地的建立，为郊区渔业腾飞提供了契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制订了正确的富民政策，调动了广大渔民的积极性，1977年以来，全郊鲜鱼产量以年平35%的速度递增。1989年，总产达7600吨，长沙市民再不要为吃不上活鲜鱼而发愁了。

四、科学养鱼　成绩斐然

除了政策对路，水面扩大外，科学养鱼技术的普及也是渔业起飞的原因。解放四十年，郊区渔业走过了一条“实验—示范—推广—普及的科技改革之路，进行了一系列养鱼技术革新。

1、家鱼人工繁殖。很长时间以来，鱼苗要从江河捞取。1957年郊区有排35架，捞子266个，年捞苗2千万尾左右。由于本地鱼苗纯度低于湖区鱼苗，所以郊区每年要组织大批人员和资金远道去岳阳荆河等地采捞，如果汛期不正，要等10—30天，碰上强寒潮将苗财两空。捞获的鱼苗要清除野杂鱼，且要抢在下池十天以内，渔民需长时间浸在水中劳

作。采苗、选苗既辛苦又费时，实在不合算。

1961年，岳麓渔场与湖南师范生物系协作，开展家鱼人工繁殖试验，次年取得成功。1969年青鱼孵化又取得成功，为全省青鱼人工繁殖填补了空白。我国这一科技成果被当时称为世界一场科技革命，它把渔民从艰辛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郊区现有鱼苗孵文点七处，产卵池九个，孵化环道29个，年生产鱼苗2亿多尾除自给外可外销1亿多尾。继四大家鱼人工繁殖成功后，现在放养的十多个品种都实行人工繁殖。1987年新引进的加州鲈鱼在洞井渔场人工孵化成功，填补了我省又一项空白。

2、改革养殖方法。五十年代，郊区渔民主要沿袭过去传统养殖方法，品种单一，鱼种规格小（寸子），放养密度大，肥、饵不投入，只望天收，产量极低。群众总结为“一年苗，二年种，三、四年成鱼”。六十年代，郊区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多次组织人员去衡阳、广东、无锡等地参观学习，并聘请外地技师来长传经。根据郊区实际与外地经验结合原则，实施“轮捕轮放”养殖法，即育种、成鱼面积按三七开，培养五寸以上大规格鱼种，按不同水质条件实行多品种搭配，定期投放，分批捕捞，捕大留小。利用城市污水，施放有机肥和青草，做到了两年成鱼，使产量明显提高。

随着鱼种的增多，育种场地扩大，造成育种挤占成鱼水面的新矛盾，说明“轮捕轮放”制度已不适应高产地区的需要。八十年代初，郊区选择东屯渡农场白泥湖六口鱼塘，开展“双养一套”的养殖技术研究，上半年重点培养鲢鳙鱼，

下半年主养罗非鱼，年中套养夏花（来年老口）。通过几年试验—总结—推广，据1987年六个单位的2683亩水面统计，亩平产鱼730公斤，比没有推行此法的水面高出1.16倍，同时具有节约三分之二的育种水面，提早起捕时间，促进均衡上市，缩短养殖周期（鲢鳙一年龄，鲤鲫罗非鱼半年上市）等特点。“双养一套”法较充分地挖掘了水面的潜力。

3、改进品种结构，推广以罗非鱼为主的名、特、优多品种混养。

“鲢鳙当家，草鱼做客”，这是对过去品种单一现象的概括。1974年，师范生物系与岳麓渔场、红色渔场协作，利用江西荷包红鲤母本与湘江野鲤公本杂交获得成功，后定名“岳鲤”。1979年通过部级鉴定，并获国家和省科技二等奖。随后两年，郊区放养岳鲤水面达22000多亩，产岳鲤212吨。岳麓、红色两场定为全省岳鲤制种点，年供应400多万尾苗，并向北京、东北等地提供亲本。1980年获长沙市科技四等奖，1982年分获国家和省杂交鲤推广二等奖。

莫桑比克罗非鱼于1961年曾引进我市，因它不能越冬而中断。1974年郊区重新引进，红色渔场用电热棒加温，首次成功地帮助罗非鱼越冬。次年湘湖渔场用自制土锅炉加温也获成功，但这两种方法成本过高。1982年湘湖渔场学习江西利用地下水加温的经验，从而推广了罗非鱼的放养面积。同时引进尼罗罗非鱼取代莫桑比克罗非鱼，更发挥了这一品种的优势。全郊现有九个渔场建有越冬池109个，面积8927平方，1988年越冬罗非鱼种225万尾。

罗非鱼引进仅十年时间，已发展成郊区举足轻重的骨干鱼种。1988年全郊罗非鱼养殖面积达10500亩，产罗非鱼

1573吨，在全国城郊中其产量仅次于佛山郊区。湘湖渔场是全国第一个罗非鱼年产过万担的渔场。

罗非鱼、岳鲤的引进推广，推动了全郊优化品种的积极性，先后引进的鲤、鲫鱼及其杂交品种有芙蓉鲤、工程鲤、三杂交鲤、锦鲤、日本白鲫、东北鲫、异育银鲫、鲫鲤杂交等，引进的罗非鱼类有尼罗、奥利亚、伊斯梅利亚、珍珠等，此外还引进了土鲮、露斯塔野鲮、银鲳、草鲶、鮰鲶、沟鲶、加州鲈、淡水白鲳等二十多个鱼种。名、优、特种鱼的引进既促进了生产，又繁荣了市场。

4、改变饵料结构。随着养殖方法和品种结构的改革，单纯依靠草、肥、污水已不适应生产的需要。七十年代开始喂成分单一的商品饲料，随后投喂配合饲料，近几年又广泛使用颗粒饲料。湘湖、西湖、岳麓三渔场办起了中小型颗粒饲料厂，按科学配方生产，年产能力五千吨。1987年，“万亩片”的投饵水平是：总饵料系数为8.37，其中精料0.98，青料2.15，肥料5.24。

5、改善生态条件。郊区每年因渔塘缺氧等原因而泛塘死鱼在200吨左右，损失在20万元以上。造成缺氧现象是因为水质过肥，放养密度大，工业“三废”的污染等。针对这一现象，渔场在高产塘安装增氧机和抽水机。全郊有渔塘增氧机205台，兴建了三处引清工程，安装240瓩的大型水泵4台，定期引清水冲湖，调节水质。各乡（场）每年安排资金100—150万元，把老鱼池改造成标准化鱼池，改善了生态环境，泛塘事故逐年减少，1989年统计，已降低50%左右。

6、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淡水人工养殖珍珠是我于1965年在岳麓渔场试验成功的。1963年日本停止对我国出口

珍珠，次年全国在浙江召开了人工养珠座谈会，并印发了会议纪要。根据上述信息，我开始养珠试验。郊区拨给试验费40元，购买了三角帆蚌和褶纹冠蚌300公斤。我自制了全套工具，三个月时间里接种河蚌400多个，成珠率达80%以上。1968年8月，采珠6珠送省药检局鉴定，获“鉴定合格，准予生产”证书，又填补了我省一项空白。我还编印了《淡水人工养殖珍珠技术操作规程》一书，以推介经验。

网箱养鱼在我国始于1973年，我省1977年在常德开始试验。郊区于次年采用网箱育种，1980转为用网箱养殖以罗非鱼为主的成鱼生产。1981年统计，全郊16个乡、场开展了网箱养鱼，共设置4×3×2和3×5×2等规格的网箱331个，面积达8059平方米，生产成鱼36.88吨，培育鱼苗7万尾。我所在的红色渔场1982年有网箱162个，水面2456平方米，产罗非鱼63.8吨，平均每平方产26公斤，一亩网箱相当于亩产500公斤的34亩水面。何运泉承包10箱（105平方），每平方产鱼41公斤，最高一箱创每平方108公斤的纪录。

草鱼四大病，特别是出血病的传播，是渔业生产的一大障碍。从1975各起，郊区从广东珠江水产科研所购进土法疫苗对草鱼进行免疫注射，获得很好的效果。1978年湘湖、红色渔场开始生产土法疫苗，后定为疫苗供应点，供应全市并外销。全郊每年免疫注射草鱼20万尾以上。近年又推广应用草鱼浸泡免疫法，并在省稀土研究所的帮助下进行利用稀土防治草鱼病的试验。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利用水面生产特种水产品。岳麓山乡有牛蛙养殖户4家，1987年引进牛蛙蝌蚪，年底出售成蛙750只，收入6600元，并自育蝌蚪2万多只。综合农场与东岸

各有一个甲鱼养殖户，养殖水面共1.7亩，投放幼鳖600只，年出售成鳖200公斤，收入6500元。郊区拨款500元扶助湘湖渔场建成13.5亩的甲鱼试验基地，已开始投产。

7、万亩连片鱼塘高产综合技术试验。1986年农业部以（8601）号合同下达我郊“万亩连片鱼塘高产技术试验”（简称“万亩片”），试验要求1987年亩净产500公斤。“万亩片”由4个渔场、3个农牧场、3个乡的426口渔塘组成，总面积10003亩。

通过二年的努力，郊区“万亩片”经省、市验收，各项合同指标都达到或超过1987年“万亩片”亩平净产516.5公斤，超过要求指数的3.28%，比试验前亩净产增加201.5公斤，增长63.9%。其中亩净产过1000公斤的水面有123.7亩，过750公斤的有2974亩。

“万亩片”在两年间使郊区净增产值932.6万元，劳动收益净增722.2万元，每亩净增收入722元，而物化成本降低10.1%，达到了增长幅度大、品种齐、价格稳、效益高的目的。1988年3月17日，“万亩片”通过省级鉴定，专家们认为“各项主要技术和经济指标居全省领先地位，达到国内先进水平”。3月18日的《湖南日报》以“一项科研成果，一年为长沙市人平增加二公斤鱼”为题，充分肯定了“万亩片”的成果。“万亩片”曾获得郊区科技一等奖，市科技二等奖，全国农、牧、渔业丰收杯的三等奖。

五、经营体制的改革

郊区渔场分国营、国社合营（区直属渔场）、集体、个体四种经营类型。

1、国营农（牧）场的渔业。由于农、牧场大小条件等不同，且渔业比重不一，所以其体制有的设渔业管区，有的设渔业队，有的承包到专业户。全郊五个农、牧场从事渔业的劳动力有576个，养殖水面5679亩，1988年以来水面和鱼产量均占全郊的24%。

农、牧场的管理采用场对管区（队）核定上缴指标，管区对队（户）实行定额上缴，承包方式有几年一包、一年一包等。

2、直属渔场是全民与集体联营企业，具有乡一级行政职权。渔场实行"以渔为主，综合经营"的方针。四个直属渔场有5886人，其中劳力3140个，从事渔业的劳动力有1481个，养殖水面5830亩。二十五年来，国家累计投资380.76万元，内部投资79.57万元，创造利润1467.8万元，上缴利税352万元，渔场获利43.6万元，如按总利润计算，收回了投资的2.85倍，渔场现拥有固定资产1372万元。

直属渔场的经营管理，在1979年以前实行一级核算，两级管理，场对队实行"三包一奖罚"和"五定"责任制，鱼等产品除完成定额和自食外，全部交售国家。渔场经营利润按投资比例分红，国家部分上交财政专项储存，仍用于渔业。现在利润改为定额上缴，其余留用。1980年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场对队（组）核定生产指标和递增比例，平均单价、分配水平、生产成本，队（组）可在产值减去工资、成本、定额上缴后获利，即"定额上交，一包几年"。

3、乡村渔场属集体所有制。全郊九个乡有养殖水面11195亩，占全部水面的一半，渔场劳力1980个，1988年产鱼2227.75吨，占全郊总产的31.1%。乡、村两级渔场15个，

水面3331亩，是郊区渔业的重要基地。乡、村渔场亩平产量252公斤，马王堆乡渔场亩产500公斤，雨花亭乡自然村渔场在1987年亩平达到1000公斤。

乡、村渔场的管理，一般是乡（村）对场（队）实行定产量、产值、上缴利润的办法，推行超产全奖制。

4、渔业专业户是八十年代初涌现出来的，私人承包渔塘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全郊现有水产养殖专门户875家，承包水面4576亩，1988年平均亩产350公斤。雨花乡莲湖村村民张少其，1984年起承包水面14亩，至今四年累计收入达7.5万元。

郊区农机水利工程建设成就回顾

钟曙明*

有历史记载的郊区水利工程仅有奎塘河治理工程一项。此工程之修建于五代。几经兴废，至清康熙年间废塘为田，以后再无较大型的水利建设。

建国前，郊区仅有山塘、平塘2446口，坝116座，大小井227口。各项水利设施的总蓄、引、提水量仅1800万立方米。旱涝保收面积仅0.2万亩，仅占总耕地面积的2.5%。郊区的垸田、小垸子及敞洲多达74个，抗洪能力极低，农业生产"望天收"。岳麓山乡岳北垸境内，至今尚留有"望天垅"地名。长善垸是建国前郊区境内最好的一个堤垸，但1949年堤顶高程还只34米，堤面宽仅一米左右，堤身单薄，每当山洪暴发，江河横溢，极易崩溃。据历史记载，自1857年长善垸建成到1949年的92年中，堤垸遭灾竟达52次。轻度涝灾，年年不断。提水设备全靠牛车和人力车，一架水车日夜不停地车水，保灌农田还不到10亩，垸田排渍更无能为力。"水车吱吱叫，脚板磨破皮，禾镰刚上壁，又要饿肚皮"，这就是当时农民对排渍抗旱的写照。机械化提灌设施，仅在1948年6月，由"美国援华联合会湖南农村重建服务处"组织的抽水机服务队，带来了2吋口径的小抽水机一台，在我区黑石渡的龙王庙（现福安乡所辖）操作表演。当时农民无钱购买，仅昙花一现，随即就带走了。

建国后郊区政府设立了水利专干，专门从事水利工作。1955年，郊区办事处设农林水利科，是郊区最早的水利机构。我有较长一段时间在郊区水利战线工作，回顾建国四十年来，郊区水利事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心里感触极深。现将我所了解的情况略述如后。

五十年代初期，郊区水利建设重点在堤垸地区。1950年冬，驻郊解放军412团和长善垸内一万多人，挑土筑堤。军民奋战一冬，共完成土方30多万方，将长善垸堤身筑成了堤高36～37米，堤面宽3～4米的大堤。1954年6～8月连降暴雨，山洪几度暴发，湘江水位几次出现洪峰。水势猛，持续时间长，长善垸内人民坚持日夜奋战，终于转危为安。以后年年加修，堤身更为巩固，四十年来没有溃垸。到1956年，郊区建成了长善、解放、合丰、丰顺、东岸、朝正、涝湖等七个骨干堤垸，大部份湖洲小垸，变成了良田。六十年代末，全郊74个零星小垸、敞洲，全部通过合并加修，建成了16个大小堤垸。原有180公里防洪堤线缩短成99公里。堤顶高程由原来35米以下，提高到37.5—40.5米。废除了390的瓦管，新装了大小86个涵闸。四十年来，堤垸工程建设共完成土方4433万立方，其中大堤1979万方，总投工2250万个，投资1600多万元，其中国家投资750多万元。16个堤垸保护着12个乡（场），67个村（管区）和4万多个中央、省、市驻郊单位和居民户，17万多人。垸内耕地面积6.8万亩，其中蔬菜面积2.4万多亩，财产总值达15亿元以上。昔日的荒洲甩亩，变成了以菜为主，兼以综合经营的商品生产基地。

注：钟曙明原系长沙市郊区农机水利局办公室主任。

1949年至1955年，丘岗区水利建设为恢复整修时期，扩大蓄水量，新建工程不少。1955年冬开始，在续修防洪大堤的同时，重点加强丘岗区水利建设。1955年冬至1956年春，建小水库和骨干山塘11处，石坝一座，新增蓄水量50多万立方米。1958年大办水利，出动劳力12000多人，修建小（二）型水库13座，新增蓄水量250多万立方米。1970年，在干旱较严重的东方红农场，兴建了小（一）型尖山水库，正常库容100万立方米，最大库容163万立方米，灌溉面积3000亩。1976年，又在洞井乡兴建了小（一）型同升水库，正常库容300万立方米，最大库容436万立方米，灌溉面积12400亩。至此，丘岗区面貌大有改观。通过四十年的努力，全郊现有小（一）型水库2座，小（二）型水库23座，山、平塘6100多口，坝162座，水井200多口，可蓄、引、提水量达一亿方。旱涝保收面积10万多亩，占全郊耕地面积的90%以上。

治理河道，避害兴利，使水随人意流，也是郊区四十年来水利建设的重点。1958年，结合修建京广铁路复线，郊区出动劳动力8000多个，完成土石方60多万方，将烈士公园东侧浏阳河弯道截直1.5公里，改善了河道泄洪条件，建设了湘湖渔场。龙王港下游水道弯曲，形成了十湖两洲，地势低洼，湘江涨水即成水乡泽园，千百年来，人民苦不堪言。当地流传一首民谣："韩家湖上水汪汪，十年湖田九年荒。龙王年年吐黑水，穷人岁岁遭祸殃"。1959年，郊区组织几千人上阵，将600多亩荒芜的湖泊改成渔池。并将韩家湖改名为咸嘉湖。1964年冬，郊区又组织万人劳动大军，顶风冒雨，治湖改水，连续苦战三冬，完成土石方58万多方，将荣家湾至后桥一段约2000米长的龙王港废掉，沿扇子山开凿一条长3400米的新港，兴建公路桥2座，涵洞8处。1974年，郊区再次组织7000多人，改造龙王港，完成土方40多万方，新建渔池2400多亩，建成了国社合一的西湖渔场。从此，这个千年水患之处，成了郊区最大的渔业基地。奎塘河系一条自然水港，弯弯曲曲水流不畅。1973年郊区组织7000多人，完成土方45万多方，将奎塘河截弯调直，并建简易公路桥2座，机耕路桥3座，行人便桥8座，河坝6座，最大蓄水量为6.8万方。此河经截弯调直，加宽整平，纵坡适度，泄洪能力大为加强，又能拦河蓄水，灌溉沿岸几千亩农田。1975年，郊区组织劳力4000多人，完成土石方14万多方，将靳江河改道，修建了从许家洲至谢家屋场长700米，宽200米的河道，水利条件大为改善。

提水设备由人力车、牛车，迅速向机械化转化，彻底改变了农业用水条件，解放了劳力，大幅度地提高了提水效率。1954年，国家投资在我区黎托东山镇兴建了第一个内燃机抽水站，安装两台4110型煤气机，灌田4000多亩。从此，我区农业用水，打响了向机械化进军的第一炮。1955年12月，湖南抽水机总站在我区长善垸的东屯渡试办了全省第一个较大的电力灌溉站，安装55千瓦电动抽水机两台，配套两台16HBH型水泵，国家投资11万元，受益面积7000多亩。六十年代，在全省"电排歼灭战"中，我区排灌设备的发展，以大中型电力排灌站为主。1963年至1969年，全区先后安装大中型电力排灌设备31台，总功率3660千瓦，平均单台容量118千瓦。七十年代，根据农田基本建设和大中型电力排灌站建设工程配套的需要，以大中型渠道建设为主，调整

了原有湖、港水系，结合成方成片平直土地的工作，全面规划了排灌渠道的布局，做到了沟渠相通，排灌自如。现在，全部排灌设备点保有量2820台，总功率26995千瓦，彻底废除了人力水车和牛车，形成了一个以电力排灌为骨干的排灌系统，全面实现了排灌机械化。

建国后长沙郊区蔬菜生产的发展

余韵涛* 李惠兰*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城市人民的“菜篮子”，不断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从各方面加强对蔬菜生产的领导。1956年，党中央提出“城市和工矿区附近的农业生产，应以蔬菜和其它副食品为主”的方针。蔬菜生产纳入国家计划，极大地调动了菜农生产的积极性，促使生产迅速发展。建国初期至今，长沙市区人口由35万增至108万，市、郊的菜土面积由8千亩扩大到4万亩，人平菜土0.033亩。在四万亩菜土中，郊区占三万亩，为总面积的75.2%，其中，常年菜土26102亩，季节性辅助菜土7800亩。近年来郊区每年上市鲜菜一亿六千万公斤，占总上市量的90%，使历年性的三个生产淡季（1－2月、4－5月、8—9月）不淡，即使天公不作美，淡旺差的出现也时间短、幅度小，甚至有的年份淡季还变为旺季。总之，建国40年来，郊区为保证城市蔬菜供应作了大量工作，办了四件大事。

一、建立稳定高产基地

建国初期的郊区菜土主要分布在邻近城区的韭菜园、中

注：余韵涛系高级农艺师，李惠兰原任郊区政府副区长、人大副主任。

心点、广济桥、林子冲、仰天湖、枣子园、水陆洲、溁湾镇、傅家洲、麻园岭、开福寺、砚瓦池以及湘江和浏阳河沿岸的史家坡、鸭子铺、杉木港、滩头坪、东屯渡、藕塘，靳江河一带。1952年，加快了商品蔬菜基地建设的步伐，在原有栽培区内逐步扩大面积。到1958年扩增为17197亩，布局与规模都较为合理。1959年县郊合并，基地向远郊水稻产区发展。由于缺乏种菜技术和劳力，单产不高，品种减少，质量降低。1962年郊区区划复原，重新调整蔬菜基地的布局和面积，才又使蔬菜生产恢复到正常状态。"文革"期间，蔬菜基地建设徘徊不前。1979年，原属长沙县的黎托、洞井、大托、望岳公社划归郊区建制，蔬菜基地相应地在这些公社扩展，分布状况变为近郊占56.9%，中、远郊占43.1%。

菜地建设规模，建国前后也有天壤之别。建国前，菜农租赁地主土地耕作。他们依据地形，围园作菜；打个水池，埋个粪缸，用几铺茅串搭个苗床，顺应气候进行生产，抗灾能力薄弱，产量极不稳定。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多年积极建设，蔬菜基地已具一定规模，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大堤加固：郊区70%的菜土分布在16个大小堤垸内，建国以来，狠抓防洪大堤的加高、加宽、加固，现堤高一般在39至40米之间，并有40%的大堤加砌了护坡，均可达到防御特大洪水的标准。

菜田建设：七十年代前菜田建设的重点是平整土地，共投资698万元，其中国家投资86万元，占12.3%。1980年至1988年底，由省、市、郊三级投资1351.2万元，乡、村（场、管区）自筹资金476.5万元，已进一步搞好排灌建

设。用水泥、预制板或红砖砌排灌沟渠700公里，水粪池4207套，肥库224个，建成了18500亩土地平整成格，排灌自如，运输方便高产稳产的常年菜园，占常年菜土的79.9%。

机械装备：郊区蔬菜生产设备是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起来的。现提水、排渍、运输、追肥、浇灌、喷药以及半年菜土的耕翻等农活，已实行或部分实行了机械化。目前，郊区已拥有排灌动力机械2820台，功率26995千瓦马力，受益面积达12万亩，菜土均处在受益范围内。此外，蔬菜地区还拥有喷灌机251台，其中固定式喷灌设施15处，喷灌机49台，浇灌面积1000亩。还有轻型移动式喷灌机210台，荫菜设施三处，浇灌面积500亩。运输装备有农用汽车836辆、48866千瓦马力，拖拉机635部、9370瓩马力，胶轮手推车351辆，胶轮板车573辆，机动运输船37艘，运送蔬菜生产资料和蔬菜上市，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保护地设施：建国初期，为抗御早春低温、多雨，早熟夏菜育苗主要采用盆缸或茅串覆盖露地，效果不好。1955年开始，采用温床育苗，翌年又示范推广温室育苗。到1981年，全郊以大队为单位建立了夏菜育苗基地，共有单斜面改良式玻璃温室105栋，222炉火，计55680平方米，承担各生产队早熟茄果类蔬菜育苗任务。生产队、组也有相应的专业育苗场地，并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玻璃式薄膜等设备，对夏菜早熟发挥了显著作用。1986年，又到外地学习先进经验，引进了电热育苗技术，改煤能源为电能源，改加热气温为加热土温，改人工控温为仪表自动控温。这样，育苗安全可靠，出苗快而整齐，苗龄期缩短，节省人工和成本，很受菜农欢迎。现郊区已发展电热育苗棚270个，面积有19343平方米，

夏菜早熟育苗技术又跨进了一步。

二、优化和丰富蔬菜品种

建国初期，郊区菜农主要采用地方蔬菜品种，计52个种类，155个品种，而又多属中晚熟品种。上市品种不多，熟性不全，淡旺矛盾显得突出。以后，由于陆续从国内外引种驯化和定向培育，以及杂交优势的普遍利用，据1985年的调查，广泛应用的品种有14类，78种（变种），254个品种，且品种熟性配套比较齐全。其中耐寒蔬菜29种，118个品种；喜温蔬菜10种，58个品种；耐热蔬菜20种，78个品种。如引种驯化的有津研（天津蔬菜科研所）系统黄瓜、青皮墩子冬瓜、黄鼠狼南瓜、黄苗平头甘兰、球茎甘兰、上海青白菜、四月慢白菜、广菜心、红咀艳豆角、挂丝红萬笋、草腰子榨菜、杭州双季茭瓜、槟榔芋、大葱、蘑菇等31个品种。定向选育的有青皮散子冬瓜、湘晚“13号”辣椒、福安早黄瓜、滩头坪迟白菜等。杂交一代优势利用的有湘早茄、韶早茄、韶中熟茄、早蕃茄、青杂中丰芽白等。早、中、晚熟品种配套的有黄瓜、冬瓜、南瓜、苦瓜、茄子、辣椒、包菜、豆角、菜豆、扁豆、白菜、萬笋、菠菜、芹菜、红菜苔等20多种主要蔬菜。

三、改进和发展栽培技术

郊区种菜历史悠久，菜农有较丰富的生产经验。在因地种植、选种留种、轮间套混作、休闲、烤土、以地养地及棚架栽培等方面，都有独特之处，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栽培制度和生产技术。建国后，不断学习外地经验，把先进的科

学技术与传统的精耕细作方法结合起来，极大地提高了蔬菜生产的水平。在抗逆栽培（多季栽培），保护地栽培，软化栽培、食用菌生产，病虫防治和品种选育、杂交优势利用以及生长刺激素的利用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绩。

单说多季栽培一项，建国前，广大菜农对瓜果、根茎等蔬菜均根据其特性，顺应气候搞适时栽培；建国后，大大发展蔬菜不时栽培新技术。1958年，郊区采取“排开播种，早、中、迟搭配，分期出园”的方式安排种植。在开展夏菜和秋菜早熟栽培试验的同时，进行秋菜春播和夏菜秋播的试验，总结了一套以“十春十早”、“十秋十早”为主要内容的不时栽培技术，之后便大力推广。即在春季把芹菜、菠菜、黄芽白、花菜、芥兰等10种秋菜春播；把黄瓜、菜豆、蕃茄、辣椒等10种夏菜采取保护地培育壮苗，带土定植、地膜或小棚覆盖等措施，进行抗低温早熟栽培。在秋季把黄瓜、豆角、菜豆、蕃茄等10种夏菜秋播；把芹菜、包菜、芥兰等10种秋菜采取低温催芽，护阴育苗等措施，进行抗高温的早熟栽培。这种不时栽培，把一年一季生产的蔬菜变为两季或三季生产；一年两季生产的蔬菜变为三季或四季生产。不但克服了历史性的三个淡季，而且丰富了各月的上市品种。在全国都产生了一定影响。1977年9月，全国园艺学会的同志参观了福安乡先锋村400多亩平均单产550公斤的晚熟冬瓜。1989年8月，长江流域十一个城市的蔬菜工作者在我市召开了冬瓜生产现场会议。又如1983年在岳麓山乡菜科站试种的韭黄，现扩展到1600亩，周年都有上市。

四、建立科研机构，发展科技队伍

市郊开展蔬菜科研工作较早。1960年秋，成立长沙市蔬菜科研所，隶属市副食品生产局领导。所址设在东郊国营蔬菜试验农场学堂园生产队。1962年，蔬菜科研所又与市畜牧、水产两研究所合并为市副食品研究所，建立了蔬菜、土肥等5个试验室。“文革”开始，机构瘫痪，后改成农业生产的良种场，停止蔬菜科研活动。1974年，随着当时四化建设的形势发展，东屯渡公社首先成立了蔬菜科研站，接着，韶山路、上大垅、岳麓山、东岸公社和综合农场，东屯渡农场相续成立蔬菜科研站，生产大队和管区也成立了农科队，出现了一派大搞科学种菜的好势头。1975年11月，郊区蔬菜科研所应运而生，配备了12名专干，开展专项科研课题研究，并领导社（场）大队（管区）科研机构开展情报交流。1981年，郊区蔬菜科研所收归市蔬菜科研所。由于郊区蔬菜科技工作繁重，1984年区政府决定再次成立郊区蔬菜科技推广站，定编5人，协同郊区蔬菜局一道抓蔬菜科技研究与推广工作。从此，郊区蔬菜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又稳步地发展起来。

蔬菜科技人员的队伍，建国初期仅有两名干部。1958年以后，陆续从大专院校分配和外地调来充实，现有专业科技干部45人，还有一批长期从事蔬菜科技工作，在生产实践中学习成长的乡、村技术员，形成了一支素质较强的科技队伍。他们为发展郊区蔬菜生产，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作出了忠诚的奉献。

（若曦、火原记录整理）

治理龙王港，建设治鱼仓

梁子成*

溁湾镇北面的望月村，高达六层、八层的居民楼有一百九十八栋，从溁湾镇一直排列到溁银桥。鳞次栉比，整齐美观。望月村是三十年前当地群众艰苦创业，治理龙王港后才有可能开发为今日景色幽美的新村。我于1959年和1965年先后担任改造龙王港、开辟西湖渔场两项工程的指挥，当年人民改天换地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龙王港的传说

龙王港，发源于宁乡、望城两县交界处的云盖山。流经白若铺、推子山、马头坝、梅溪滩，再沿狮子山南麓，绕过岳麓后山的咸嘉湖，在溁银桥注入湘江，全长约20公里。

千百年来，一遇山洪暴发，龙王港奔腾汹涌，泛滥成灾，淹没禾苗，冲垮房屋，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龙王年年吐黑水，穷人岁岁遭祸殃”。不少善男信女，以立龙王

注：梁子成当时任长沙市郊区党委副书记、龙王港工程指挥部政委兼指挥长，现是长沙市二轻工业局巡视员。

庙，修龙王桥来祈祷龙王爷救苦救难，保佑平安，但神不显灵，悲惨遭遇，世代难免。人们渴望降伏恶龙，曾收集近万斤生铁，铸造三条凶神恶煞似的铁蜈蚣，嵌在龙王桥的三跨桥拱上，说是："龙王要从桥上过，蜈蚣铁钳锁蛟龙"，可是，铁蜈蚣非但未能锁住蛟龙，龙王庙和龙王桥也被冲毁了。桥拱上的铁蜈蚣成了行人玩赏的古迹。又传说明朝正德皇帝游幸江南从此经过时，恰遇上当时的湖主征集民伕挑土筑堤，便将河堤起名为"圣堤"，还重修了龙王桥，在新铺的每块麻石上刻上"正"字，想借皇帝的年号来镇住龙王，结果皇帝也无能为力，"龙王飞起桥上过，不怕皇帝和圣人"。解放前，龙王港下游一直是荒湖。民谚有："咸嘉湖年年收不到谷，打鱼捞虾的也急得哭"，说明了这里是十年九不收的穷地方。

初治龙王港

１９５９年，当地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千人上阵，将龙王港下游围湖加固，堤身加高，并装上了电动排灌设备，抗洪、排渍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两岸人民开始受益。但由于河道迂回曲折，河堤高低不一，堤外地势低洼，河床未加疏通，洪涝灾害的威胁仍很严重。这个地区共有水田１６００多亩，水面３３０多亩，耕地和水面不能充分利用，生产总是没有保证。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５年，就有三年（１９６１、１９６２、１９６４）遭洪水淹没，垸内一片汪洋，蔬菜、鲜鱼，水稻均无收获。常年稻谷产量亩产不过２６０斤，养鱼水面只能利用１３０亩，有２００亩荒

废。很多社员说：龙王港不改道，就莫想有好日子过。一见涨水，心就冷了，大水一来，蔬菜，水稻被淹，鱼苗随水跑掉。洪水还威胁着溁湾镇地区的六百多户居民和一些单位的生命财产安全，往往造成'房屋倒塌，交通阻断，环境脏乱'时疫流行。

再治龙王港

１９６５年冬，市、郊党委顺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决定再治龙王港，让河水直线下流。改道后，龙王港经由三角塘、五星堤、望新桥、咸家湖、铜盆湖，从老口注入湘江。改道工程把３４００多米旧港截弯调直；拆掉龙王庙，搬开铁蜈蚣和"正"字石；移开两座石山，沿扇子山下开凿一条６０米宽，６米深，３２００米长的河道；沿新河修筑一条１２米高，４米宽，５２１０米长的大堤；从溁湾镇到六沟垅，从长宁公路至咸嘉湖疗养院新建两条７米宽，２６００米长的公路；同时配套新修岳麓和溁银两座公路桥，桥跨距５２米，高１８米；在扇子山附近修建行人便桥一座（高１３米，长５２米）；在仰天湖建起双孔１.４×１.８米石墩钢筋混凝土盖板排水闸两座，水泥管四孔，并安装排水电动抽水机。从此，可以彻底消除千百年来危害人民的洪水灾害；可以使１４００亩良田实现旱涝保收，以平均亩产８００斤计，可年产粮食１１２万斤，比治理前常年总产４２万斤增产７０万斤；可以扩大养鱼水面３４０亩，以亩产２００斤计，年可上市鲜鱼６８０００斤；可以使溁湾镇一带６００多户居民和所在工厂单位免遭洪水威胁，可以使

长宁公路车辆，龙王港上游船只畅通无阻；可以美化长沙市西大门，为岳麓山名胜区增添景色。

为了具体领导指挥这项工程，郊区成立了长沙市郊区龙王港改道工程指挥部。我（当时为郊区党委副书记）任政委兼指挥长，岳麓公社党委书记廖振云任副政委，岳麓区副区长姚跃民任副指挥长。指挥部下设政治宣传科、工程技术科、物资供应科和办公室。

整个工程共有土石方70万方，除望云桥、咸嘉湖、麓山三个受益大队全力投入战斗外，还决定发动全郊各社队民工3000余人支援。采取分段包干任务的办法。工程于1965年11月上旬开工，次年2月底结束。费用由国家资助和社队自筹相结合，共筹资金42.3万元，粮食55万斤。

回想当年治理龙王港，工地上红旗招展，热气腾腾，修河的专业队、突击队、支援队汇集一起，日夜奋战。有线广播不停地播放工地好人好事，决心书、挑战书。履带拖拉机在堤上穿梭夯压。真是“机器隆隆响，银锄处处飞”。这块沉睡的土地沸腾起来了。经过135个日日夜夜的拼搏，胜利完成了改道的任务，千百年人民祈求神灵保佑的幻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改道工程因要开河、要筑堤、要建桥、要修路、要堵口、要建闸，还要安装排灌设备，需要花费几十万个劳动日，完成七十多万土、石方工程，确实任务艰巨、困难很多。郊区党委，郊区办事处发动群众，群策群力，经过几千劳动大军苦干、实干、巧干，终于战胜了一道道难关。

第一道难关是搬石山难。在何家大屋附近先后遇到了三座石头山，长约三百米，有二万立方石方。东岸公社担负了凿山的任务，民工进场，看到了要搬走这石头山，冷了半截。我们组织大家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边学边议，大家说：“古代愚公能移山，那只是神话一桩，我们能移石头山，这才是真事一桩”，“石头山，石头山，那怕你是尖刀山，我们也要挖平你，叫你投降！”大家手挖肩担，凭着双手，一座高大的石头山硬是搬走了。

移烂泥难，是第二大难关。望麓桥，望岳桥，龙王港出口，仰天湖堵口，四处工程有烂泥塌方四万八千方。仰天湖的堵口任务落在岳麓山公社麓山大队和桃花大队三百多个劳动力的身上。在这里要把老港拦腰截断，并且建筑十二米高、四米宽的新堤，清理工程既不能马虎，又要日夜突击抢速度。搬走淤泥，只能用铁瓢、水桶，一瓢一桶地往外搬，人们满身淤泥，活像个盐鸭蛋，这样连续战斗了许多个日日夜夜，淤泥搬走了。开始筑土了，当填土达六米高时，堤身一晚突然坐落一米，以后继续加土、继续下沉。这时有些人泄气了，并说：“这是龙王爷的报复”。大队的同志并没有为此消沉气馁。高山遮不住太阳，困难挡不住英雄汉。他们分析下沉的原因是被截断的老港处于港身最低处，它有许多浸水小眼，新土被浸水注入，才导致塌方，决不是什么“龙王爷的报复”。于是在内坡加修三千多方的平台（又叫矮子堤），才稳定了堤身安全。

第三大难关是建涵闸，修桥梁。工地上有岳麓桥，溁银桥，行人便桥，仰天湖涵闸等四处工程要同时兴建，且要求很高。溁银桥是一座跨距五十二米、高十八米的石墩钢筋混凝土面的公路桥。当南岸桥端墩基挖到河底标高二十米以

后，公路路基滑坡倾斜，挖一点，它填一点，白天挖走，晚上填满，使你无法挖到岩层。大家学习了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方面动员群众继续干；另一方面求助于专家、教授，请了省、市搞土木建筑的工程师到现场察看，献计献策。但是，正值社教运动时期，提看法建议的人不少，却没有一个敢承担责任的人。议来议去，最后决定扩大基础。将二十五根直径三十厘米的水泥电杆承重桩夯打到岩层，再用石头护坡保护桥墩，才完成了建桥任务。

第四大困难是解决几千民工食宿。三千人的专业队，加上支援的民工，工地上经常保持有五、六千人。就住宿一项来讲，对溁湾镇这块只有六百多户居民和十来个生产队的地区的压力就够重的了。省委党校，省财贸学院，省森林疗养院帮助解决民工用房。受益区咸嘉湖等大队的社员，主动让出房屋二百五十多间，借出稻草十多万斤，门板一百九十五块，豆竹子竹尾巴三万五千多根，土砖一万三千多口，木材五十六根，床二十五个，炊具五十六件。河西的省、市级机关，厂矿、学校等四十个单位的领导和职工慰问开河大军，仅慰问信就达七百多封，慰问品有草鞋四千五百双，香烟七百多盒，蛤蜊油四千五百盒，蔬菜两万斤，鲜鱼一千五百斤，肥猪十二头。并纷纷来参加义务劳动，共完成了一万二千个劳动日，一万多土方。市、郊物资部门还及时供应物资，医疗卫生部门组织医务人员带药到工地巡回治疗，文化部门派出轻骑队到工地慰问演出。四方八面，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援和鼓励了改道大军。

还有许多难关，比过“五关”还多还难。例如资金欠缺，我们只能咬紧牙关，节约开支。工程指挥部几十个工作

人员，四个多月办公费开支才二百五十元。又如建筑材料紧张，而建桥、涵、闸需三千五百块方石，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发动群众到牛形山开采来的，其余则用拆旧利废的办法解决。

开辟西湖渔场

改道龙王港和开辟西湖渔场，是一个整体工程的两个部分。龙王港改道以后，筑起38米高的防洪堤，安装了电动排灌机，垸内的废河旧港修成了人工湖，增大了洪水的吞吐量，从而确保了这一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安全。

废河旧港水面有约600亩，溁湾镇、咸嘉湖一带的工厂企业每天有近2000吨污水排入，可供利用养鱼，特别是长沙酒厂的酒糟、糟水是养鱼的好饲料，因此不论从城市建设，还是从水利建设出发，在这里建鱼湖有百利而无一害。省、市水利部门特别重视，要求在这里围堤建湖。分管水产的省农业厅副厅长姜亚勋几次来郊区敦促，要我们下决心动工。

渔湖将建在长河西部，岳麓山下，故命名为“西湖渔场”。

按照当时郊区安排，本应1966年动工建湖，因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耽误了建湖工程，直至1973年冬，郊区党委决定成立兴建西湖渔场工程指挥部，派我任政委兼党委书记。郊区革委会副主任张干云任指挥长，郊区武装部部长邬牧星任副指挥长，决定从全郊抽调7000民兵修建渔湖。12月26日工程指挥部在工地召开了建湖誓师大

会，兴建西湖渔场的工程战斗全面打响了。只用了十五天时间，共完成土石方56万方，把原来垸内的老堤、废河、湖田、甩亩变成了60亩水域成块，畜深三公尺、排灌自如的人工养鱼湖。共有大小鱼池36个，渔池堤㟜总长10425米，拥有养鱼水面1000多亩，可利用池㟜栽种鱼饲料122亩，成为我郊又一个规模较大，标准较高，以鱼为主，鱼、菜、猪、果结合的综合渔业生产基地。

1974年冬，郊区党委决定三治龙王港。这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对整个工程效益有决定性作用。区委派张干云同志任指挥长，李维裕同志任政委，刘宝山、张麓山同志任副指挥长。吴忠、苏伟同志任副政委，十二月下旬7000多民兵开到工地。刮风下雨无所惧，数九严寒摆战场。经过30多个日日夜夜的战斗，将龙王港上的大堤规直了；将岳麓桥至望麓桥1400米长的河道挖通了；沿河筑起了一座2500米的防洪大堤和16座桥涵；扩建了望麓桥湖、疗养院湖；按东西定向，40～80亩成湖，围成三个大湖，共扩大养鱼水面800亩；新建11条、全长2400米的鱼池港；完成土石方45万亩。这一扩建工程，扩大了鱼湖，改善了水利条件。以后，又经过逐年加修建设，使整个鱼湖成龙配套。现在从南到北原13个自然湖，即潭家垸子、三角塘、石家垸子、杨梅湖、小冲垸子、王家坝子、湾湖、荷家湖、仰天湖、铜盆湖、望岳湖、咸嘉湖、吉家湖等，湖内都按东西方向，开挖成若干小湖，一个接一个，星罗棋布的摆着。鱼湖主渠道上挺拔直立的松柏，已有十多米高，绿叶成荫。长沙酒厂的糟液源源不断地流至湖内，日达千多吨，足够鱼的受用了。溁湾镇街上，又有七、八十幢新

楼，拔地而起，有一百多个工厂，事企业单位先后建在这里。溁湾镇地区的人口已达三万多人。从望麓桥到湘江的大堤，均用麻石和水泥护坡，那五里堤过去叫“圣堤”、“官堤”是长沙至宁乡的必径之路，今日只是一般的简易公路了。三角塘、仰天湖安装了5台电动抽水机，475瓩电力排灌设备全部投入使用。渔民在鱼湖捕鱼，鱼跃人欢，笑语喧哗，此起彼伏。鱼湖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全场现有847户，2847人，共有养鱼水面2002亩。年产鲜鱼，从1974年的35吨逐年增加，到1980年的320吨，1984年建场十年时超过500吨，1990年产鲜鱼810吨，被誉为长沙市的“活鱼库”。

今昔长善垸

曾干龙* 杨本立*

长善垸又名杨家山围子，位于长沙市东郊浏阳河和奎塘河畔。东、南、北三面与朝镇、东岸、合丰三垸隔河相望，西面紧接市区，海拔32米，总面积约22平方公里，可耕地10747亩。垸内有马王堆乡、东屯渡农场、湘湖渔场三个乡、场和近百家企事业单位，三万七千八百多人口。

长善垸在五代时期（公元907年—960年）此地已开发垦殖建垸防洪。直到北宗元符元年（公元一〇九八年）因长沙分置为长沙、善化两个县治，此垸地跨长、善二县，故名长善垸。又因它在杨家山麓，亦称杨家山围子。这里正式建成堤垸，并能发挥防洪效益，还是在清朝咸丰七年（公元一八五七年），至今已一百三十余年。

长善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与靖港、大围子等鱼米之乡相媲美。解放后又成为长沙市的主要副食品生产基地之一，是一个商品蔬菜、牲猪、鲜鱼以及其它副食品的活仓库。加之它地处省会东大门，省委、省军区、外宾馆、长沙车站都在垸内，京广复线319围道又贯穿全垸，

注：曾干龙原任长善垸堤委会主任。

杨本立现在东屯渡农场工作。

因此政治、经济和交通都非常重要，为我省十大堤垸之一。

解放前，旱、涝、洪水是长善垸的主要自然灾害，是一个“三日晴天田开圻，一天大雨水汪洋”的地方。直到解放前夕，长善垸的防洪大堤高度还不到35米，比本地历史记录的最高洪峰水位要低两米多，因此不能抗御较大的洪水冲袭。每当浏阳大围山和奎塘的冲山洪暴发或洞庭湖西水倒灌，浏阳河和奎塘河泛滥，河水横溢，不是漫堤而过，就是河堤溃塌数丈或数十丈，有时垮口多达16处，致使堤垸之内一片汪洋，尽成泽国。庄稼淹没，房屋倒塌，人畜漂浮，其状惨不忍睹。百姓即使幸免于死也是讨米逃荒流落他乡。给垸内人民造成严重灾害。又由于这里地势太低，垸内的自然圳、港淤塞，又无任何排渍防涝设备，只要降雨一百毫米左右，渍水就无法排泻，垸内的白泥湖、放马湖、晏家垅、马王湖一带，即成为白茫茫的一片，乃至漫及全垸三分之一的面积，使半数以上的耕地被淹，造成禾苗颗粒无收。“万民坝”是当时全垸唯一蓄水防旱的水坝，但蓄水量小得可怜，美其名曰“万民”，其实只有垸内少数几家地主豪绅可以受益独享。每遇干旱年成，穷苦农民只能眼巴巴地望着禾苗枯竭，造成歉收或完全无收。仅据《湖南自然灾害年表》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自一八五七年长善垸建成，至一九四九年解放的九十二年中，长善垸遭受的自然灾害即有52次之多，其中水灾22次、旱灾10次、虫灾4次、风灾4次、雹灾和冰冻6次、大饥荒6次。平均不到两年即有一次较大的自然灾害，有时甚至一年之内出现水、旱、虫、风等多种灾害。旧社会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天灾与人祸，使长善垸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虽然年年向人民收亩捐、摊堤费、派

工、派款，但真正用于修水利的费用不到百分之五十，其余均被堤局总管、包头们以各种名义层层鲸吞，致使堤垸内崩外泻，隐患无穷，水利失修，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证。更有甚者，每年长善垸溃垸，一些地富奸商却乘人之危，大肆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发灾难财。当时长沙城乡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水淹杨家山，米涨三吊三。富人发横财，穷人饿肚肠"。这是长善垸苦难历史的真实写照。

解放后，党和政府雷厉风行，重新组建长善垸堤委会，专门负责防汛工作。一九五〇年冬，当地民众加上前来支援的驻长部队官兵共万人上阵修堤。开始了大规模的筑堤工程。一个冬天使长善垸防洪大堤高程达37米。一九五四年，浏阳河洪峰水位达38.24米，只好在堤上打眼峰引水入垸，以防溃垸，垸堤虽保住，但垸内一片汪洋，损坏惨重。党和政府急群众之所急，就在这一年再次组织人力、财力大规模修堤。从此以后，逐年把堤垸加固加高，现在长善垸大堤北起湖南油漆厂，南达矿山重型机器厂，全长12100米，堤顶平均高程在40米以上，面宽8－10米，基宽40米。为了加固堤垸，还铺设石块护坡4250米，计46450平方米；块石护脚6250米，计25670平方米；混凝土护坡3500米，计64590平方米。同时建有一些防汛辅助设施，如1988年在火炬民主屯筑防渗板墙100多米，省、市、郊共投资七十多万元。

解放至今，长善垸连续四十一年未溃过垸，1954年后垸内也从未被水淹过。为了解除旱、涝威胁，建立大型排灌站5处，拥有大型排灌机械23台，装机总能量达3099瓩，此外修排灌渠14条，长37532米，安设各种涵闸、桥涵、管道56

处。于今，长善垸排灌量每小时可达48762立方，且水路畅通，做到了随积随排，随旱随灌。

曾经多灾多难的长善垸，今天已是长沙市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副食品生产基地，且呈现出农、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商、交通百业兴旺的社会主义新气象。抚今思昔，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

长沙"南大路"史话

杨国兴*

长沙市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长沙西临湘江，东傍浏阳河，浏阳河流经城北汇入湘江，因此东、南、西、北四城门，唯南门外有陆路向外延伸。传说三国时代关公大战长沙，曾会战于南门外，现有古迹可寻，如驻马歇足的歇马岭、依石磨刀的关刀铺、挥剑断山的斩龙坑。本世纪北伐军和中国工农红军两次攻打长沙，南门一带均为军事争夺要地，成为长沙要隘，其外的"南大路"历来是通衢要道。

据邹令西、杨竹书等老人的介绍，原长沙的城墙从天心阁向西湖桥方向延伸，经今日的南门口出城，就是"南大路"。古南大路是一条不甚宽的泥沙驿路，又叫醴陵大路。明代中期，长沙绅商捐资在南大路铺上了一尺多宽的麻石，称为长沙南乡麻石大路。改建时，由于受土地私有制的限制，路面的宽度没有增加，直至1949年，其路面仍只有四米宽左右。

古南大路的线路是：南门口—社坛街—燕子岭—老龙潭—扫把塘—牛婆塘—黄土岭（第一亭）—七里庙—雨花亭—

注：杨国兴原任洞井公社副书记。

石马铺（第一铺）—彭家垅—赤岗岭—黄泥塘—井湾子（第二亭）—沿岗岭—王木桥—洞井铺（第二铺）—和太平—桃花凼（第三亭）—三溪桥—桃谷庙—大路上—白田铺（第三铺）—文昌阁（又名同仁堂、长安寺，即今白田中学）—苏家垅—班竹塘（第四亭）—石燕铺（第四铺）—磨石塘—跳马涧—关刀铺（第五铺）马安山—龙头铺（第六铺），直通株洲，伸向渌口、醴陵县城。这条南大路主线，都以五里一亭，十里一铺，作为行人的歇宿点，很早以前，每铺就设有饭店、茶馆、南石店、屠坊等十家左右店面，每亭也有茶和食杂供应。

另外，南大路在白田铺往西南有一条支线：白田铺—易家坳子—茶坡—旱塘—歇马岭（五里第一亭）牛角塘—姬祝庙—坝子塘—唐家垅—田心桥（十里铺第一铺）—皂壳树—水口山（第二亭）—人形山—许家桥—荷叶塘（第三亭）—汉金塘—九曲黄河—易家湾，向湘潭市方向延伸。这条支路亦是麻石路面，路面也是四米左右。

南大路沿线，在清代，既无邮政投递，更无电话通讯，只在每铺设一个"火把差"，（晚间打着火把送信）即是送信的传递员。笔者的曾祖父杨福安，曾担任过洞井铺至白田铺的火把差。

解放前的南大路破烂不堪，行人叫苦不迭，曾把它称为"烂大路"。

１９３８年文夕大火前夕，蒋介石推行"焦土抗战"，长沙国民党当局大肆抓夫挖路毁路，说是为了阻止日本鬼子进长沙。南大路沿线各地由乡、保长带队督阵，每百米左右用麻石筑起约两米高的横截路墙。墙下挖两米深的洞，路面

只留一尺多宽，且高低不平，弯曲不直。毁路不到十天，日寇到了，又大肆抓丁修复大路，由“维持会”主管，洞井乡分担修填九公里半路的任务，参加过毁路、修路的劳动力约2100多名，其中多人因消极对抗被日本人打死打伤，或因年老体衰不胜劳累而丧命。日本投降后，长沙当局又发布命令修路，18—45岁的劳动力都要修路十天。1938年5月，我在沿岗岭（现省中医南院后山岭上）挖过三天路。1945年7月，在洞井乡桃阳村（原桃谷庙门前）修过三天路。毁路修路，几经折腾，苦了沿途百姓。

新中国成立后，南大路随着长沙市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线路缩短。1952～1958年，南门口至侯家塘段改建劳动路，侯家塘到石马铺一段并入长潭公路；黄土岭至洞井铺于1958～1959年，由长下公路（即今韶山路）代替，两次改建缩短路线10公里。

二、扩建改名。1963年下半年，长郊管辖的洞井铺至苏家垅路段（9.5公里），由洞井公社组织2000多个劳动力，用一个月时间，将4米宽的路面扩为6米，加铺砂石，改名为长龙公路（洞井铺—株洲龙头铺）。1964年6月，长龙公路开始行驶汽车和其他机动车辆，结束了南大路只能通土车、板车的历史。

三、改建升级。1975年冬到1976年春国家投资93000元改建洞井铺至苏家垅路段，由洞井公社再次组织2500个劳动力，由我任指挥长，调直路线2.5公里，路面加宽到8米，并铺上柏油。这段路随后与改修后的苏家垅至株洲段合名为洞株公路。1976年上半年，由东塘至

跳马有市内第20路公共汽车往返，城乡交通十分方便。

今日洞株公路，即从前的南大路，路基巩固，路面平坦，两旁绿树成荫，车辆如梭，呈现一片崭新风貌。

同升水库的修建

杨国兴

长沙市郊区洞井乡，紧邻城市，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理当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然而解放前农业生产总是上不去，人们生活贫困，不少农家只能靠妇女打草鞋维持生活，俗话说：有女莫嫁洞井铺，搓烂手板擦烂裤。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水利设施缺乏且落后，“一日大雨满垅淹，三日无雨车水忙，十日无雨遭干旱”。全乡两万亩耕地面积，抗旱能力只能维持２０天，保收面积只有１５％左右。农民遇到干旱就求神拜佛，抬起菩萨游垅求雨。求天神不灵，种田人只好挨饥受饿、卖儿卖女，生活十分艰难。

曲折的探索

１９４９年，人民翻身作了主人，从此开始了改天换地的战斗。党和政府致力发展洞井的农业，每年冬春都发动群众大修水利。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全城的水利建设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年到1954年。对八十多处山塘水坝进行了一至两次整修，增加了蓄水量，使持续抗

注：杨国兴是当时水库工程指挥部的副指挥长。

旱时间延长到30来天，保收面积扩大到总面积的30％以上。第二个阶段是1954年至1959年。正值农业合作化高潮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男女老少，全力以赴，日夜苦战，兴建了均塘子、大塘、高升、荷叶塘、龙塘、大冲、月塘、夜明八个蓄水量五万——十万方的小型水库及60多口骨干塘，使全乡80％的耕地插上了双季稻。第三个阶段是1964年至1975年。当时省委书记周里、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省委常委王治国，市长王群伍、长沙县（洞井当时隶属长沙县）委副书记陈学明等领导同志在洞井蹲点。他们深入实地，视察水源，策划从湘江、浏阳河引水到洞井。通过认真讨论，领导们决定为洞井新建三个电灌站，一个是从浏阳河东斯港引水，三级提水到天上山，主渠全长九公里；一个是从湘江豹子岭引水，四级提水上金井村团仓山，主渠经大托乡、石门乡、南托乡，全长十六公里；一个是在东山引浏阳河水，三级提水到月塘村的枯塘口，渠道全长七公里。公社党委动员两千多个劳动力修渠，提出了“全民齐上阵，开通百里渠，建好三个站，大旱夺丰收”的战斗口号。群众离家十几甚至几十里，风餐露宿，但干劲冲天。金井村党支部书记邹少云说：“我们要挖开坳子山，搬走金井塘，引来湘江水，世代不愁干”。全乡干部群众苦战一个冬春，先后把三个电动抽水站及配套渠道建成了。至此，全乡抗旱能力可达40多天，双季稻面积扩大到总面积的90％，保收面积有50％。但是，引水线路过长，可谓“远水难救近火”，且用水要先近后远，群众花工守水，也难收效，大旱之年仍只能望苗兴叹。

宏伟的蓝图

为了彻底摆脱旱魔的纠缠，1976年春，公社党委决定修建一个中型水库——同升水库。同升积雨面宽，库容量大，坝基轴短，地势高，是理想的建库位置。

同升水库设计的各项指数是：积雨面为二点五平方公里，正常库容量三百八十万立方米，最大库容量四百三十六万立方米，坝基长度一百一十米，高程二十一米。附属水利设施有南、北干渠两条，全长二十五公里，加上各村进水支渠二十六条，总长度为五十多公里。主干渠上有五条隧道，长度四百一十米；八座渡槽，长度一千一百八十米，其中白田渡槽，槽宽一米，流量0.8立方米/秒，全长七百一十米，高二十一米，有混凝土擎柱四十一根，好似一条长龙，飞跨两个山头。此外行人石桥五十座。整个修建工程要完成土石方四百七十五万立方，其中砌石（含混凝土）五千八百多方。工程共需三十多万个劳动日，造价六十二多万元。水库建成后，受益耕地面积可达一万六千亩，其中水田一万三千八百亩。并规划在水库的周围造林绿化，规块成行地培植茶、竹、杉、果，在水中养鱼，决定使水库收到灌、种、养等综合效益。

艰巨的创业

1976年8月，按设计要求，同升水库开始动工兴建。洞井公社成立了水库工程指挥部，由朱定发任政委，艾健生、严登高任副政委，陈世达任指挥长，我和曾定一任副指挥长。工程指挥部下设组织、宣传、工程、后勤四个组，分别由唐金龙、李早桂、曹启明、唐德兴任组长。各大队成立工地指挥所，由各大队党支部书记任工地党支部书记，大队长、民兵营长任正副所长。指挥所下分别组成民工排、班。以各大队为单位建立工地食堂。

第一战役是修筑水库大坝。通过深入宣传发动，全乡有三千一百个劳力上阵。阵地上红旗招展，战鼓喧天，高音喇叭里捷报频传。所与所，排与排，班与班，人与人，展开了插红旗、树标兵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工程指挥部提出的“三千大军齐上阵，团结奋斗建同升；人人争当英雄汉，擂台榜上见功勋”的战斗口号鼓舞下，出现了不少的先进人物。金井大队大队长杨杏松同志，自始至终住在工地上，路近不回家，不缺班，日夜与民工同劳动。在这一战役中，有五百一十位民工分别受到各种形式的表彰。由于全体干部积极带头，广大民工鼓足干劲，在近九十天内，完成了二百一十万方土方任务，大坝筑成了。

第二战役的主要任务是开挖渠道，于同年10月动工。工程上采取了群众运动与专业队相结合的办法，群众运动包土方，专业队包技术活，集中兵力大抓附属建筑的配套，于次年3月渠道开挖等完工。1977年9月至同年底，开展了最后一战，建起了白田渡槽，开通了戴家冲等四条隧道。

可观的效益

同升水库是郊区最大的水库之一。建成后的第二年（1978年）即发挥了巨大的效益，保证了全乡农业生产

用水，又满足了乡镇企业的需水量。1990年是近二十年来秋旱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年，但全乡一万六千亩晚稻，没有干死一蔸禾，且仍得丰收，同时还从未间断过向十二个乡办企业、五十七个村办企业（其中有十个需水量大的机制砖厂）供水。干旱过后，库存余水还有一百二十五万立方。

于今，同升水库周围山青水秀，风景优美。同升水库的修建不仅解决了洞井乡工农业生产的水源问题，而且美化了环境，给本地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吃水不忘挖井人，后人要牢记前人创业的艰难，发扬成绩，奋发努力，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

谭阳垸防汛“三部曲”

黄步云*

浏阳河以其两岸风景秀丽，物产丰富而著称，也因其几曲回环而有名。它蜿蜒至下游梨江段盘成一个“U”字，把谭阳洲紧抱怀中。谭阳洲其实不是洲，西面有约两百米见方的河套与川河村相连，每遇洪水，河套淹没，U口被封，才成为名副其实的洲。河道迂回，水流不畅，历史上，防汛一直是谭阳洲人民的心腹大患。今天谭阳洲堤高垸固，旱涝不愁，其间有着不平凡的经历。我自1954年始任谭阳村村干部，1974年起又兼任谭阳垸堤委会的领导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对谭阳洲的防汛历史比较了解，认为谭阳垸的防汛可分三个阶段。

一、从屋场围子到谭阳垸的雏形

传说元末明初，朱洪武血洗湖南，江西人纷纷迁徙入湘。谭、杨两姓人来该洲插草为标，平分土地，故名为“谭杨洲”。随后，迁来洲上的人日增，姓氏日杂，为消除宗族观念，遂改名为谭阳洲。

谭阳洲原属长沙县管辖。当时该洲是个敞垸子，河水稍

注：黄步云系谭阳村的党支部副书记，黎托乡堤委会成员。

涨，漫上洲来，泥沙淤埋庄稼，洪水冲毁房屋，洲民痛苦不堪，怨声载道。为了防水，聚居在一起的人家共同挑起屋场围子。当时有句顺口溜“六住六把伞，吃饭不要喊”，这形象地反映了洲上的布局。洲中人一般是同姓相聚，所谓“六住”，即谭住、杨住、黎家大屋黎住、后河杨家杨住、八字槽门黎住、汤、李合为一住。

屋场围子高度有限，也不见得坚固，洪水常越围入户。洲民为保全房屋，在小竹子上缠稻草，再涂上一层稀泥，当作墙壁，名之曰毛蜡烛。

随着时日推移，人口逐渐增长，屋场围子显得窄小，又因围堤作用甚微，于是在光绪二十七年，由地方团总安排，按田亩派工，把各屋场围子联为一体，并有限地加固加高围堤，至此形成了一个鼻子形的大围子。围堤全长五千米，堤顶面宽约一米，高度为三十四米左右，这就是谭阳垸的雏形。

筑堤虽可防洪，但每年汛期过后，水位跌落，河水很难引入洲内。到了干旱时节，只好在堤上设置牛拉水车和人踩水车，车水码头共十八个，每个埠头可放七条车同时车水。特旱年成，车水不足，还得靠男女老少挑着水桶下河。尽管洲民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春夏受涝，秋冬遭旱的局面始终未能解决。

二、有堤无防，凭经验治水

清末以后，谭阳洲虽有了堤垸，但经常是河水盖堤，或局部溃堤，并没有阻止洪水肆虐，形成有堤无防的局面。

民国十三年，洪水越堤泻入洲内，秋季作物全部被水冲

毁。民国十五年，洪水淤积洲内，凡土砖屋全部都垮塌，如杜家大屋、杨家公屋等。民国二十七年，后河穿孔，洲民人心惶惶。

民国年间，兵荒马乱，政局动荡，民不聊生，对河堤自是无暇顾及。仅只民国十五年大水后，长沙县责令地方团总整修堤垸，由杜子元、黄振武、黄福全、邹寿耆负责。这次修堤只是把堤加高三米，个别堤段拉直，堤的坚固与否未予重视。

堤身不坚固防洪无保证，每临汛期，洲人日夜守护，但仍难测灾情，难免灾祸，不过人们在长期的防汛工作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1、散浸治理：散浸是由堤土干枯开拆，或蚁穴、鼠洞所致。治理散浸，可在堤内开“人”字倒浸沟，用土制大布滤水保土；或用麻袋装满卵石，围一个圈，做一个一米多高的倒滤井，用土大布垫井底，再用大块石压上，中间填小石子，上层铺沙子，叫压浸台。如散浸引水穿孔，最理想的办法是堤外堵死。

2、外脱坡治理：堤外脱坡主要办法是抛石稳脚，削坡还基，阻止堤土泻入河床。

3、堤顶踏眼治理：堤顶踏眼是坟墓、蛇洞、树兜朽烂引起，主要办法是在眼里灌卵石，堤外侧铺上油布或晒垫，再用卵石袋压紧。

4、涵洞堵塞方法：用钢管焊接成块，或直接用铁板拦住涵口，再用一袋袋卵石抵住挡板。

5、风浪治理：砍下树叉，摆放堤的外侧，再在树叉上压放卵石袋；或用塑料薄膜、晒垫铺在堤的外侧，减弱风浪

对堤面的冲击。

这些防水措施毕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要提高保险系数，还得靠稳固的堤防，这个难题直到解放后才解决。

三、垸高且固，旱涝保丰收

一九五四年，浏阳河洪水空前，梨江段洪峰水位达三十七．八一米，高出谭阳垸零点八一米，六月十五日、二十七日先后两次溃堤。人民政府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在溃垸后制订了长期的堤垸建设规划。谭阳垸由梨托公社堤委会直接指挥，由谭阳大队具体组织扩建。为确保堤垸质量，大队专设工程员一人。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八年，筑堤工作热火潮天，人民积极性很高，抓晴天，抢阴天，毛飞细雨是好天，晚上当白天。谭阳大队分六个组，晚上还点煤气灯挑堤。

一九六三年，为充分利用耕地，把堤外甩亩围到堤内，开始扩大垸子。谭阳垸扩大后全长达七千五百米。至一九七六年停止挑堤时，垸堤高达四十．五米，宽六——八米，从此谭阳垸堤高而稳固，河水只能老老实实在河床流淌。

党和政府在巩固堤防的同时，十分重视谭阳洲的排灌问题。一九五五年，谭阳大队添置柴油抽水机一台，废除了人车和牛车，减轻了劳力负荷，一九五八年建起了五十五千瓦的电动抽水码头。一九六一年开发娘娘坪两百亩水面，积水以备抗旱。一九七九年添五十五千瓦排积机两台，保证了洲内排灌畅通。

一九七八年，谭阳洲划归长沙市郊区。此后，洲民的精力从防洪转移到田园化建设，平整了土地，修建了水渠三万

零六百三十九米，其中水泥渠道一万七千零七十三米，一年四季，水旱无忧，旱涝保收，瓜菜满园，谭阳村成为长沙市重要的蔬菜基地，难怪村民中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

过去谭阳洲，十年九不收；
南瓜煮稀饭，一年难到头。
现在谭阳洲，农副两丰收；
搭帮共产党，穿吃不用愁。
今后谭阳洲，水随人意流；
村民都富裕，更上一层楼。

奎塘河治理工程的回忆

吴忠*

奎塘河发源于长沙县石门乡鸭咀冲水库，全长八十余公里。从洞井同升流经雨花亭乡自然村段称为奎塘河，约一万四千多米。由于年久失修，水流不畅，致使沿河两岸大雨洪灾，无雨旱灾，两万多亩农田长期处于灾害之中。解放后虽搞了一些桥坝建筑，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八年曾两次山洪暴发，下游两岸的六个大队，四十九个生产队浸渍农田达五千多亩，周家桥一个生产队就淹倒房屋三十多栋，红旗内燃机厂浸水达一米多深，停产一个月，损失极大，因此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党和政府根治这条害河。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五年，曾经两次规划治理奎塘河，因种种原因而未能付诸实施。

一九七三年秋收后，根据市委指示，郊区党委研究了奎塘河治理的规划，但认识不统一。有人考虑到治理工程投工多，负担重，将减少社员当年分配收入，影响城市的蔬菜供应，耽误冬修和来年备耕工作。后来在市委的帮助下，对照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郊区，联系自己找差距，并围绕农田基

注：吴忠原系治理奎塘河工程指挥部副政委。

本建设和农业生产条件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党委一致认为，搞农田基本建设，是从根本上改善农田生产条件，郊区农业要腾飞，就必须建设稳产高产的大片农田。

郊区党委下定了治理奎塘河的决心。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发出了"关于成立长沙市郊区治理奎塘河工程指挥部的通知"，由李维裕任政委，张干云任指挥长，我和苏伟、冯岳中任副政委，郭福新、黄国华任副指挥长。工程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政宣组、工程技术组、后勤组、保卫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随即召开了社、场党委书记会议，层层发动，全面动员，并由一名区委常委带领工程班，深入现场，与当地基层干部、群众反复磋商，落实规划，精心设计。十二月一日，中共长沙市郊区委员会、郊区革委会和武装部联合发布了"治理奎塘河工程动员令"。当时东屯渡公社书记李惠和同志决心大，只花了两三天时间动员和筹备，十二月一日，全社就有八百五十个民兵开赴工地，为提早开工带了个好头。十二月五日，指挥部在现今雨花亭乡莲湖村和井塘村之间的半山腰的大坪上，召开了七千民兵誓师大会。主席台正中端放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四周挂着"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等大幅标语，主席台两边挂着"以路线为纲，加速搞好长韶路农田建设；奋战三十天，全面完成奎塘河治理工程"的大对联。下午三时半，七千治河民兵从各工地涌进会场。在大会上指挥长张干云宣读了开工动员令，政委李维裕讲了话，各民兵团上台发言，表示决心。为了加强党对工程的领导，工地指挥部成立了临时党委，陈学明同志任书记，李维裕、张干云同志任副书记，各民兵团、连都成立了临时党团组织。工程指挥部设在莲湖小学内（雨花乡

莲湖村），条件简陋，只安装了一部手摇电话机，指挥长和政委们都睡在一间大屋里。为了搞好宣传鼓动，全线架通了有线广播，只要工地有人出工，广播就不停。十二月五日，工程全线开工。一月任务半月完成。新开河道七千五百米，面宽三十四米，底宽二十米，深五米，沿河修坝十一座（其中新建八座），新建涵管一百七十多处，全部工程土方五十四万多方。旧河改新河扩大耕地和养鱼水面三百多处。

治理奎塘河，是郊区一项较大的水利工程，时间短，任务大，冬季施工天寒水冷，且常常碰到难挖的稀泥潭，卵石层和淤泥、流砂。施工中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广大治河民兵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忘我精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修河的战斗打响以后，在全线很快掀起了一个“五赛五比两争光”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即：赛政治工作，比三个觉悟；赛团结治水，比龙江风格；赛组织纪律，比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赛工程进度，比多、快、好、省；赛安全保卫，比措施落实；为毛主席争光；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整个工地红旗招展，人声鼎沸，你追我赶，互相促进，一片热气腾腾。涌现了很多先进典型，工程结束时全线评出先进集体79个，先进个人1022人。如日夜奋战，一月任务，七天完成的岳麓渔场民兵连；迎着困难上，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东屯渡公社民兵团；人平日创十一方的韶山路公社东方红大队六十五个民兵组成的高工效突击连；争送风格土的东屯渡农场直属民兵连；不知疲倦，连续奋战三十二个小时，直到指挥员下命令才休息的综合农场民兵团里由五十八岁的共产党员杨崇兴率领的民兵连；把苦干和巧干结合起来，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大搞技术革新，工效不断提高的韶山路和上

大垅两个民兵团。工地还有一个“编外老民兵”叫廖秋成，他是韶山路公社红旗大队七十八岁的老贫农。当他听到全郊集中劳力大战奎塘河的喜讯，怎么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每天清早四点起床，自带工具，步行十多里，赶到工地，不计报酬，不要工分，苦干了四天。当民兵开玩笑似地对他说：“治理奎塘河，是上级党委交给我们青年民兵的任务，你为什么也来了”！他豪迈地说：“加快长韶路沿线的建设，是省、市委的指示，我们贫下中农要带头干”。还有一个年近九旬的老贫农张大爹，每天拄着拐棍到工地看新闻。一天他邀着六个老头，步行二十多里，从下游一直走到上游，看遍了整个工地，被工地动人场面所感动，对工地劳动的民兵说：“你们不愧是毛主席的好民兵，这次我们看到了人民政府根治奎塘河的气魄，真是托毛主席的福啊”！

七千民兵，在十一华里的工地上，凿新河，堵河口，筑河堤，建桥坝，二齿耙挖断了，锄头磨熔了，他们修好又干。遇到污泥塘，他们脱下棉衣，卷起裤腿，跳下去瓢舀桶装，成了泥人。民兵们震破了虎口不叫痛，压肿了肩膀不说累。东屯渡公社千余民兵，千米工地，七处堵口，数处泥潭，他们日夜奋战，干得出色，感动了群众，全社每天晚上有五、六百“编外”强壮劳力，自觉来工地顶晚班，战通宵。工地十分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处处工地都做到“七有”即：有红旗，有横幅标语；有批林专栏；有学习心得栏；有好人好事表扬栏；有广播员在战地宣传鼓动；有学习生活制度。许多工地还抓紧教育改造了一批后进青年。韶山路公社红旗大队青年王立云，原来偷摸打群架。上工地前，大队组织青年民兵对他进行批评帮助，他不服教育，一溜烟跑了。

这次带到工地，党支部负责人经常同他个别谈心，团支部派人与他挑战竞赛，鼓励他积极向上。王立云在党、团组织耐心教育下，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成为工地上“扁担不离肩，挑土快如飞”的标兵，被评为韶山路公社民兵团的甲等治河模范。

万米金堤平地起，一条银河双手开。新河竣工胜利通水的那天，当人们看到昔日多灾的奎塘河，变成又直又宽的新河时，都情不自禁地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们多年的愿望实现了，怎么不叫人由衷的高兴呢？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中旬一天的黄昏时候，省委负责同志周里来工地视察。那天天气比较冷，工地政委李维裕就在周老的汽车里作了汇报，当周老听完汇报后，非常满意。周老看到工地民兵们精神抖擞，情绪高昂，天快黑了还没有收工，周老连连称赞：“民兵们干劲足，干得好，真有点‘愚公移山’的气派呀！”周老离开工地时，再三嘱咐一定要把奎塘河治理好。在治理奎塘河工程期间，当时的市革委副主任郝全、市农委主任杨亮邦、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景春、郊区党委书记陈学明等都亲临工地视察，检查指导工作，帮助解决许多具体困难。整个工程，由国家拨有一批钢材、雷管、炸药等物资，伙食每人每天补助七角，补助大米半斤，共补助伙食费十多万元，补助大米一十九万六千一百二十五斤，同时，各社、场、各大队（管区），还拿出了不少资金支援这一工程建设，从而使整个工程得以保质保量地竣工。

我在长沙市南郊办义务教育的回顾

刘寿祺*

抗日战争前夕，国际局势日益紧张，而我国弱民穷，灾难深重，列强觊觎，虎视眈眈，战争灾祸，即将临头，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为避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剧，把中华民族从危亡中解救出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而安定的国家，许多仁人志士在“教育救国”的呼声下，积极推行城乡义务教育。我正是在这“磨刀霍霍，屠伯来临”的非常时期，奉令于１９３５年秋来到长沙市南郊大托铺办乡村义务教育的，历时两年，饱受艰辛，但收获不小，普及了大众文化，培养造就了人材。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办学的由来

我国号称文明古邦，立国数千年，人口数万万，河山壮丽，土地肥沃，然而历史跨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何山河破碎，满目疮痍，国势倾危，民不聊生呢？其中一个重要原

注：刘寿祺是我省著名教育家、老红军、曾任湖南省教育厅长、湖南师范学院校长。

因就是民众文化水准太低。欲解除国家厄运，振兴中华，就一定要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准。而中国当时的社会基础主要在乡村，无疑必先要着手于乡村教育。不然将蹈比邻印度的覆辙。那时印度文盲多达87.4%，结果沦陷在英帝铁蹄之下，人民长久地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当时，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准又是个什么样子呢？据有关教育刊物披露，1930年，我国每一万人中接受初等教育的儿童数为236人，约当美国的八分之一、日本及英国的七分之一、意大利及德国的五分之一、法国的四分之一、苏联的三分之一，较之已丧失独立主权的印度亦有不及。又据1930年统计，全国四亿二千六百万人中，居乡村者约占94%，而文盲则占85%以上。全国学龄儿童共约四千九百万，失学儿童则为三千八百余万，占全体学龄儿童的80%。因此，要培植中华民族深厚的根基，挽救国家的危亡，其刻不容缓之大计，就是要普及义务教育，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我国正式的义务教育，萌芽于清末，比德国落后两个世纪。宣统三年，学部奏设之教育会，曾通过试办义务教育案。国民政府成立后，两次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均定有义务教育方案。民国四年，教育部曾颁布义务教育施行程序；民国九年，颁布分期筹办义务教育计划。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六月还分别颁布了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施行细则。由于民国政府腐败无能，义务教育计划多成画饼，鲜有实效。

鉴于国情的迫切需要，加上有识之士的强烈要求，民国二十四年教育部颁布短期义务小学各项法令后，各省市教育局才成立义务教育委员会，主持义务教育事宜。湖南省于同年成立了城市与乡村二实验区，实验短期小学的各种办学方

法。开始我被委任为乡村义教实验区副主任，后为主任，配有干事、助理干事四人。

按照义务教育有关法令规定，义务教育本名"强迫的教育"，一是国家社会对于这种教育之实施为"义不可却"；二是个人接受这种教育为"义不容辞"。义务教育的使命是培养良好的国民，使人人有爱国爱民族的观念；使各个儿童都能接受社会有价值的思想、信仰、风俗、习惯；能积极的组织儿童参加集体活动，养成合群的美德；发展儿童审美的兴趣、创造的本能，好奇的心理与丰富的精神生活；教给儿童必需的生活技能、使儿童有谋生的本领；锻炼儿童的体格，成为健康强壮的国民。

那时乡村义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①、收受村内八足岁至不满十二足岁之学龄儿童，施以二年期的基础教育；②收受村内十二足岁至不满十六足岁之失学儿童，施以一年期的基础教育；③收受村内十六足岁以上之失学成人，施以六个月的基础教育；④、以学校为改造社会之中心，尤注重于民团训练与村自治组织及合作运动之推行。总之，乡村义务教育是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对教育对象实施各种训练和适应社会生活的各种方法；其作用在于使乡村民众自觉的组织起来，改善政治、经济、文化的生活，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其内容是包括全社会的教育；其形式是政教合一；其进行的程序，首先着重于政治环境的改善以及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狭义的文化教育。以教育的力量改造心理，陶铸国魂，将一盘散沙似的全国民众团结起来，用全民族的意志，全民族的爱国心，全民族的品格去和敌人决斗，去铲除封建社会的残余势力，使中华民族求得生存，永远屹立于世界。

机构与组织

乡村义务教育区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奉湖南教育厅的指令成立，由厅委任周调阳为主任，我为副主任，并另委任干事彭黔生、谢仙桂二人协助。随即租买长沙新开铺民房为办公处。次年八月办学范围扩大，而该处偏隅，不便管理各学校，便迁至大托铺常平仓。随即前主任奉令调任城市主任，遗缺由我补上，并由厅加委干事袁觉民、助理干事兼书记陶蒲生，区职员共五人。本区经省教育厅指定长沙县第一区为设学工作区域，以实施短期义务教育，并实施中央及本省所颁布的短期义务教育法规和一年制小学教材教法。

本区直辖于湖南教育厅，以区务会议为最高机关，由主任及干事组成。办公处为执行机关，主任总揽全部事项，下分总务、教务、视导三股。办公处并设有民众图书室、家畜试验室、卫生室、合作事业办公室。教务股下设区中心小学，开设了巡迴教学处、妇女职业班、民众夜校、短期义务小学以及改良私塾等。视导股与乡学董会是检查与推行义教的平行组织。区乡学董会是本区为谋与当地人士联络，共同推行义教而组织起来的。区中心小学原为实验性质，过去因各小学散布各处，人才精力难于集中，故于本年度改为办公处内设中心实验学校一所，下设学校教育工作股和社会教育工作股。学校教育工作股开设短期小学班、改良私塾、妇女职业班、高级民众班、成人补习班等。社会教育工作股下设播音教育处、合作事业指导处、壁板报及讲演处、民众体育场、民众图书室、卫生室、代书处。开办义务教育机关有短

期小学、简易小学、普通小学、短期小学班、义务小学、保立小学、改良私塾学校等。师资来源，我们采取设立短期小学或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招考课文精通、常识丰富的有志者为短期小学教员；推广师范学校、简易师范学校，简易师范科等；设置塾师训练班；试行小先生制、试行艺友制等，广泛网络义务教育师资人材。当时，正式教员中短小班教员三十二人，女职业班教员六人，高级民众班教员一人，合计三十九人，加上区办职员五人，共四十四人。我区根据工作需要，还临时设置些辅导机关并聘请临时工作人员。

我区设学区域为当时长沙县第一区所属的励进、纯德、大公、平岗、新建等五乡（即旧九峰镇地方），全区人口五万五千多人，面积数百平方里，这虽然有粤汉铁路、长潭公路及湘江过境，交通便利，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但教育不甚发达，文盲仍占全体人数百分之六十以上。据区公所统计，学龄儿童数为七千九百二十七人。民国二十四年度本区所设短期义务班三十所。民国二十五年又扩充二所，仍仅分布第一区内二分之一地方。可见任务之艰巨、所设教学机构仍不适应。

方法和措施

我来到乡村推行义务教育，最感头痛的是推行义务教育困难太多。推行义教是整个社会问题。地方政府不支持，光靠义教人员去努力，往往是徒劳的。义教能不能推行，政治的关系是首要的。其次是地方财政困难，办义务教育没有稳定的、充裕的经费，很难施行其计划，发挥其成效。再次是

地方义教行政人员不健全，一般人对于义教没有认识、事事敷衍，互相推诿。加之当时乡村经济濒于破产，农民屡遭天灾匪祸，衣不御寒，食不饱肚，生活难以维持，那能顾及接受教育？针对这些困难，我们加强了对义务教育的宣传发动。我们按照梁瀨溟、陶行知、晏阳初、黄炎培等教育名家提出的方法措施，结合区内义教的实际情况，具体的做法是：

政教合一。要普及乡村义务教育，并不是专凭几个专家学者可以做到的，乡村社会生活习惯和思想意识比较保守，难以接受教育。要推进乡村教育，就要推进乡村社会进步，改革乡村教育的组织与制度，实行“政教合一”制，把教育纳入乡村组织，以教育的方法去改进乡村组织的内容——政治、经济、文化，又以经济、政治的力量去推动乡村教育，二者相互为用。具体来说，一是用教育力量启发。劝导家长为子女将来生活便利打算，减少儿童家庭劳动，保证儿童有足够的时间接受教育。二是用政治力量作出法令规定：政府在“辅导国民充分发展其智能，以尽其对于国家所负之最大责任”的原则下，实施义务教育，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儿童及成人入学。三是从图谋发展农村经济来推动义务教育。儿童及成人不能入学因经济的原因居多，补救之法亦应从发展农村经济着手，积极引导农民组织合作化。在两年的工作实践中，我抓住教育、政治、经济三方面同时并举的实现，求得乡村教育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农村经济组织的切实合作，探求解决乡村整个问题的途径，推动了义务教育。

教学做合一。从两年多办乡村教育来看。要把乡村教育办好，除了师资经费设备等必要条件外，还有一个先决的条

件，就是担任教育工作者艰苦卓绝的精神。如宗教的推行，全在传教者的信仰精神。而教育的推行，亦在办教育者和宗教信仰者有同样的信念与决心。我要求教育工作者，要把人类信仰宗教的观念转移到信仰教育上面去。

所谓教学做合一，就是怎样教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怎样做就怎样教和学。也就是自学、自做、自治。教育权利大众化，大众生活教育化；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使学生生活于社会化的学校，使民众生活于教育化的社会生活中。用教育的力量改进劳动，从劳动过程中推进教育，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学习方法，结合实际教、结合实际学、结合实际做。如国语教学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字、词、句；妇女职业班，传授缝纫技术；为增强学生的爱国思想，每日举行升国旗活动。为检阅教员教学和学生学习成绩，我们于每年12月16日至19日，分别在常平仓、洞井铺、李家湾、郭家湾四处举行检阅会，互相监督、互相交流，表扬先进，激励后进，推动义教工作。

义教民教合一。实施义教最大拦路虎是农家经济过于贫困，成人儿童都无暇读书受教育。当时采取的办法是义教民教同时并举。例如，我们实施短期义务教育动员学龄儿童入学。先从开导其家长入手，一方面地方人士、政府官员、教育同仁，团结合作做义教工作，另一方面学区开办民众班及妇女职业班，使儿童及其父母均有受教育的机会，只要耐心开导，义务教育的障碍就少多了。办学两年中在籍学生达到四千七百五十一人，成人补习教育二千一百五十六人次。

实验改进合一。我区最初各种短期小学分散各处，人力不易集中，进行实验工作殊感困难，自中心实验学校成立后

并设于办公处所在地，教员较集中，职员亦便于参加工作，各项实验工作得到顺利实施。

①、乡村全体民众普受教育的实验：以学校为中心，进行各项以乡村全体民众为对象的大众教育及社会工作，做到学校附近二里以内的区域普及一年制短期义教、成年补习教育及妇女职业教育，并完成自治组织及经济组织。

②、改编短期小学课本的实验：我区各小学自开办以来，国语科教材均采用部颁短期小学课本。此书内容丰富，选材精当，但明显存在着教材排列不当、份量过重等缺点，我们试行改编后，交区中心实验学校试教。改编的教材按照儿童实际生活环境由近及远，由浅入深，使学童较易理解；同时增加了提高儿童抗敌意识的课文，增添了一部分乡土教材。

③、小先生制的试验：针对乡村儿童确因家计困难、迫于生活而无读书时间者，我们采用小先生制，小先生一面在学校里上学，一面在放了学以后，就把所学的知识教给别人，教人的方法是“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去”。小先生制的推行，对普及义务教育裨益甚大。

④、民众班教材编撰与实践：我区自办民众班以来，即感民众班教材缺乏，国语一科，虽有教育部编“三民主义千字课”可供采用，但只适合于曾未读书的失学成年应用，而对受过私塾教育或小学教育二三年的青年不适用。为此本区自编了上下两册高级民众课本，采用混合编写，内容包括国语、地理、历史、卫生、自然及应用文等多方面知识。还先后编有民众班算术纲要及公民训练纲要二书，前者经省教育厅广为翻印，做为全省各处民众班算术教材。

⑤、妇女职业补习班课程之编纂与实验：妇女职业教育为社会所需要。但这种班课程随意添设，教材选择亦无标准。我区办公处广泛征询教师的意见，根据教育部颁布职业补习学校的规程，试编了本区妇女职业补习课本，先在本校实验，经多次修正，然后普遍使用。

成效及影响

在文盲众多的中国农村社会里，虽然教育难办，但由于义教同仁的共同势力，南郊义务教育遐迩闻名，取得了一些成绩：

1、设一年制短期小学三十所，普遍实施短期义务教育。仅1936年上学期到校的学生就达一千二百零八人，累计两年四期在籍学生四千七百五十一人，毕业生一千六百八十四人。

2、设区中心实验学校一所，开展了各项乡村教育问题的探讨与实验。招收短期义务班、高级青年班、妇女班、民众夜校班各一班，针对各班特点进行实验。并将实验方法及结果编印成专集。

3、设巡迴教学处以补短期小学之不及。本区域内设立学校虽多，但偏僻分散的乡村，仍有不少失学儿童。为使失学儿童均有就学机会，于1936年8月开始试行巡迴二部教学制，共计二处，有学生三十八人，由一个教员每日在每处上课半日，其课程则完全按照部颁一年制短期小学课程标准实施。

4、训练塾师、改良私塾。我区于1936年9月开设

塾师训练班，招收区内现任塾师，进行新教育方法之训练及新思想新知识之灌输，计参加训练的塾师共二十人，期满考试及格者十五人，毕业后均回原设私塾教课。因私塾在中国教育史上源远流长。据民国二十四年不完全统计，全国有私塾八万五千二百九十一所，塾师八万六千零三十四人，学生一百五十四万二千九百六十一人，以此数为民国二十二年度全国初等教育统计相比，则私塾数约当小学校数三分之一，塾师数约当小学职教员数六分之一，学生数则为八分之一。而且在乡村民众的心目中，私塾教育比较适合于他们子弟读书的需要。可见利用原有塾师改良私塾是很重要的一环。经艰苦工作；正式成立改良私塾的有罗卷坡、搓塘、尚山塘、周家坳、牛郎塘、老虎冲、汤家坪七处，拥有塾师学员一百一十三人。

5，开办民众夜校，对成人进行补习教育。我区历期均办有民众班，１９３６年上期计二十六个班，有学生七百五十八人，毕业生四百六十二人；１９３７年上期计十九个班有学生五百六十人、毕业生在三百五十人以上，总计三期肄业学生一千九百五十九人，毕业人数一千一百七十余人。

6、开办妇女职业补习班，进行生计教育。乡村成年妇女，年长失学，除理家庭杂务外，别无所事，针对此种情况，自１９３６年下期起，开办了妇女职业补习班，开始办四个班，有学生一百三十余人，后又添设两班，共计六个班，有学生一百九十七人。各班课程文化科目与职业科目并重，文化课注重妇女应用知识之灌输和训练，职业课以缝纫为主，适应乡村妇女之需要。

7、设高级民众班一个班，解决乡村初级小学毕业生继续求学问题。所设科目有增长基本知识方面的，如国语、算术、社会自然等；有授以乡村实际应用方面的知识，如乡村应用文、地方自治大意、合作社组织法等。目标是培养乡村生产骨干和工作干部，推进乡村建设事业。

8、举办壁报及通俗讲演。以我区所属各短期小学为中心，每周发行壁报两期，举行通俗讲演一次，这些活动有利于改良乡村风俗，培养乡民爱国思想。

9、建立民众图书室，作为乡村儿童及成人寻求知识的场所。图书室购有儿童及民众读物六百一十七种、各科参考图书八百四十六种、杂志二十七种，日报四种，由本区职员指导阅读。图书室内还设有代书处，凡民众请求书写应酬文件及对联等，本区职员代为书写，不取分文报酬。

10、建设民众体育场。为发展乡村体育起见，特设民众体育场一所。场内设有兰球、队球、秋跹、跳绳、毽子、乒乓球等运动器具及刀、箭、棍、剑等国术武器，供区内学生及一般民众运动与锻炼身体之用，以普及乡村体育，提高乡村民众体质。

11、设无线电收音机，收听广播电台的新闻报导及讲演，以增长其知识，丰富其生活。附近民众每晚前来收听者极为踊跃，收效颇大。

12、设立卫生室，实施卫生教育。我区各短期小学教员以前多已受初级卫生训练，具备各种简易治疗知识及公共卫生常识，还与南郊乡村改进会卫生分所联络，选择数校设卫生室，为学生及民众治疗普通疾病，并指导改善乡村环境卫生，效果很好。此外每年春季，便与长沙县卫生院联络，以

本区各小学为中心，为乡民普遍施种牛痘。仅只1937年春季点播牛痘者就达一千一百余人。并常组织学生赴各村作卫生宣传。

13、开导农民组织信用合作社，活跃乡村经济。由于乡村金融过于呆滞，影响教育之进展，要普及乡村教育必须同时辅助乡民解决生计问题，于是与省建设厅长沙市南郊合作实验区联合，在本区办公处内设合作事业办公室，由建设厅派合作指导员王汉涛先生常驻处办公，以本区各小学为中心，普遍开导农民组织信用合作社，本区教员的负责宣传发动，合作实验区负责技术指导，通力协助，进展甚速。在全区范围内共组织信用合作社六十一个，生产合作社两个，消费合作社一个，有社员一千二百四十三人，社股一千一百七十四股，股金二千四百六十二元，社员储金达一千零二十二元，贷款额为二万九千七百一十八元。合作社的组织活跃了农村经济，适当解决了农民的困难，深得乡民称赞。

14、扶植乡村生产事业。为推进家畜改良工作，设家畜改良实验室一所，与省立农民教育馆合作，改良本地猪种，饲养英国盘克公猪，并购本地好母猪一头，进行杂交实验，同时向附近饲养母猪农家宣传改良家畜的知识。

16、编辑发行乡教月刊，宣传乡村义务教育。

总之，工作纷繁，难以尽举。在两年的时间里，由于区内外工作同仁，热心公务，使得义教工作顺利开展，收效颇大，影响极深。

一、乡村人民逐渐重视儿童教育，学生增加。我区各小学除分别劝导学生家长送子弟入学外，常利用各种纪念日，联给附近区校族校举行集会，宣讲义务教育的重要，每期结

束便举行恳亲会，展览学生成绩，引起各家长认识教育之重要及功能，愿意送其子弟入学。同时由于区各小学影响，区校族校免收书籍费，以及区校族校行政之改善，教员教学效能增进，学生人数增加。据当时长沙县教育局统计，此区域内区校族校计六十四个班，每班平均人数达四十三人，每班平均增加一十二人。

二、区内社会文化水准提高，爱国思想深植于民间。我区各小学历期办有民众班、壁报及讲演会，以灌输民族意识振奋爱国思想为目标，乡民了解和关心国事，抗战募款慰劳踊跃，改变了以前对于国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乡村社会文化水准亦随着义务教育的不断发展而提高。

三、信用合作社之组织，妇女职业教育之传授，以及休间教育之提倡均促使乡村生活之渐趋改善。农民从信用合作社里取得贷款，用之于购买肥料及其它生产资料，发展农业生产，增加了收入，缓解贫困。开办妇女职业班，授以缝纫技术，学生以其所学传授给家人邻里，虽不能使所有学生以缝纫糊口，但至少可减少其请缝工之费用，既增加了生产又减少了消费，农家生活痛苦也相对减少。同时，提倡休间教育，如收音机之设置，民众体育场之开辟，民众图书馆之开放，均以改善乡村人民生活为目标，影响不小，收效甚大。

四、乡民对于卫生事业的认识逐渐明确，破除迷信有进展。由于经济、文化、教育均不发达，区内迷信空气极重，三里一神，五里一庙，香火甚旺，沿途追魂，当街捉鬼之事，更时有所闻。乡民疾病发生，不归咎于平日不注意卫生，而归咎于神之作用，不请医生诊治而求神显灵，以致病祸日深，终至不起。自我区学校设立以来，极力开展破除迷

信之宣传，遇有迷信事实发生，必设法为之解释，并积极注意卫生之宣传、疾病之预防，更以各小学所设卫生室为民众免费治疗疾病，功效屡见，引起乡民对于医药之信赖，迷信空气渐为减少。

以上所述，非敢自诩为成绩可观，义教大成。但在当时环境艰难、力量薄弱、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凡我同仁各竭其力，各尽其才，奋发图强，其共同图谋义教事业进展之苦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继续和发扬光大的！

（何瀚整理）

我在两个平民教育组织任教的情况

刘仲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南省两个平民教育单位在郊区办过学校，一个是省立农民教育馆，另一个是湖南省乡村短期义务教育实验区。我先后应聘在这两个单位办的学校里当过短时期的教员。现在记忆所及，略谈一些当时办学的情况。

湖南农民教育馆设在长沙市北门外大王家巷文昌阁。馆长是欧阳刚中，教导主任是周静安，这是两位平民教育家，布衣蔬食，平易近人。周静安还在北门外枫树坪办了一个半工半读的枫树中学。农民教育馆在郊区设了一些学区。一九三五年上期，我被分配在南门外小林子冲枫树山第二学区教书。这个区的负责人傅代言，浏阳人。与欧阳馆长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同学，原在中山大学教书，不知何时来这里的。这个区办了一个妇女班，上午开文化课，傅教语文，我教数学，所授知识相当高小程度，下午学缝纫。另有一个小学班由姓陈的教员任教。傅除了教课外，埋头翻译日文书，未见其他活动。我在这里大概教了两个月，又调到该馆第四学区。

第四学区设在大托铺附近的陈家祠堂。学区负责人林肇

注：刘仲述系当时义务教育高级民众班教师。

周，与欧阳馆长同是武冈人。陈家祠堂房屋宽大，原来陈姓族里在此办了一个完小，叫明伦小学。第四学区借南头的楼房办了一个妇女班，学生有三、四十人，也是半天文化课，半天实用技术课（缝纫）。还办了一个半日制的成人班，学生有二十多人。成人班有语文、数学、珠算课程，还教一本农民教育馆自编的《农村杂字》，每句四个字，读来很顺口，便于记忆。林肇周和一位叫黄淑璋的女教师教这两个班的文化课程，我每周教两节数学课，一位姓童的女教师教缝纫。这栋楼房的一侧，有一个戏台，我在的那个学期，还利用这个戏台举办了一次同乐会，算是乡村里的一件新鲜事。戏台两侧贴上我撰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耕田忙，凿井忙，且从忙里偷闲来学些卫生知识"；下联为："谋衣苦，求食苦，要在苦中作乐好振奋民族精神"。那是一个星期天，附近来看热闹的人大约千数。林肇周懂得一些医药卫生知识，本来会的主要内容是想宣传卫生知识。为吸引观众，取名同乐会，并且穿插了许多娱乐节目，如民乐合奏、放留声机唱片、成人班表演武术、妇女班表演歌咏和简短话剧，整整热闹了一天。

我除了教课外，另有一个任务，就是发动九峰、新德两乡的贫苦农民组织信用合作社。目的有两个，一是制止农村高利贷，一是向政府领取低息贷款来发展农副业。我为此确也跑了不少路，但由于上级规定要有15—30户农民才能成立一个社，还必须每个社员入股三十元作基金，才具备获得上面贷款的条件，贫苦的农民衣食不足，股金难筹，我虽极力宣传信用合作社的作用和好处，可是当时那些老老实实的农民，好象安贫乐道，表示心余力绌，所以收效不理想。只有

在现在的大托乡新路村谭家堂，开始组织了一处，有十多个社员。开过几次会，选举了一个叫吴六爹的裁缝师傅当主任，准备筹集股金时，终因种种原因，这个形将足月的胎儿也"流产"了。

在第四学区，还发生了一件不应有的事，就是在开同乐会那天，妇女班表演节目，有一个姓张的同学出了场，她长相颇好。当时国民党第一师胡宗南部队驻在附近，一个吴姓营长（湘阴人）来看同乐会发现了她。不知何时何地他俩谈起爱来，随后结了婚。当时封建意识浓厚的乡村，无风三尺浪，流言蜚语满天飞，说这对男女不正经，学校风气不好，学生特别是妇女班的学生纷纷退学，有的不辞而别，老师尽力家庭走访，一时也说服不了，甚至还有抵触，致使学区办学形象出现危机。就在吴、张婚后不久，有一个姓陈的女青年，遵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嫁给城里一个有钱的彭姓绸布店大老板做小老婆，却无人议论是非，甚至还有人投以羡慕的眼光。两相对比，足见当时国民被封建礼教毒害至深。一九三五年下学期，因"吴张事件"的影响，学区难以开展工作，只好搬迁。

就在这一年暑假期间，大托铺常平仓（一处公共房屋）迁来了湖南省乡村短期义务教育实验区。这个单位原来在新开铺附近的鸡公咀，主任是袁任远（现为中顾委委员）和刘寿祺，搬来大托铺时，就只刘寿祺主任来了。后来才知道袁、刘都是老革命家，大约是"马日事变"后转入地下工作的，当办事处主任只是他们对外的公开身份。办事处设有干事，一个叫彭黔生，新化人，另一个谢仙桂，宁乡人。后袁觉民接替谢。我被聘为高级民众班的教师。这个班学生三、

四十人，是一些青少年农民子弟，知识程度相当于高小或初中一年级。课程内容是语文、数学、珠算、“农村杂字”、常识等。由于程度不齐，语文是从高小至初中课本中选编油印的，还插了一些我们教员自己写的文章，如《纪念九·一八》、《昭山游记》等等，详细内容记不清了。这里也办了一个妇女班，科目与农教馆的一样，是一个姓仇的女教师教缝纫。招收邻近的孩子，办了一个半日制的短期义教班，彭黔生老师任教。还办了一个私塾训练班，召集附近十多个私塾先生学习了两个星期。教他们一些算术、白话文、常识等等，并鼓励他们回去教书要改变一些方法方式，加入新的内容，特别要他们注重讲解，减少死记硬背。办事处为了宣传科技知识，养了一头白色纯种的约克夏公猪，想与本地母猪杂交，改良大围子猪种。可是当时因循守旧的农民不愿把本地的黑猪与白猪配种，怕失去本地猪的特色，而办事处也没有买几头黑母猪来配种作样板。农民是现实主义者，要看得见摸得着才相信，所以农民来看洋猪的不少，却没有来配种的，一头约克夏猪等于禁锢在动物园，仅仅是供人观赏而已。

由于当时每个保（相当于现在的两个村）只办了一个一人任教的小学，所以失学儿童很多。办事处在周围十数里内，屋场多，人口密集又无小学的地方，就借房子，派老师办了许多短期义教班。我现在记得的，如桂井村的潘家台子、南托乡的云南桥办了这样的班。每班都有四、五十个学生。一个学期将完，我又另有工作，离开了办事处。听说这个办事处连续在大托一带办学几年，由于不向学生征收任何费用，老师素质又好，很受地方欢迎。

我现在想起来，对当时的学科设置有一点我不了解，不知道是限于我们这些老师的水平，还是因为上面缺乏布置，号称乡村教育、农民教育，除农村杂字外，竟没有一门农业科技方面的课程，那怕是初浅的也没有，这似乎是一个不足和缺陷。

这里我还想说说湖南省乡村短期义教办事处的几位负责人。前面提到谢、彭两位干事，谢从湖大教育系毕业，彭是一师毕业生。他们在常平仓中心学校兼了一些课，但出外巡视检查的时间多。一天忽然说彭黔生失踪了，到处找不着，隔了不久时间，有消息说他已奔赴延安革命圣地。在长沙市区，我经常碰到寿祺同志，知道他与办事处陶蒲生同志结为终身革命伴侣。解放后，我得知过去高级民众班和义教班的学生，如刘廉正、彭海宽、唐运泉等许多人先后参加了党组织，战斗在城乡各条战线上。马日事变后，反动的铲共义勇队曾在常平仓杀害过共产党人吴雪双（大托乡先锋村人）。两年义务教育，刘寿祺同志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陶普生等人投身革命，得到寿祺同志的指引和帮助，至于后续的一些人入党是否受到刘的熏陶，我不得而知。后来寿祺同志当过部、省的督学。解放后，任教育厅长、湖南师院院长。今年十一月里的一天晚上，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庆祝寿祺同志九十寿辰的盛况，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十二月忽闻他老人家溘然长逝，我为失去了一位熟悉而崇敬的老革命家、老教育家而难过。

一年义务教育令我终生难忘

邹少云

我家在解放前很穷，吃饭是有了上顿没下顿，哪里有钱上学读书。没想到八岁那年竟有机会读了一年书。

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我们村里来了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叫张玉林，他在对门的周家祠堂办了一所学校。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时教育家陶行知等人提倡“教育救国”后，省里一些知识分子推行平民义务教育，来为没有文化的乡里人办起的学校。这个学校不收学费，每人都发了一本书、一支大字笔、一支小字笔、一块石板、几个作业本。我读了一年书，没有交一分钱学费。

这个学期共两个班，一个班读一、二册，另一个班读三、四册。我们那个班有五十多人，多半都是没钱读私塾的穷孩子。

发给我们的那本课本叫“国语”，我今年六十多岁了，那些课文内容还记得不少。第一册的课文有：“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东一村，西一村，村村都有种田人”。“种田种田，种了稻有饭吃，种了棉有衣穿”。等等。第四册的内容更丰富，我记得第一课是中华民族的来源。第二、三、四、五、六、七课是历史人物唐太宗、岳飞、文天祥、明太祖、成祖、戚续光等，第八课是长江（5700公里）。第九课黄河（4600公里）。第十课粤江（珠江）。第十一课蒙古。第十二课西藏。十三课新疆。十四课人体常识，……三十一课清朝的兴起，第三十二课鸦片战争，第三十三课太平天国，第三十五课火烧圆明园，第三十六课中法战争，第三十七课中日战争，再以后是“三民主义”等等。

算术课没有课本，只教一些加减乘除法，还学珠算。

张玉林老师是江西人，他可能是个共产党员，有一夜他突然走了，后来听说到了延安。接着由蒋绍禹老师代课，一直代到我们读完一年结业。当时还有一个校长，叫刘寿祺，他可能管很多学校，一期只来过三、四次，他一来了就要给我们讲话。有一次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要买田，卖主在文契上要笔头子搞鬼，他那两丘田恰巧一石。他在两丘田之间的田塍上埋了一个石头，他借“石头”的“石”与“一石”的“石”同形的特点，在文契上写了：“上五斗、下五斗，中间一石不卖”。谈判时是讲只中间一个石头不买，申诉长官时又说是讲一石田不卖。讲这个小小的故事，刘寿祺先生的意思是鼓励我们好好读书，没有文化在社会上要吃亏。

我读完一年书，学的知识还真不少。解放后，我在党的培养下当了村长、还当了洞井乡第一任乡长。

（易俊奇整理）

湘白Ⅰ系猪的选育

任福池*

湘白Ⅰ系猪(长沙白猪)选育工作始于1974年。在省市有关领导关怀支持下，省畜牧兽医研究所、长沙市国营畜牧农场、省畜牧局、长沙市畜牧水产局、长沙市郊区畜牧水产局共同协作，经过科技人员十五年的艰苦努力，于1989年11月20日通过省级鉴定，宣告我省第一个瘦肉型新品系猪育成。

湘白Ⅰ系猪系全身白毛的母系猪。头大小适中，耳前倾，背腰平直，中躯较长，腿臀丰满，四肢较短而结实。其优点是产仔多(经产母猪平均产仔12头以上)；母性强（仔猪成活率达90%），发情明显，易于配种；生长快（肥育猪育肥期日增重650克)；饲料省(料肉比3.5：1)；瘦肉率高，它本身胴体瘦肉率达58%，与杜洛克、长白猪配殖的杂优猪肥育的胴体瘦肉率达62%以上。各项技术指标达到了国内同类科研成果的先进水平，作为瘦肉型猪产仔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配套肥育猪胴体瘦肉率达到世界水平(养猪专家评语)。湘白Ⅰ系猪为发展商品杂优猪提供了新的母系亲源(猪源)，目前已在全省十县二所推广，很受群众欢迎。1990年被评为湖南省农业系统科技进步一等奖，长沙市丰收一等奖。

由　来

1970年春，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撤销，建立长沙市郊区良种繁殖场。畜牧所留下的猪群除少数引进国外品种长白猪和大约克夏猪外，绝大部分是杂交母猪群。该场生产，除奶牛外，就算养猪生产了，可以向省内外提供国外种猪苗和杂交肥育猪上市。由于科研单位改体而变为生产单位，各种物资供应明显减少，特别是精饲料几乎没有供应，虽经多方奔走求援，也没有什么效果。没有充足的精饲料，对国外引进猪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它们对环境条件的剧变适应不了，体质严重恶化，已到了难于维持生命的地步。良种繁殖场的良种猪出路何在？很多人主张淘汰良种猪。正在为难之际，我们请来了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来我场考察，他们为了出口瘦肉率较高的活大猪，要建立猪的良种基地，认为该场的基础较好，由于双方正各有所需，所以两相情愿，一拍即合。在往后的一段时期内，得到了省外贸部门的大力支持，既解决了外来良种猪的精饲料供应和种猪苗的销路，又找到了出口活大猪这条新路子。

出口活大猪要求瘦肉率比较高的肥育猪。全部出口长白、大约克夏和这两个猪种杂交的肥育猪，根据我场的实际情况，很难达到要求。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长白猪和大约克夏猪发情不明显，繁殖率低，护仔能力不强，仔猪成活率低。据省外贸统计，一头种母猪一年只能提供4头左右仔猪。二是对饲料要求高。如饲料营养水平达不到要求，生长速度下降，造成生产成本增高。三是这种猪腿蹄不坚实，易得蹄病和受伤，经受不了短途和长途运输，出口合格率低。基于上述原因，省外贸花了不少资金引进外来种猪和精饲料，下大气力在农村基地推广饲养，其结果是推而不广。

我们详细分析了这几年的情况，整理了二品种杂交（苏

注：任福池系郊区政协主席。

围、长围、约围）和三品种杂交（长约围、长苏围、约长围和约苏围）出口的经验，并吸取了原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培育的湘畜1号和湘畜2号失败的教训。为了满足出口活大猪的要求，我们着手培育瘦肉型猪种——长沙白猪。将培育计划和实施方案报省农业厅，不料结论是："湖南吃肥肉都不充足，还培育什么瘦肉型猪？"

1974年长沙市农科所改为长沙市国营畜牧农场。为了农场的生存和满足社会需要，我于1974年正式开始了培育长沙白猪的研究工作。在这段时期内，我们得到了湖南省科委、长沙市科委、省农业厅、市畜牧水产局、郊区畜牧水产局和郊区科委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省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的帮助和支持。

实　施

培育一个新猪种，是一个花时长费精力的大课题。在着手研究时，要了解国内外在这方面的进展情况，并根据当地的要求，制定出周密的计划。

在选育指标方面其外貌特征要求：全身被毛白色，头中等大小，耳中等大直立略向前倾，鼻咀平圆，体侧长而平整，腰背结合良好，后躯肌肉丰满，四肢健壮，蹄质坚实，有效奶头6对以上，排列匀称，生殖器发育正常。对繁殖性能的要求是产仔率高，母猪初产9头，60日断奶窝重110公斤；经产12头以上，60日断奶窝重150公斤以上。初生个体重1公斤，仔猪成活率90%。在生长发育方面，要求：体型中等，6月龄公猪体重75公斤，母猪72公斤，成年公猪200—230公斤，成年母猪180—210公斤。肥育性状和胴体品质要求能早熟，前期生长快。在可消化能2.8—3.0兆卡和可消化蛋白质16—12%的饲料条件下，生后6—6.5月龄体重达90公斤。肥育猪育肥期日平均增重600克以上，料肉比3.5：1；胴体瘦肉率55—57%，背膘厚不超过3厘米，眼肌面积27平方厘米，后腿比28%；肉色鲜红，PH值、系水率正常，无PSE劣质肉。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我们利用遗传上截然不同的四个品种，按照育种目标的要求，进行杂交合成和有计划的选育，通过基因的重组，产生比现有品种更能适应本地的自然经济条件和合乎要求的新品种。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我们选择群体继代选育法（系统选育，闭锁群繁育）培育新猪种。这种品系建立法，并不是以个别优秀个体为前提，而是以基础群开始，根据一定的选择和交配系统，选育出遗传上相似程度高的，性能优良的群体。所谓群体选育就是根据血统，表型性状，以0世代的遗传基础作为选择的基础，通过有效的选择方法，改变基因组合，再通过选择调整基因频率。经过世代的选育之后，选出表型一致，性能高的群体。群体继代选育法集中了各个祖先（基础群）的各种优良性状，通过一定程序的选育，获得逐代提高的高产群体。

我们选择的亲本是母本选用大围子猪，它是长沙地区的优良地方品种。优点是适应性强，性成熟早，发情明显，受胎率高，产仔数多，肉质鲜嫩。缺点是产脂肪多，体躯短小，腿臀不丰满，斜尻，四肢较软弱，卧系。父本选用：长白猪和大约克夏猪，它们同属瘦肉型品种，体形修长，背腰平直，生长快，腿臀丰满，胴体瘦肉率高，但饲料要求高，发情不明显，产仔率不高，腿、蹄不够坚实；苏白猪产仔较

高，适应能力强，后肢强壮，蹄质坚实，生长快，但瘦肉率不高。

为了获得亲缘关系疏远的各猪种，除本场拥有的种猪外，我们还从大托乡选择20多头大围子母猪作为母本；父本苏白猪，我们从长春市农科所引进了14头，长白猪本场有瑞系和英系，又从杭州大观山种猪场从河南省畜牧兽医所、湖北省畜牧所，邵阳畜牧所共引进20多头法系长白猪及大约克夏猪，建立育种的丰富基因库，作为杂交之用。

我们采用"复杂育成"杂交方式。以大围子猪作母本，用苏白猪，长白猪作父本，分别各与一部分大围子猪交配，得到后代(F_1)"苏围""长围"，然后又选留"苏围"、"长围"20多头母猪，再用大约克夏公猪3头，长白公猪2头、分别与其配种，而获得三品种杂交后代(F_2)"长苏围"、"约长围"，再将它们横交而得到"约长苏围"。横交后代由于胴体瘦肉率达不到设计要求，又再用大约克夏公猪与横交后代交配，从20窝，205头断奶仔猪中，选留近百头进行生长发育测定，经过几次筛选后，留下55头饲养到6个月龄，其中公猪15头，母猪40头，经过严格选择与生产考核后，于1975年秋留下公猪5头，母猪20头，建立五个家系，正式组建成血缘比较疏远的基础群(O世代)。参加基础群的公猪留种率为33.3%，母猪为50%。基础群平均含亲本大约克夏猪血缘62.50%，长白猪血缘18.75%，苏白猪血缘6.25%，大围子猪血缘12.50%。

基础群一经封闭，应采用随机交配，但考虑到长沙白猪基础群建立的品种繁杂和基础群的群体不大，故适当加以控制，以使各亲本品种血缘混合充分，同时还避开全、半同胞

交配，防止过早近交。从第1世代起，则采用避开同胞交配分组交配方法，将公猪分为五组，母猪分为五组，每头公猪每年轮流与一组母猪交配，后改为随机配种。经测标，世代间平均以0.65278%的递增速度增加群体近交系数。第6世代平均近交水平已达到9.62%，不同世代存在不同程度的近交个体。繁殖和哺育性能各性状的表型值，随着近交系数的上升而减小，经检验近交影响不明显，对肥育猪生长发育和仔猪生活力方面也未见到有害作用。

1978年获得第1世代种猪，并进行了肥育测定。1979—1980年获得第2世代种猪，同时进行了肥育测定。1984年获得第3世代种猪，用不同营养水平作了肥育测定。1985年培育出第4世代种猪，自1987年获得第5世代种猪后，每年获得一个世代，至1989年11月鉴定时，共获得七个世代。

在第2世代的后裔中，出现了少量花毛仔猪，这与我们的育种目标不符，同时反映了在毛色上基因还没有完全纯合。经过查核系谱和测交，发现是一头种公猪的毛色是杂合基因，立即将此头公猪及其后裔全部淘汰，此后再未出现类似现象。

育种进展到1984年，在5个家系中丧失了一个家系。但在1985年通过查询猪群血统，又从丢失家系的半同胞的后代中分离出2头公猪，使育种群恢复到5个家系。

杂交利用产生了较好的效果：湘白Ⅰ系猪自4—6世代二产母猪分别与杜洛克、汉普夏、长白、大约克夏等品种公猪杂交，其后共经三批肥育试验证明：杜湘Ⅰ组合，生后146—165日龄体重达90公斤，育肥期日增重691—798克，料肉比3.14—3.42：1，胴体瘦肉率62.09—63.73%。汉湘

Ⅰ组合153—163日龄体重达90公斤，育肥期日增重685—749克，料肉比3.46—3.48：1，胴体瘦肉率61.83—62.13％。长湘Ⅰ组合163—187日龄体重达90公斤，育肥期日增重585—694克，料肉比3.54—3.84：1，胴体瘦肉率60.75—61.86％。大湘Ⅰ组合172—192日龄体重达90公斤，育肥期日增重563—703克，料肉比3.54—3.85：1，胴体瘦肉率59.97—60.99％。对比证明杜湘Ⅰ和汉湘Ⅰ二组合优于长湘Ⅰ和大湘Ⅰ组合，主要表现为肥育期增重和饲料效率上前者优于后者。

利用湘白Ⅰ系5世代公猪与黔邵花猪杂交的生产试验证明，湘白Ⅰ系猪的基因型已高度纯合，杂种猪白色被毛的一致性，不出现黑块和杂毛。杂种一代窝产仔10—15头，60日断奶窝重110—170公斤，断奶个体重12—15公斤，具有较好的生产性能。湘白Ⅰ黔邵组在低营养水平下，全期日增重501.13克，高于长黔邵组的465.39克，瘦肉率长黔组57.99％，湘Ⅰ黔组52.66％，湘Ⅰ黔组每增重1公斤，比黔邵花猪节约饲料1公斤。这些说明湘白Ⅰ系猪有较好的适应性。

合　作

1983年底由于工作需要，我调离长沙市畜牧农场到郊区政府工作。本课题没有了主持人，将研究工作委托陈俊家同志负责继续进行。后不久，陈也调离农场去奶类办工作，而长沙白猪的研究工作已无人负责，研究工作无法进行。为了不让国家财产遭受不应有的损失，科研课题不致夭折，研究人员的精力和心血不致白费，我们经过反复对比和衡量，认为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是最理想的伙伴，因为湖南农学院

牧医系虽有技术力量承担任务，但经济势力较弱，加之他们以教学为主，也不想参加这么大的研究课题。省畜牧所也在做猪的育种工作，由于刚起步不久，要出成果还需要较长时间，目前他们的技术力量和仪器设备有潜力可挖，又有一定的经费来源。我们与他们合作既可以保住研究工作继续进行，又不致于浪费科研人员近十年的心血。由于目标一致，双方各有所求，故经多次同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権商，最后达成协议，由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与国营长沙市畜牧农场两家合作，共同主持长沙白猪的选育工作，将该课题的研究继续进行下去。由市畜牧农场负责移交该课题设计方案，及实施的全部原始资料和整个试验猪群；省畜牧所派出以龚克勤、孙宗炎为主要成员的攻关小组，接手长沙白猪的选育工作。

1985年初，为了将课题很好地移交给省畜牧兽医研究所，争取三年内能完成长沙白猪的培育工作，预算三年内还需10万元资金。因此由我邀请并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各方代表参加的会议，有省科委、省畜牧局、省农垦局、省饲料公司、市科委、市畜牧水产局、省农学院牧医系、长沙农校、郊区科委、郊区畜牧水产局、市畜牧农场等单位24位领导、专家都参加了。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一次便筹集了10万元，分三年拨付，省饲料公司指定湘潭饲料公司长期供应饲料。

会议还通过协商产生了课题领导小组，确认了主持单位，主持人和参加单位，并推举郊区畜牧水产局为课题牵头单位，聘请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党委书记吴晓明同志和原省农业厅副厅长、农业厅顾问薛峻山同志为课题领导小组顾问。

此次会议后，本课题在组织、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并认为与会单位都是课题参加单位，都要全面协作，齐心协力推动“长沙瘦肉型母系猪”的研究。从此培育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1986年我区被确定为全省瘦肉型猪基地县(区)，其中有这样的要求，一要有县级种猪场；二要推广长沙白猪作母本发展瘦肉型肥育猪。这对我们的培育工作有很大推动，借此机会筹建了郊区种猪场，扩大核心母猪群。

1987年从长沙市畜牧农场培育猪群中的5个家系，分出一半搬来长沙市郊区种猪场，其中3世代母猪11头，4世代公猪10头，母猪58头，扩大了种猪群，增加了生产量。此后将培育的重点从原试验基地长沙市畜牧农场转移到长沙市郊区种猪场。

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在接替这个课题后，投入很大的技术力量，使课题得到了较快的进展。1987年冬，全国养猪专家李炳坦先生来湖南，考察了本课题进展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我们鼓舞不小。当时省畜牧所提出将长沙白猪更名为湖南白猪的一个系，李先生的意见是叫长沙白猪也可以作为一个系。1988年夏，在长沙市郊区种猪场召开了一次课题领导小组会，省畜牧所龚克勤老师总结了近来工作的进展情况，并提出将这个课题并入湘白猪的研究体系，作为湘白Ⅰ系猪。从此，就逐渐使用上湘白Ⅰ系鉴定这个名称。

当年冬季，全国瘦肉型猪研究协作组在长沙召开年会。我们借这个机会，邀请与会专家视察湘白Ⅰ系猪的核心群和推广基地岳麓山乡菜科站，这是作鉴定前的一次舆论准备。专家们对这个研究课题所取得的成绩很满意。

在同省畜牧兽医研究所合作的几年中，科研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至1989年初，湘白Ⅰ系猪有2个育种场，10个原种繁殖场，有核心种猪150头，原种繁殖母猪600头，生产母猪3000多头，基本形成育种核心群，原种繁殖群和推广生产群的三级良种繁殖体系，在长沙、益阳、芷江等12个地县的养猪生产中已经取得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而使该课题具备了鉴定的条件。

1989年我们开始了鉴定材料和其它工作的准备。

技术方面的准备：我们将过去的各种试验数据进行分析整理，主要有湘白Ⅰ系猪数量性状遗传参数的初步估测；湘白Ⅰ系猪与亲本品种的遗传距离和聚类分析；近交效应的分析；60日龄窝重有关性状的相关分析；湘白Ⅰ系猪生后发育规律的研究；性行为观察；生理常数测定；血液生化值的研究；染色体的初步观察；猪品种、营养水平、饲喂方式正交试验；湘白Ⅰ系猪为母本的杂交组合试验；不同营养水平育肥试验；湘白Ⅰ系猪营养需量的说明；湘白Ⅰ系猪品种标准；湘白Ⅰ系公猪与黔邵花猪杂交试验报告；湘白Ⅰ系猪推广项目实施方案；在农村推广的几个调查报告及30篇论文和总结材料(近20万字)；对湘白Ⅰ系猪的选育过程和技术指标作了全面的总结。汇编成了《湖南省湘白Ⅰ系猪选育研究》，并将这本书寄给全国有关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请他们对本项研究提出鉴定意见。

组织准备：我认为这是更重要的准备工作。鉴于有不少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大家共同努力工作，不分彼此，一旦研究成功后，由于对参加单位、研究人员名单排列顺序等一些问题，弄出不少麻烦，所以五月和八月在省畜牧兽医研究所就这些

问题专门进行了研究。出席会议人员主要有：龚克勤、任福池、孙宗炎、盛文亮、陈剑波、杨仕柳、浣长兴等。大家一致认为，应尽量让参加本项研究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囊括进来。单位分为三个层次：主持单位、参加单位、协作单位；人员分为四个层次：项目主持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研究人员、参加部分工作及热情支持人员，共95人。

1989年11月19和20日，湖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主持，对湘白Ⅰ系猪选育研究工作进行鉴定。鉴定方式采用通讯与会议相结合。在鉴定会前收到李炳坦等研究员、教授、副研究员和副教授的九个书面鉴定意见。参加鉴定会的代表有政府官员，教授、副教授，副研究员，从事研究的科技人员，接受推广的农民代表和新闻单位的同志共74人。并组成了以彭中镇为主任，施启顺为副主任的14人鉴定委员会。他们听取了课题主持人的汇报，查阅了各种原始记录和资料，并进行了实地考察，然后经过评议，一致结论是：选育目标明确，技术路线正确，达到国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瘦肉型猪的产仔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杂交组合的杂优猪胴体瘦肉率达到国际水平。对上述鉴定，组织主持鉴定单位湖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署了"同意鉴定意见"。

推　广

湘白Ⅰ系猪在育种过程中坚持边研究、边示范、边推广相结合的原则，推动育种工作的进行。1985年以前，长沙市畜牧农场在每年培育的后备种猪中除选育留种外，将多余的种猪作为农场的生产猪群，而且用育种群中的种猪一代一代地更新生产群，使农场养猪生产见到成效。农场向农户推广

的各世代种猪的生产性能表现较佳，如母猪繁殖力高，窝重大，肥育猪生长快，对饲料要求不严格。1985年以来，有计划有目的地把第3、4、5世代的种猪推广到县级种猪场和外地农户。

湘白Ⅰ系猪作为长沙市郊区瘦肉型猪基地的主要推广品种。于1986年7月和11月分二批调入岳麓山乡菜科站100头后备母猪，三年来共繁殖湘白Ⅰ系猪后裔3124头，其中纯繁后备母猪474头。根据22头、44头窝情况调查统计：初产母猪，产仔数为11.46头，活仔9.8头，满双月活仔9.4头，双月窝重180.86公斤。经产母猪，产仔15.45头，活仔数13.25头，满双月活仔数12.2头，双月窝重255.36公斤。据12户的129头育肥商品猪调查结果表明：从出生至90公斤体重平均饲养天数为154.5天，日增重584.2克，料肉比为3.47：1。1988年对10家记帐户统计，养猪经济效益为13.3%。

湖南省长沙市劳动模范李树仙同志，自1987年开始引进湘白Ⅰ系第3世代母猪10头，1988年又引进第4世代母猪6头。李劳模近三年的实践认为湘白Ⅰ系猪有如下优点：①容易饲养，发情明显。妊娠期内在饲料中增加37—50%的粗糠，但采食仍然正常，配种受胎率达100%。②繁殖育成率高。1—2产平均产仔11头，3—5产母猪平均产仔12.27头。③仔猪断奶窝重大。初产母猪60天平均窝重145公斤以上，经产母猪达216公斤以上，最高窝重达320公斤。④肥育猪成本低质量高。在中等营养水平下一般饲养170—180天，体重可达90公斤以上，料肉比3.7：1。

益阳地区农科所，用湘白Ⅰ系母猪与杜洛克公猪杂交生产中猪，仔猪断奶后，采用高能中蛋白进行育肥，从断奶

公斤达到中猪体重规格只需35天左右，日增重达647克，料肉比2.52：1。生产的中猪皮薄，膘薄，体质结实，瘦肉率高，试销香港，符合中猪出口标准，得到省、地外贸部门的好评。现在这种杂交组合，被指定为我省出口中猪主要杂交组合。还有益阳县早禾村看到了湘白Ⅰ系猪第3世代育种猪才兴建猪场，猪场一落成就引进第3世代二产母猪30头，当年引种当年获利万多元。

目前湘白Ⅰ系猪已推广到益阳、郴县、耒阳、攸县、怀化、沅陵、株州、南县、平江、衡南、祁东、双峰、涟源、芷江、长沙县、临澧、长沙市郊区等17个地、市、县、区，推广种猪3000多头。1989年国家计委又将湘白Ⅰ系猪列入三年推广项目，要求10县2所共12个单位三年内累计推广种猪二万头，生产杂优商品猪40万头，创产值近2亿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科委贷款50万元，湖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贷款10万元，各地市县配套资金60万元，任务已经落实，正在组织实施。本项目由湖南省畜牧局、省畜牧兽医研究所、长沙市郊区等12个单位共同承担。省农业厅郭劲军副厅长为首的项目领导小组是本项目的组织机构。1989年10月组织了12单位的领导和技术人员，进行了技术培训，以保证三年内完成国家计委提出的任务。

《双送粮》创作的前前后后

徐叔华*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湾，

几十里水路到湘江。

江边有个甚么县？

出了个甚么人，世界把名扬？

这首歌的歌词出自我解放初期在黎托乡参加土改时创作的一个小型歌舞剧《双送粮》中的一段对唱，《双送粮》是我从事戏剧创作的第一个作品。（时间：1950年秋。地点：谭阳村的关帝庙）。初稿就写在几张搓纸眉子用的毛边纸上。如今，四十年过去了，《双送粮》成了湖南省花鼓戏剧院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保留剧目之一，《浏阳河》成了一首家喻户晓，久唱不衰的歌曲。每当听到它时，就仿佛置身于当年所亲身经历过的那一段如火如荼的生活中，感到格外的亲切。

迎土改赶排新戏

我是1949年9月15日参加湘江文工团的。那时我才18岁，甚么事情也不懂，只凭着一股热情干工作，要我唱歌就唱歌，要我演戏就演戏，要我打小锣就打小锣。进团之后，

注：徐叔华原任省戏曲研究所副所长。

我演过花鼓戏《哑巴劳军》，在《白毛女》中跑过龙套，还去益阳县农村搞过一次减租反霸斗争。

“农民不是命不好，无田无地是原因。”农民们对土改的要求是非常迫切的，但究竟怎么搞，谁也没有底。从益阳回来后，省委宣传部部长朱凡同志把我们团的领导找了去，说：“省委为了取得经验，准备分期分批在全省铺开搞土改，已经派出了一个工作队，正在榘梨区搞试点。你们团也要抽调一部分同志，成立个小分队，前去参加。这个小分队，既要能够演出，配合土改做宣传，又要能够下去参加土改工作，这对你们体验农民的思想感情，加强思想改造，吸取丰富的创作营养是大有好处的。”为了落实朱部长的指示，团里领导及时向全团同志作了传达。大家听了，非常兴奋，都想报名参加。我是个韭菜麦子分不清的典型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学堂门，从学堂门到机关门，对社会实践根本不了解。现在要去参加翻天覆地的土改运动，我心中感到非常高兴，就象一位刚刚入伍的战士准备去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次战斗似的，激动、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

没过几天，团部召开大会，由团长刘斐章同志宣布下乡人员名单，一共二十多人，其中有南下干部，也有青年学生，领队的是文工团副团长刘高林同志。当团长念到我的名字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接着团部组织我们认真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怎样划分农村阶级》和《土改法大纲》。同时，还规定我们要在半个月之内排出一个晚会的节目，作为见面礼，送给当地的农民和土改干部。当时选定的节目有三个，一个是反映老解放区土

改过程中，地主老财用美人计腐蚀拉拢农会干部，破坏土改的中型戏《刘贵初》(由领队主演)；一个是根据赵树理同名小说改编的花鼓戏《田寡妇看瓜》(由朱立奇、姚蓉弟扮演)；还有一个是延安“鲁艺”王大化、安波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由我和宋文波扮演)。团部要求：戏一定要排好，一定要质量高，好给榘梨镇的农民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

1950年湘江文工团的同志都住在兴汉门附近的长沙殡仪馆，即现在市妇幼保健院那个地方。每天，我们就在过去停死尸、开追悼会的那个大厅里开会、学习、练功、调嗓和排戏。晚上总要搞到夜深，从来没有一个讲怕鬼的。排完戏后，每人花上八分钱，跑到附近的馆子里吃碗光头粉，或是到摊担上吃碗馄饨、白粒丸，然后回去睡觉。第二天一清早，又爬起来练功、练嗓，复习头天排的戏和唱腔。早饭后集体读报、学习文件，讨论个把小时然后排戏。下午是排戏。晚上还是排戏。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半个月下来，一个个直练得腰酸背痛，浑身的骨头都象是散了架子似的。虽然很辛苦、很累，但同志们都没有任何怨言，还干得特别起劲。

陶公庙演出成功

1950年8月上旬的某一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我们二十几个年轻人，穿着军装、背着被包，扛着套上帆布套的各种乐器，在刘高林同志的带领下，整队离开了殡仪馆，一路上唱着《东方红》、《解放区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了小吴门，步行十余里，到达东屯渡。那时汽车还通不到榘梨镇，东屯渡的大桥也还没有修，只好乘坐一条乌蓬船，逆浏阳河而

上，前往槩梨。

当我们小分队起坡上岸，行走在槩梨镇的麻石小街上时，农民们以为来了解放军的精锐部队，相互奔走相告。他们从没见过那套着帆布套的大小提琴和黑管，还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哩。大大细细的伢妹仔们则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叽叽喳喳看热闹，一直把我们送到区公所。

在区公所稍事休息后，便由省委土改试点工作队队长兼槩梨区区委书记苏义同志向我们介绍情况。他说：你们即将要去的那个黎托乡，就在河那边。民国十六年黎托建立过农民协会，打过土豪，但还没来得及分田就碰上了马日事变。黎托是著名的农运领袖孔家十爹常去的地方，一直有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群众基础比较好，农民中间已经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不过地主老财们的干扰破坏活动也比较严重。这就要靠你们反复宣传当前全国的大好形势，耐心细致地工作，消除地主老财的影响，真正扎扎实实地、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

第二天白天，我们在陶公庙的戏台子上演了一场戏。农民们听说戏班子是由省城的干部组成的，感到很新奇，方园十几里的人都跑来观看，把个陶公庙挤得水泄不通。

戏的演出效果极好，散戏后，观众久久不愿离去，硬说戏没有演完，没有大团圆的结局。有的要到后台来看行头，他们指着大、小提琴和黑管问道："那夹在胯里的是么家伙？那放在下巴底下的是么家伙？用嘴巴吹的又是么家伙？"待我们一一加以说明后，农民们互相调侃地说："嗨，起先我还以为是甚么新式武器哩！"我反问他们："今天的戏你们觉得怎么样？"他们说："戏倒是演得好，就是

太少了，我们还连冇得看过瘾哩。"

爱国情激我创作

演完戏的第二天，我们就离开区公所，搭渡船过河，进入目的地——黎托乡。

当时我被分在槩梨镇对面的谭阳村，住在关帝庙。和我朝夕相处的村长姓游，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中共地下党员，当地人都亲切地喊他做游五爹。一九二七年他参加过农民协会，当过赤卫队员，给土豪劣绅戴过高帽子，游过乡。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要抓他，他便跟随孔十爹跑到湘阴县一个围子里种湖田去了。一九四九年，一听说家乡解放了，他又跟孔十爹一起回到了谭阳洲。

我问游五爹："您看我干些什么好？"

他说："你急么子罗，还怕冇得事情给你干！你们文化人，一肚子的墨水，写写算算都来得，只怕会搞手脚不赢哩。"他稍稍停了停，默了默神，然后又对我说："那你就帮助搞写算吧！"

于是白天我就跟着他和农会负责人上地主家去没收地契，登记财产，或是到垅里去丈量土地。晚上则和农民一起在关帝庙里开会，或讨论分田分财物的方法，或造造花名册、田亩册、耕牛农具册，还帮忙写红榜。

一时，关帝庙成了全村的政治文化中心。从早到晚，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农民一见面，不论男女老少，都眉开眼笑，一开口就是"搭帮毛主席，搭帮共产党，如今我们翻了身，真正当家做主人。"那喜悦、兴奋的心情简直没法用言语来形容。这种情绪深深地感染了我，感染了我们每

一个土改干部。

开始那几天，乡亲们还不晓得我们是文工团员，都以为我们是来帮他们搞土改分田的干部。日子久了，人搞熟了，渐渐地消除了隔阂，打成了一片。一天晚上，在关帝庙开完讨论会，大家还不肯离去，正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天讲白话，一个叫曹冬生的农民突然问我："徐同志，你是个唱戏的吧？"这话来的突然，我深怕失去了干部身份，影响自己的威信，连忙否认说："不是不是，我是土改工作队的。""哼，你呀，不讲老实话。"他说，"那天在陶公庙唱戏，我分明看见你背把锄头在台上演《兄妹开荒》，是不是？"接着他向大家大声地吆喝道："我们欢迎徐同志给大家唱一个好不好？""好！"在座的人马上应和。看来，真菩萨面前是烧不了假香了，我只好清了清喉咙，唱了一首："金凤子，开红花，一开开在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最后一句刚刚唱完，曹冬生又带头大声吆喝："好不好？""好！""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非要我再唱一首不可，没奈何我就又唱了一首："南京到北京，那一个不闻名，人民的领袖就是那毛泽东，他领导我们翻了身，当家作主人，嗨咿嗨哟，当家作主人。"这一下我没等他开口，采取主动，反守为攻，要他也唱一首。他忸怩了半天，最后打了一个山歌："太阳大来晒郎身，姐在房中把脚蹬。绣花鞋子蹬破底，青丝袜子蹬破纱，何得囉那乌云把日遮？！"那嗓子还蛮不错哩。从那以后，我和他交上了朋友，向他学了不少的山歌。

土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分完田后，接着就是送公粮。对这件事，群众早就作好了准备，家家户户都趁着出大太阳的

天气，把要送的稻谷又搬出来翻晒了一遍，用风车车了两、三道，粒粒谷都十分饱满，一粒秕谷也没有，只等槼梨区粮站来通知。通知一到，马上就送，根本用不着作动员。并且在组与组、户与户之间还展开了竞赛，看谁的公粮入库快，任务完成得好。

开始送粮的那天，游五爹起了个黑早。这个身板结实、精力旺盛的老头，将满满三麻布袋粮食搁在土车子上，用棕绳子捆好，然后又在车头上插了一面小红旗，上面要我帮他写了两句话："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搭帮毛主席。"我走上前去，拿起车扁担，放在肩膀上，起肩试了试，好费劲的，忙问他：五爹，咯样重，你老人家打得起吧？"他满不在乎地说："笑话！莫说三麻布袋，就是五麻布袋也打得起囉。"

吃罢早饭，他把七岁的孙伢子喊出来，递给他一根粗麻绳，大声地说道："孙伢子，你在前面拉，爷爷在后面推，我们两公孙抢红旗去！"。

说罢，两公孙推着土车，高高兴兴地朝槼梨区的方向走去。

送粮的队伍浩浩荡荡，络绎不绝，各家各户的精壮劳力，挑的挑箩筐，推的推土车，陆续汇入这股人的洪流，徐徐地行进在浏阳河的大堤上。土车子不时发出"咿呀呀吱、咿呀呀吱"的叫声，此起彼伏，打破了田野的宁静，浮荡在黎托乡的上空。

这是一幅多么优美、多么壮观的翻身农民去送公粮的场面啊！

刚刚翻过身来的农民，把他们一年来用汗水浇灌出来的

果实，自觉自愿地送交给国家。他们所献出的不单单是公粮、而是对人民政府、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一片拥护爱戴的赤诚之心。当时我想：一个国家有这么好的人民，那还有甚么困难不能克服呢？！我作为一名新文艺工作者，就应当努力表现他们，歌颂他们。

如果说创作需要有什么灵感的话，那么这灵感只能来自生活，来自生活中人物思想感情对作家心灵的一种撞击和沟通。回忆我在黎托乡生活的那段日子，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游五爹身上所显露出来的那种强烈的翻身感和那股不服老的劲头，是他那出自内心深处的对党和人民领袖热爱之情。他的形象老在我脑子里盘旋、闪动，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听着那土车发出的"咿呀呀吱"的声音，我想像、琢磨着他走在大路上的心情，为他想了四句唱词：

打起土车子往前赶，
翻山越岭走得忙。
若问推车往哪里去，
一心只为送公粮。

我连忙掏出钢笔，走进关帝庙，从挎包里拿出一张毛边纸，把它记录了下来，并且套用《刘海砍樵》中《十字调》的旋律，加以发展，创作了一首新歌子。

打起罗嘀嘀，土车哪子，
咿呀呀吱、咿呀呀吱、咿呀呀吱。
往前赶罗嘀，过门咿呀呀吱咿呀呀吱。
往前赶罗嘀，翻山哪哈哈，越岭哪哈哈。
走哑的忙哪哈过门哪哈哈越岭哪哈哈。
走哑的忙哪哈过门哪哈哈越岭哪哈哈。

我边写边唱，手舞足蹈，进入了一种千军万马送公粮的情境之中。不过，那时还没有想到要演戏，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想写一首歌曲罢了。

《双送粮》轰动乡村

送完公粮之后，乡政府和试点队要召开一次欢庆土改胜利的大会。这时黎托乡的农民已经懂得了我们是从湘江文工团来的，在陶公庙演出的那一天，有好多人都没有去，只有少部分人看过戏，都要求我们在乡政府搭个台子，再为他们演出一场。这要求是无法拒绝的。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台现成的晚会，但农民看戏，好比"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带队的刘高林同志担心戏少，不能满足要求，便把大家召集到乡政府开会，号召大家拿起笔来进行创作，并且决定文工团员不再住在下面了，都集中住到乡政府来，突击写戏、排戏，准备演出。

《双送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写的。

在这之前，我只是看过戏，演过三个小戏，在大戏里面跑过几次龙套，还从来没有写过戏。高林同志鼓励我说："不要紧，没关系，你只管大胆地写，'草鞋有样，边打边像。'写出来，我们大家帮你出主意，想办法。"

当时，乡政府驻扎在黎托一户大地主的家里。乡农会主席腾了两间大一点的房间给我们开地铺，男同志一间，女同志一间。白天我就盘着个腿，坐在地铺上写，晚上点盏马灯，伏在地铺上写。乡下蚊子多，白天鸡蚊子叮，晚上大蚊子咬，我也顾不了许多一边打蚊子一边写。大概只花了三天时间，我居然在那四句唱词的基础上写出了一个小戏，心里好高兴的。开始时并不叫《双送粮》，就叫《推土车》，

剧名是后来高林同志帮忙取的。初搞出来后，我送给他看，他除了给予充分肯定外，还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他说："写戏一定要有矛盾冲突，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戏。""你这个戏就把车子卡在吉口里，要那个挑担子的青年农民来抬作为矛盾冲突，用来体现团结互助的主题。"根据他的意见，我又改写了一稿，《浏阳河》那几段对唱的词就是在他的启发之下、在学习了大量民歌、山歌、盘歌之后创作出来的。

改稿通过后，高林同志当场拍板，决定立即投入排练一定要赶在庆祝胜利的晚会上面演出，作为献给黎托乡人民的一份小小的礼物，并要求达到《刘贵初》、《田寡妇看瓜》、《兄妹开荒》同样的艺术水平，如果能够超过就更好。戏里的三个角色分别由詹仲坤、姚滌新、周国喜三位同志扮演，导演则由歌舞技巧较高的詹仲坤同志兼任，乐队指挥及设计锣鼓点子的任务交给了朱立奇同志，音乐编配则由我自已负责。

乡政府猛然增加了二十多人，住得相当挤，没地方排戏。晴天，我们就在禾场坪里排；雨天则钻杂屋、碓屋里排。杂屋碓屋靠近厕所和猪栏，空气污染臭气熏天，但大家非常卖劲，一天到晚，吹、拉、弹唱，十分热闹，附近的一些农民群众都跑来观看。

戏很快就排出来了，参加了黎托乡土改胜利欢庆大会上的演出，效果之佳，大大地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农民不断地为之欢呼叫好。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演的就是他们自已的生活、自已的事情抒发了他们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领袖毛主席的那股激情的缘故，看起来觉得格外的亲切。

游五爹这个模特儿，写到戏里时，我帮他改了个姓，叫

黎五爹。扮演者詹仲坤同志是个能歌善舞的好演员，演得十分逼真，很有神气。尤其是他把生活中推土车的一些动作，如上岭、下坡、转弯、抹角、上肩、换肩等等予以提炼，加以舞蹈化和规范化，跟人物性格密切结合起来，能使人产生一种美感，不仅农民看了满意，就是行家们看了也认为是一种创造。

另外，这个戏的打击乐也编的非常成功。结合剧情，结合舞蹈动作，在制造你追我赶、争交爱国公粮、争当送粮模范的气氛方面，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双送粮》这个小戏，如果不是去黎托乡参加土改，不是亲身体验了农民的思想感情，被他们那种爱爱党、爱国、爱领袖的激情所感染；如果没有刘高林、詹仲坤、朱立奇等同志的具体帮助和小分队全体同志的通力合作，那是搞不出来的。

怀仁堂主席赞誉

土改结束，小分队告别了黎托乡，回到了长沙市。一次，在市人民银行礼堂演出《双送粮》招待省、市干部，那掌声和欢呼声也是空前的热烈。后来又经过不断的加工和反的锤炼，参加了湖南省第一届文工团会演，荣获了创作演出一等奖，受到省委领导的鼓励和表扬。

1951年5月《双送粮》被选调到北京汇演。22日上午，文化部艺术局付局长周巍峙同志(《志愿军战歌》的曲作者、后任文化部付部长)通知剧组：《双送粮》定今晚进中南海，在怀仁堂的小舞台上为毛主席等中央首长演出。消息一传来，剧组的同志们无不欢欣鼓舞，喜不自禁，尤其是扮演孙妹子的小演员龚业珩高兴得跳了起来。那年她刚满15岁，是

个中学生，来自毛主席的家乡——湘潭。她以她那甜美的音色、响亮的歌喉考取了文工团。进团以后，排练的第一个节目就是这个戏，紧跟着就上了北京。当时好多人都羡幕她运气好。听说毛主席今晚会来看戏，她心里乐滋滋的，又高兴，又紧张："我就要见到毛主席啦！我就要见到毛主席啦！"领队提醒她："龚业珩，你别太激动了，要保护好嗓子，保证今晚把演出搞好。"

吃罢晚饭，剧组的全体同志进了中南海，乐队的同志对好音，舞美的同志调好(灯)光，三个演员熟悉了一下舞台，然后负责搞保卫的同志又召集大家开了一个短会，嘱咐大家一定要保持后台的安静和良好的演出秩序，不要乱走动；演员一定要集中精力把戏演好，一切行动都要听指挥。顿时，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怀仁堂的小礼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大家都在等待着那光荣幸福时刻的到来。

七点卅分，小礼堂里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刘宋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神采奕奕地走进剧场。

演出进行得很顺利。当演到中途时，小演员龚业珩正套着锣鼓点子的节奏，拖着土车子跑圆场时，她偷偷地看了一眼台下的毛主席，激动不已，突然踩得那地上一滑，摔了一跤，(因那晚，舞台的地板上打了蜡)剧组的同志傻了眼，都急得擦了一把汗。幸亏扮演老头的詹仲坤同志，舞台经验比较丰富，他随机应变沉着住气，连忙即兴地加了一句台词："孙妹子，望哒做么子罗？！还不快起来，抢红旗去！"乐队的打鼓佬也急中生智，心领导神会，配合得也十分默契、连忙加了个锣鼓点子，这样就遮掩了破绽，还为戏剧增添了

一个细小情节、倒也显得生动自然。

演出结束后，大家都来问龚业珩："你刚才是怎么搞的？"她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就踩得地下一滑，摔倒了。那时，我的栾心都冲到口里来了。"

第二天，周巍峙同志高高兴兴地跑来对剧组的同志们说："你们昨晚的演出很成功，毛主席看了很满意。希望你们今后搞出一些好戏来。"

从此，《双送粮》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向全国播放，由中国唱片社灌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中央和各省的文艺团体也都分分学演这个戏，省内更是出现了一股上演《双送粮》的热潮。这样，《浏阳河》便成了一首风靡一时的群众歌曲，在全国流行，以后又被陆续介绍到海外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至今仍然是歌坛和舞厅常唱、常奏的乐曲，经久而不衰。

四十年过去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四十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到黎托乡去搞土改，又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中的一瞬。但对我来讲，在黎托乡生活和工作的那一个多月时间，我学到了许多在书本子上面学不到的东西，是黎托乡的人民哺育了我，给了我丰富的创作营养，这是我永远也难以忘怀的。

石碑岭古碑简介

欧阳晃

长沙市郊区园艺场境内有座小山，名叫石碑岭。岭两侧是条，通长沙南门的大道，道旁有一块石碑。该碑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碑高2.45米，宽0.85米，厚0.15米，虽经岁月沧桑，风蚀雨洗，但直至1964年秋，仍安然立于苍翠之间。就在这一年秋后，该碑被槐树塘生产队移去建了牛栏。在1977年田园化运动中，又移去做过港石桥，直到1989年4月，园艺场党委认真贯彻文物保护法，遵循上级指示，顺应群众要求，组织人力将石碑重立于现畜莫公路园艺场段的石碑岭上。

1989年4月，我受园艺场党委委托，对石碑进行了一些考查工作，将碑文大部分文字按原格式抄录归档保存。现将考查的一些内容略述如下：

该碑文因年深月久，长期经风雨侵蚀，又遭人畜践踏、车磨碾、锄耙撞击等损坏，多处字迹已模糊或泯没，经洗刷除污后，大部分文字可清楚解认。

碑文上方刊有"上谕德禁"4个大字。碑文分刻正反两面，正面19行，反面18行，共约1300字。按旧时公文格式规定，凡涉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字文字必须招头，另起一行，以示敬意，故第2行只有31字，第3行只有19字，第11行只有27字，其余每行36字。背面一连第4—8行不见字迹，第

11行只有"计开"二字，除第5行36字全部完好清楚外，其他各行均无完整字迹。碑文最后一行所署的年代，"乾隆"下面"十"字上面有一字磨损不清，根据碑文第二行"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十四日"推究、建碑时间应在乾隆三十八年。

碑文主要内容为：奉上谕严禁强丐强行乞讨，各省地方官凡遇流丐往境，务必督率保甲人等谆谆晓谕，如有逞强不法，即拿严惩……。碑文最后约法三章：各区、甲挨户稽查，各户不得停留匪党及面生之人；乞丐凡遇红白喜事及平日觅食，果系老弱残废之人，听其本家随便打发，不得逞力强索；凡棚厂及各伙房毋许停留强丐及收买贼赃，违者即以窝家究治。

现今的园艺场、清代隶属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该场境内石碑岭古道，系往昔由南郊通往长沙市内的必经之路，日夜常有行人、商贾、车辆过往。该石碑岭一带，古时丛林茂密，人烟稀少，强丐之类，日间强讨，夜聚行劫。针对当时社会情况，乾隆帝特授湖南长沙府于善化县南郊石碑岭处立碑示禁。首先晓谕，上下官民，一体奉行，而后对流丐、强丐、奸匪、匪党予以警戒，违禁者将绳之以法。而对妇女儿童行乞者，可以听便，其律令宽严相济，因此谓之德禁。

古碑系载体档案之一。它既是文物古迹，又是社会历史记录，国家，集体、个人都有保护利用的价值。场党委秉承"古为今用"的原则，利用古碑直观教育群众，凡违反国法，扰乱民生者，皆不容许。我们以碑为鉴，可知古今国力民风今盛而昨衰，此举对资治、存史、教化均有裨益。

石碑原文附后。

上谕德禁

特调长沙府善化县□①□级②纪③

为严禁强丐以（"扰"？或"滋"？）④民生事案，奉特授湖南长沙府正堂王牌开⑤："案奉（按）察（使）（王）牌开：'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奉□□□（巡）抚部院（王？）牌开："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奉□（以下疑缺12字）（奉上）谕：'各省流丐，随地乞食，原可听其自便。□是地方官积习，不加约束，是以（流丐）无所顾（忌），甚至招朋引类，恣为奸匪。嗣后，地方官凡遇流丐往境，务须督率保甲人等，谕谕［谆谆］晓谕。如有逞强不法，即拿严惩。以□□□，直省诸大吏其重□□□，实力奉行。钦此。'又乾隆。卅二年润（月）□日，奉谕：'流丐聚众，深为地方之害，自当尽法处治。若稍存姑息，黼预了事。□□□□□□□□，转徙生事。嗣后，凡遇此等案犯，自当按律严惩。毋得□以外结，轻率完结。钦此。'钦遵在案。"是乞丐中如果衰老残疾，可行自便主。强壮少年，不思□□，惟知乞食，或假装（残）疾，□烂涂污，故意侵入，持鞭唱曲，乘空抢窃；携妻挈子，引类招朋，悬架踩索，使法骗人；夜聚□□，日间强讨；遇有婚丧，连日坐食；新谷登场，□□□食。甚至假乞探路，伙窃行强，均未可定。屡奉□□□□□□□□谕：'煌煌地方官，自应实力奉行查察。为（此），仰官吏文到，即便通（饬）所属，遵照查明。实系孤老（残）疾，□入□□者，准给口粮，□其民间衰迈残疾，负病妇女，听其求食，但不得结伴三五同行。其一切少壮（可）自食力者，□□□□□强讨，□地方牌保约束押。令（自谋生理）□□□□，如遇外来流丐，□□□地方官拿究，（押）解原籍收管，分别办理。敢有容隐□□□□□□□□□□□奉行，以安良善。□□ □ □ □咎，切切等因，行司到府下县。奉此，为此，仰县属□□及□□□□□□□乞，除（实系孤）老残疾，贫病妇女，听其自便，但不得三五同行外，其（一切）少壮（可）以（自）力（者），□牌约束押。令自谋生理，毋许结伙沿途强讨。□□倘有前项不法之徒及外来（流丐），（地方）牌保□禀报，以凭拿解，通籍收管。□不□容□□□致于□□各（以下6行缺200来字。）

□□□□批示：一面多差强役，分途查拿及究办。合行□（以下缺14个字）保甲人等□。嗣后如有前项，事后开□不法棍徒，即拿赴县。以凭□（以下缺10个字）处□（四个字）致于□察傅示（缺26个字）计开（缺32个字）。

一、各区牌甲每逢□□□，挨户稽查取具，各户不得停留匪党及面生可疑之（人）。□□□各具结，毋稍□□，致于（27个字）。

二、乞丐凡遇红白喜事及平日觅食，果系老弱残废之人，听其本家随便打发。不□□□□许多。□有□生、俊生率领多人，逞力（强讨）。若本家□□和牌内各户牌内人等，不得口委。

三、凡棚厂及各伙房，毋许停留强丐及贩买贼赃。违者，许牌内人等指名查禀。□□□□□即以窝家究治。

乾隆（三）十八年　　月　　日

说明：

①、□表示缺字。

②、官级名。

③、姓氏。

④、(　)里的字为校点者所加。

⑤、官衔。

碑文抄录：欧阳晃

碑文校点：贺孝武、梁小进

简公庙的兴衰

杨国兴

长沙市城南三十五华里处的歇马岭，有一著名古寺，原曰"龙头庵"，更名"清泉寺"，今称"简公庙"。我祖辈历居此寺附近。经六十多年耳闻目睹，加上近十年来对有关史料的查阅，我深感此寺是一珍贵文物遗迹。

盘龙低头垂圣意　古寺堂皇佛无边

龙头庵山环水绕，古树参天。庵内清静幽雅，烟雾缭绕，磬香扑鼻，引人入胜；庵外清泉如镜，风景秀丽，游人至此止步，官马过此停蹄。早在公元二百多年，三国时代的公侯关云长追斩孽龙，在此下马歇息。明代正德皇帝游龙至此，御马住蹄。一九三〇年九月的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何长工、滕代远红军将领率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在白田铺召开军以上的干部会后，退师转战，行军到这里，将领们下马观察，瞭望长沙风云。昔日龙头庵游人甚多，尤其是来此求神拜佛的善男信女，不胜其数。

关公斩龙是建庵的起因。"关公斩龙"是民间传说的故事，与其相关的古迹现有颇多，如长沙北乡的落刀咀、捞刀河，南乡的跳马间、关刀铺，湘潭易家坪的斩龙坑、锉刀岭等。解放时，跳马间关公庙里还保存一把四十六公斤重的宝

刀，据称为关公斩龙所使。

古城长沙市外廓的山脉发原于江西，延伸至昭山，传说山脉里隐藏一条巨龙。三国时，这条巨龙违反天命，蠢蠢欲动，要将长沙洗成湖海。被关公察觉，跨马追斩狂龙，奔至一山歇马休息（此山遂称“歇马岭”），后追至离湘江七华里处的易家坪大山上，痛斩两刀，故此山至今留有斩龙坑、锉刀岭遗迹。孽龙畏罪潜逃，从昭山越王山洞（现昭山河坳上，有一洞形，名叫“龙洞”。）逃出，直奔洞庭。在逃奔途中碰上了观音，观音化身为一淑女，开设面馆引诱恶龙上钩、趁机下了一碗铁链面给孽龙吃、从此孽龙被铁链锁住，永远吊住在湘江与浏阳河之间。

孽龙被缚之后，僵化成山脉。其龙尾在长沙城北的开福寺，龙腰置于今南托乡云塘、月塘两村高地，盘缠数圈，名叫“盘龙山”，龙头位于歇马岭右侧。明朝初期，人民为纪念关公、观音的救命之恩，在歇马岭的龙头上，兴建了一个古庵，定名为“龙头庵”。庵前有一口大水塘，名曰“龙潭”，故也有“龙潭庵”之称。庵的正门嵌有对联“龙潭月印；马岭之閒”。庵的前厅是关圣殿，有威严的关公塑像，周仓、上书关平两将塑像立于两旁。神座上面高悬一块大匾，“关圣殿”三个金色大字，神像左右挂有一副对联：“精诚贯日月；浩气镇乾坤。庵的后堂为观音殿，神像金光闪闪浩泛镇乾坤”，神座上悬“慈航普渡”四字大横匾，二十四位天神排列两旁。龙头寺四周松林茂密，龙潭清澈见底，为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胜处。

四面好山环古寺　一轮明月映清泉

龙头庵门前不足一百米处，有一珍奇古井。古井面积不大，酷夏清冽如冰，严冬井面热气蒸腾。泉水汩汩溢出，取之不尽，且能治百病，效果非凡，慕名来求神赐水的人络绎不绝。由于此水神奇，人都断为神威显耀所至，庙堂也就得到扩建。明代中期，将龙头庵更名为清泉寺，书有“清泉古寺”四个镀金大字的竖匾直立庙门之上。除把关圣殿、观音殿的全部神像及神座加修装饰一遍外，还新建了“南岳行宫”，宫内安放了弥陀菩萨，行宫右侧新建了一个“伽倘庙，庙门两边贴有对联：“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

清泉寺的横屋中堂曾挂着一联：“四面好山环古寺；一轮明月映清泉”，这副对联是伪政府时期的税务局长张义凡拟稿，为清末秀才罗晓溪修改并书写。

清泉寺最早的一个和尚叫“唯一大师”它的继承人叫“大广师”，俗名张大广。清代中期，清泉寺辖地只有一个白田团，即现洞井乡的洪塘、白田两村及桃阳村的龙潭、龙子塘、茶坡三个村民组。

普施甘露泽四海　匡扶社稷镇三湘

简公名叫简仁惠，又名简明远，望城县坪塘镇洋湖庵人。家里只有一个母亲，长年累月在坪塘石灰窑挑坯石，以此维持生活。简仁惠忠厚老实，勤劳俭朴，乐于行善，广积恩德。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他进清泉寺，拜唯一大师为师，诚心修道。传说同年六月十八日，大师叫徒弟去长沙买

点供品回来，为六月十九日观音大士祝寿之用。简仁惠穿着草鞋，挑着一担皮罗上路了，不到两个钟头，就返回来了。老和尚见他回得这么快，且脚上没有尘土，遂感怀疑。立即要他出发票，一看确实是从长沙城里买的，心想其人有何神术？加上平日见徒弟经常只吃点水果，很少吃饭，但能坚持天天劳动，因此更加猜疑。于是他问简仁惠：“你身体有病吧？”简回答道：“有病。”接着又说：“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会坐着死去，请师父用一口缸装着我并盖好，一年后再看我的尸体，如果没有腐朽，我就为神去了。”唯一大师半信半疑。同年七月二十三日，简仁惠果然坐着死了，师父按其所嘱办理了后事。第二年将缸盖揭开一看，简仁惠的尸体依然坐着，原形未变。此事很快在当地流传开来，有人说，简公是真正的神仙！后来有人将他的尸体用绸料捆着，涂上漆，安放在庙内进屋东头一间小横屋里，并建立神位。从此来庙朝拜简公“肉神”的人日渐增多，尤其是诊眼疾的人更多，因为传说简公是活神化身，医治眼疾有奇效。庙内香火日益旺盛，每年七月二十三日，号称真人圣诞日。“圣诞节”前后三天，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祝寿求神酬神。庙门前的一座直径一米多的圆形铸铁大香炉，香火日夜不停，火光高达丈余，香烟直上云霄。人们不叫“清泉寺”，改称“简公庙”，且威名一年高过一年。

同治癸酉年，即公元一八七三年，当地修善人士集结九峰镇附近（今大托、洞井、雨花亭、黎托、石门、东屯渡一带）三十七个（民）团（包括同仁六团、沿岗七团、南路十三团、太平十一团）的首领在简公真人位前举行文礼，进疏祈祷，并决定以三十七个团全划归简公真人的佛辖区域相许，

大行募捐，重修真人庙宇。庙宇竣工后，用白奇洋石做碑，刊刻碑文。石碑迄今还在，碑文简录如下：

重修简公真人庙宇碑示

癸酉虞求雨泽，合境沾恩，重修庙宇，以答神庥。所有照田派款，名目注载悬碑。兹录总数并戊戌续捐，芬名泐左：

彭寿田、黄广文……

大共入派捐款贰百串。

付修庙用费钱贰百五拾五串捌百捌拾文。

光绪二十六年邹云华刊碑并刻字立。

简公仙殿建成后，加上民国十三年、民国二十四年又先后两次修葺庙宇，庙门前墙成“一”字形，墙上有三张辕门，中门之上的“清泉古寺”竖匾及大部分门联未改，只是“龙潭月印；马岭云闲”一联改为：“精神终不朽，面目永如新；江山留胜迹，世界放光明”。前厅中堂的关公神像再塑，像高达4米，至于周仓、关平的神像及横匾、对联都漆成金色。后堂观音殿只作了局部修饰，两侧添了一套大型钟鼓。简公仙殿的地基比前厅、后堂高出三米多，殿前、殿后各有二十一级阶梯供游人香客出进。简公“肉神”上面悬挂着“简公仙殿”四个金色大字的横匾，匾高一米有余。殿中有六个大柱，前面两个大柱上的对联是：“坐龙潭饮清泉普施甘露泽四海；佑国泰保庶民匡扶社稷镇三湘”，两柱间悬有横匾：“此谓不朽”，匾、联都系前清进士、长沙南乡著名的正楷书法家邹寿熙（又名邹子俊）所写。“此谓不朽”四字在上匾排字时，将“此谓”排成“谓此”挂匾时未加更正。仙

殿东边神座是：红龙大、二、三京圣王爷、京甲老幼将军、统兵元帅，经常有求医者用锣鼓迎神出堂，故叫锣鼓倡神；西边神座是，沙仙真人，神像不出堂，只准装香礼拜。仙殿上面有四台雕有龙凤的大香案。进庙左边横屋是食堂和杂屋，每年七月二十三日，真人圣诞这天，本庙所辖三十七个团的赴席香主上千人在这里就餐，吃斋面斋菜（简公是斋神不食晕）。进庙右边横屋是药店和和尚寝房。中间堂屋是善堂，门上挂着"隆德慈善"匾幅。并装有门联："涤虑洗心从善化；饮和食德记清泉。"，四面墙壁堆、雕、画物颇多，真乃仙居圣地。

一片诚心祈佛佑　千秋铭刻颂古贤

龙头庵、清泉寺、简公庙同指一庙，寺庙的变迁，名称的更替虽涉及到许多唯心的神话，但它充分反映了人民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祈望国泰民安的心愿。庙宇建筑从设计到施工均不失精巧，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干。惋惜的是在"文革"中寺庙遭劫，大批文物包括简公真人遗体及满堂神像被焚烧一空。

现在留下的文物有道光二十八年冬月和咸丰四年冬月，由游五福堂、游家振酬谢神恩捐铸的大古磬两个，磬上镌刻的字迹分明，声音宏亮，分别为二十五公斤和四十公斤。有的神像古物至今还在私人手里，独自敬奉，真是"一片诚心祈佛佑，千秋铭刻颂古贤。

谷山寺谈古

丁冰玉

一、谷山上的谷山古寺

长沙市郊区望岳乡谷峰村，谷峰峦起伏，林壑优美，谷山屹于其间。谷山泉甘土肥，水清林静，左有青龙山盘绕，右有白虎山雄踞，前有朱雀大塘掩映生辉，后有玄武高山耸峙如屏。"天下名山僧占多"，谷山也未能躲过和尚们的眼皮，谷山古寺就建立在这谷山之中。它与长沙城北开福古寺隔湘江相望。

谷山寺的修建规模，结构布局，全仿古开福寺。建筑面积约六千平方米，两进两横，左右走廊，成"国"字形。寺前有雄伟的山门，高约五丈。山门上方有"剌封宝宁禅寺"六个大字。"大千世界；不二法门"的对联分嵌两边。门顶上有"二龙戏珠"的泥塑，麟爪珠须，活灵活现。顶罩用琉璃瓦镶成，阳光照耀，金光闪闪。进得山门，中间是一个大天井，天井中有明代栽植的两棵桂花树，至今仍枝繁叶茂。金秋八月桂花盛开，香飘满寺。由天井而上，踏着由麻石砌成的五十三级阶梯，进入大雄宝殿。殿宇高大，殿内外由坚固粗大的四方石柱支撑。上盖铁瓦，殿脊正中有七层葫芦顶，两头镶嵌着陶塑小佛像。殿内佛像全是铁铸的，主佛像丈六金身。走廊两侧有斋堂、禅堂、寮房、方丈房等建筑。

二、谷山寺的始源

谷山寺的兴建，据原寺院留存的《莲池谱》记载，明朝朱元璋称帝后，封第四子朱棣为燕王，居北京；封第十九子朱穗为谷王，居长沙。朱元璋之孙朱允炆继承帝位后，锐意复古，诸王不服，朱允炆便欲削除诸王势力，集中权力。不料燕王朱棣乃举兵南下，号称靖难军，攻陷金陵，赶走朱允炆，自立为帝。朱棣怕长沙谷王朱穗争权，命将军金甲率兵去杀掉他。老臣程吉得知，赶车前往相救，说服了金甲。谷王免难，乃抛弃红尘，决心修道，在谷山重修宝宁禅寺。谷山原名云母山，因谷王在此出家修行，久而久之，人们便把此山呼为谷山，把寺呼为谷山寺。

若再寻根溯源，谷山寺是唐代禅宗僧人谷山藏禅师创建的，地方志上有记载，其人在《五灯会元》卷六有传。另有一说，认为开山祖师是保宁勇禅师，他在五代时期楚王马殷的支持下，修建了开福寺之后，发心朝拜各地名山大寺，云游三十年之久，方返回开福寺来。当时开福寺招待来往僧众的“知客”，因年久未见，没认出是宝宁勇禅师，便当作一般云游僧众接待。第二天早餐时，首座长老一眼认明了是本寺开山祖师保宁勇禅师，遂鸣钟击鼓，召集僧众，以礼相迎。保宁勇祖师不慕名位，乃渡江而住河西大冲土地庙，立愿在这里再建一寺院，以方便云游僧众。于是又找马殷为施主，鸠工集材，修建了寺院。刺封为“宝宁禅寺”。谷王为在谷山修建寺宇，就把大冲的宝宁禅寺迁了过去。今望岳乡谷峰村的李家大屋场即原宝宁禅寺基地，现在还有“山门大丘”的田名。

三、谷山寺的变迁

1911年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为废除封建迷信，谷山寺的牌坊被拆，佛像被砸，僧徒被遣，只剩下一座空空寺院。

1915年，原主持长老和尚常静和皈诚发起修复谷山寺，得到湖南省长汤薌铭的大力扶助，将原香火田36万收回给寺院，每年可收360担租谷。经过两长老在各地募化，苦修苦建，历时四年，谷山寺又恢复了原貌。寺院里还办起了一所小学，因谷山寺原称宝宁禅寺，故学校起名为“宝宁小学”。学校只有一个复式班，40名学生。办学经费是在香火田中拨出的。

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谷山寺完好如故。但在1951年土改中，谷山寺的菩萨也就被砸碎，钟、鼓、磬和铜佛铁像全被运走，两柜宣纸铅印版本的经、律、论等文章的《大藏经》付之一炬，360石香火田分给了农民，寺里十多名僧徒相继离去。

1952年，望岳乡人民政府为满足贫下中农子弟入学的要求，将谷山寺辟为校舍，办起了谷山完小，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共有六个班，师生二百多人。学生来源除望岳乡外，还有邻近的谷山乡，大湖乡、黄金乡。学生翻山越岭来此读书。

1969年冬季，望岳公社党委根据群众的意见，认为谷山完小设在谷山寺太偏僻，交通不便，师生来校要爬山上岭，物资运输也很困难，尤其是夏季塘坝水满，冬季冰冻路滑，很不安全。决定拆除谷山寺，将寺院材料运至苦竹坳另建校

舍，从此，谷山寺不复存在了。后来，望岳乡建立谷山林场，谷山寺基地辟为苗圃，作为场部。现在谷山寺的墙垣基脚，尚能认辨，两株桂花树依然枝叶茂盛，花卉飘香。

注：本文资料是原谷山一寺宗和尚、原望岳公社文教支部书记彭俊同志提供的。

我的一次荒唐发言

邹少云

一九五八年，是“浮夸风”最严重的一年。那时，湘潭地区管辖十三个县，其中包括长沙县，我任长沙县大托公社团委书记。同年十二月初，地委在湘潭市召开各县、各公社及地直属单位团委书记会议，参加人数约六百，会议时间半个月，会议中心内容是“反右倾、鼓干劲、放卫星、争上游”。大会上批判了地委副书记肖质强同志的右倾保守思想，后来还撤了他的副书记职务。

一天晚上，进行大会发言。每县派一个代表表决心，放“卫星”。第一个发言的是湘潭县代表，题为水稻亩产十万斤。那个代表说，他们回去发动群众大搞水稻高产试验，保证亩产十万斤。第二个发言的是望城县，内容是说他们发动社员养大肥猪，每头达到一万斤。宁乡县代表第三个发言，他讲的是组织青年培植茶树，每株收摘两担茶叶，放茶叶卫星。各县代表相继发言，其中有个代表表示要放深耕八尺的卫星。正在这时，我对长沙县金井公社黄未秋同志小声说：乡里埋个死人，三尺棺材四尺眼，那不埋得两副棺材吗？谁

注：邹少云系当时长沙县大托公社团委书记。

知坐沙县团委副书记周立义同志听见了，他正在为没有找到发言人而发愁，于是顺水推舟："你就是右倾保守，别人敢说，你就不敢说？今天晚上就由你代表长沙县发言。我不管你讲什么都行，只要讲得生动活泼，目标远大，措施得力就行"。他马上写了个条子送到主席台，条子上写道：长沙县代表发言人邹少云同志。当时我埋怨自己不该多嘴，一时不知讲什么好，离我发言的时间不到半个钟头。想来想去，看到礼堂的墙上，有幅毛主席旧居的图画，画面上有几根大楠竹，我急中生智，就在楠竹上大做文章。我讲的题目是"一根楠竹做八用"，我说我们回去发动青年培植大楠竹，每根竹子可做八用：

第一节做直径一米五的扮禾桶。

第二节做直径一米的米桶。

第三节做拌青草的牛食桶。

第四节做担大水桶。

第五节做洗脸盆。

第六节做提水桶。

第七节做水瓢。

第八节做把洗锅刷。

同时，我又在扮桶上大肆宣染，用竹子做扮桶说有五大好处：

1、省木材。每个木扮桶需要0.4立方米杉木。

2、省木工。每个木扮桶需要三个木工才能做好。

3、省桐油。每个木扮桶需要桐油两斤。

4、省力气。竹制扮桶轻便，便于女劳动力使用。

5、省箍篾。每个扮桶有两个箍，用竹子做就不需要

了。

我还先后将后面"七用"加以发挥。我最后表示回去后，让荒山变竹林的美好设想。我讲完之后，掌声雷动，个个叫好，因为那时候，谁设的目标大，谁放的卫星高，就表扬谁的干劲足，有敢想、敢说、敢做、敢当的"四敢"精神。

十三县的代表都发了言，都是高指标。凭空头指标的高低论英雄，听这样的会越听越好笑。至今，亩产稻谷一般不超过三千斤，最大的肥猪不过六百斤，深耕也只宜三、四寸左右。我讲的八用楠竹，毫无书对，做最后的两用还差不多。

在荒唐的年月说出那样荒唐的话，我现在想起时，有无地自容之感。愿今人切莫搞浮夸，说假话，吹牛皮，否则一害国家，二害集体，三害自己。我们要发扬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三老"作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唯有如此，实现四化才有希望。